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0年 第4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欧亚大陆大国关系

- 3 李永全 / 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
20 冯绍雷 / 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

俄罗斯政治外交新动向

- 61 费海汀 / 俄罗斯的政治结构及发展趋势——2020年宪法修改前后的比较
89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德米特里·苏斯洛夫, 等 /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俄罗斯文学与政治

- 118 刘文飞 / 索尔仁尼琴: 生活与创作
153 宋羽竹 / 俄罗斯“长久之国”的构建——从“大书奖”看国家叙事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刘 军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本期执编: 万青松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0年8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0 年第 4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и Юнцюань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и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3)

Фэн Шаолэ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итая, России и ЕС в Евразии: Влиян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на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20)

Фэй Хайт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равнение до и посл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поправки 2020 г. (61)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 и др.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89)

Лю Вэньфэй

Солженицы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118)

Сун Юйчжун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долг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згляд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ррати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емии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 (153)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0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Li Yongquan

The Eurasian Geopolitical Configuration and the Great Power Game (3)

Feng Shaolei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Russia and Europe in Eurasia: Impa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20)

Fei Haiting

Russian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Trends: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2020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61)

Sergey Karaganov, Dmitry Suslov et al.

New Ideas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89)

Liu Wenfei

Solzhenitsyn: Life and Creation (118)

Song Yuzhu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lasting State”: on Russian National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Book Award”..... (153)

欧亚大陆大国关系**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

李永全*

【内容提要】欧亚地区对于中国发展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与欧亚地区地缘政治进程有着密切联系，7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欧亚地区或者与之相关。欧亚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地区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当前欧亚地缘政治进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美国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博弈、后苏联主权国家建设进程及其多元外交、中俄两国在欧亚地区的对接合作等。欧亚地区也是各种地缘政治理念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碰撞的舞台，既有冷战思维、行为的遗毒，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多极世界理念的实践。新冠疫情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各国开始更加重视主权和民族利益，更加关注在复杂的世界变局中谋求公平、公正的合作进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正成为欧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可替代的积极因素。

【关键词】欧亚地缘政治 中俄关系 多边战略稳定 欧亚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8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4-0003(17)

本文所界定的欧亚，不是地理学上的欧亚大陆，而是狭义的欧亚，即后苏联空间、独联体地区。目前的独联体是一个分裂的、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结构。但是，独联体对于俄罗斯、独联体国家本身和美国来说，也是一个

* 李永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俄关系高等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

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结构。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意味着势力范围、扩展的安全空间；对于独联体国家本身来说，它至少意味着不可或缺的经济联系、发展要素以及政治安全因素；对于美国和西方来说，它是遏制俄罗斯崛起的重要手段。在欧亚地区，俄罗斯无疑是最重要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参与者。俄罗斯是苏联解体的“遗产”，这个历史事实与欧亚地缘政治进程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甚至决定着几乎所有其他地缘政治进程，从而使得欧亚地缘政治形势与大国博弈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

1991 年底，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苏联的国际法继承者。俄罗斯与苏联相比，领土减少 24%，从 2240 万平方公里减少到 1700 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 49%，从 2.9 亿人减少到 1.48 亿人。当前俄罗斯国土面积就是苏联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苏联解体还导致统一卢布区解体，统一苏联武装力量解体，统一经济联系和产业链断裂，虽然统一市场尚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苏联时期，中苏边界长 7700 多公里，现在中国与俄罗斯边界只有 4350 公里，而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总共有 3300 多公里接壤。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继承了苏联在俄罗斯境内和国外的财产，继承了苏联的债务，继承了雄厚的科技力量，继承了强大的军队与核武库。所以，脱离苏联独立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但是，俄罗斯产业结构畸形，能源矿产采掘业独大，机电等制造业严重萎缩，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石油天然气出口。虽然俄罗斯政府提出创新经济等发展理念，鼓励应用技术的研发，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但时至今日，俄罗斯经济结构并未出现明显改善，甚至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以 2019 年为例，俄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63.33%，金属及其制品占 8.87%，机电产品仅占 5.32%。^①这种经济结构与苏联解体有密切联系。苏联是一个统一的经济结构，是按照计划经济规划出来的，一

^① Отчёт о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е России в 2019 году: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экспорт, импорт, торговые партнёры, структура, товары, динамика. 13 февраля 2020 г. <https://russian-trade.com/reports-and-reviews/2020-02/vneshnyaya-torgovlya-rossii-v-2019-godu/>

个产品的生产是由多种部件构成的，而这些部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生产，尤其是军工产品。比如，图-160 战略轰炸机是在乌克兰生产，但是由俄罗斯设计；伊尔-62 飞机在乌兹别克斯坦生产，也是由俄罗斯设计。目前俄罗斯有 350 多座单一城市，军工城，整个城市只生产一种产品，一旦这个产品失去意义或者市场，则整座城市陷入危机。

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对于苏联和俄罗斯来说，是一场政治灾难。苏联大厦似乎是在平静中解体和坍塌的，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后续的地缘政治进程表明，苏联解体与其说是某个时代的结束，不如说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俄罗斯精英从来没有平静地对待这个事件。用普京的话说，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谁不惋惜苏联解体，他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他没有头脑。”^①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国内，而非国外。解体后的十年即叶利钦统治时期，俄罗斯以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社会混乱而闻名于世，甚至有继续解体的风险。普京在 2000 年成为俄罗斯总统后，开启了俄罗斯振兴进程。这个进程是从国内稳定开始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整顿宪法秩序，巩固国家统一；理顺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防止寡头干政；规范媒体行为，查实媒体背后的利益结构；依法对待反对派，遏制其国外代理人；摆脱叶利钦“家族”控制，等等。在对外政策方面，最主要的是重视加强对后苏联空间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强化独联体政策。在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外交构想中，独联体，即后苏联空间，始终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标志是欧亚一体化进程。普京认为，欧亚一体化是俄罗斯振兴的必要条件，俄罗斯将与欧亚联盟国家一起构成世界的一极。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曾经寄希望同欧洲一体化，从而融入西方世界。但是这个天真的想法很快破灭，回归传统发展道路的俄罗斯开始把政策重心放在欧亚地区。普京在 2011 年 10 月正式提出欧亚联盟的设想，后来聚焦联盟的经济方面，称为欧亚经济联盟。这个建议或倡议得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积极响应。

^① 普京：《谁不惋惜苏联解体，他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他没有头脑》。16 декабря 2010 г. <https://aif.ru/politics/world/251189>

2015年1月1日，俄罗斯主导的、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①同年，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面积2000万平方公里，人口1.8亿，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20%，石油储量占15%。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3年关税联盟成员国间贸易总额为641亿美元，与第三方贸易总额达9301亿美元。除承诺保证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还将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部门，如能源、工业、农业和运输等领域协调彼此的政策。欧亚经济联盟启动后，由于运输成本的节约，商品价格将降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拉平，将刺激在欧亚经济联盟共同市场上的“健康”竞争。由于减少成本和提高生产率，平均工资将增加。由于商品需求量增加，生产将扩大。由于市场容量扩大，新技术和商品的投资回收率将提高。^②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后，虽然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自身发展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它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欧亚经济联盟又增加了两个观察员国：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

总的来看，欧亚地区一体化是多层次的。最高形式的一体化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其次是欧亚经济联盟，还有针对所有国家的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目前运转最成功的是欧亚经济联盟。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一体化进程，比如在军事领域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事一体化、安全领域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等。由于上述问题的缘故，欧亚一体化注定是一个复杂的进程。欧亚一体化不仅是俄罗斯的基本国策，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且已经成为俄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俄美在欧亚地区的博弈

俄美关系是从苏美关系继承下来的。因此，同苏美关系一样，俄美关系主要是军事政治关系。但是，伴随着俄罗斯的复兴进程，俄美关系又增加了

① 李建民：“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合作”，《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5期。

② 李建民、李永全：“欧亚经济联盟：理想与现实”，《欧亚经济》，2015年第3期。

新的地缘政治内容。从军事政治关系方面看，裁减军备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一方面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各自全球或地区战略的需要。虽然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但是继承苏联的俄罗斯仍然是全球除美国外最大的核国家。这个时期战略稳定问题包含三个内容，一是俄美两国的军事政治关系，二是如何处理新独立的原苏联有核国家的核武器，即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核武器，三是如何保证核不扩散。

关于后两个问题，即原苏联俄罗斯以外有核国家的核武器和保证核不扩散，1992年5月23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与美国在里斯本签署《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里斯本备忘录，同意白俄、哈、乌参加该条约，同时要求其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由条约文本和附件组成，俄文总共500多页。^①受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监督的武器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潜射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重型轰炸机。双方各自应该削减的总数为1600枚。拥有的核弹头上限为6000枚。弹道导弹投放总重量不得超过3600吨。双方有责任不研制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搭载弹头超过10枚的导弹，对新型进攻性战略武器也做出了限制，等等。

1993年，《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下称CHB-1，即START I）还未生效，俄美又签署了《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所谓的CHB-2（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由于CHB-2是在CHB-1签署不久达成的共识，双方商定，CHB-2在双方换文后生效，但是不能早于CHB-1生效。第二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命运多舛。美国1996年1月就批准了条约，但是俄罗斯外长和美国国务卿1997年9月26日签署了关于CHB-2的议定书，规定推迟5年实施CHB-2。由于美国没有批准1997年9月26日的议定书，所以理论上应该视为没批准CHB-2。俄罗斯军方一直认为第二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有利于美国，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对条约的签署提出严厉批评。但俄罗斯还是于2000年4月14日与

^① Договоры СНВ-1 и СНВ-2.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 5 декабря 2009 г. <https://ria.ru/20091205/197064278.html>

议定书一起批准了该条约，不过设置了前提条件，即必须保持 1972 年签署、2002 年到期的《反导条约》。2002 年 6 月 13 日，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联邦认为CHB-2 生效的前提条件已经丧失，自己不再受有关国际法约束的限制。”所以，第二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实际上没有生效。2002 年，俄美又签署《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这是为了挽救《反导条约》谈判的结果。结果是美国照旧退出《反导条约》，双方签署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规定双方实际部署的核弹头为 1700-2000 枚。到 2012 年 12 月应该达到这个水平。这个条约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当时美国执意退出《反导条约》，俄罗斯需要一个手续和“面子”……所以《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签署后，美国专家说，俄罗斯得到了条约，而美国得到了一切。^①

2008 年后，梅德韦杰夫任俄罗斯总统期间，美俄关系有所缓和，俄罗斯再次尝试与美国改善关系。2009 年 4 月 1 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达成协议，就签署俄美间新的协议开始谈判，以替代在 2009 年 12 月 5 日到期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经过几轮谈判，2009 年 7 月 6 日俄美两国总统签署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框架文件。这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文件为未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提出了大致数据，双方谈妥，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应该在近期签署。俄美在这个文件中声明，将核弹头减少将近一半，减少到 1500-1675 枚，而运载工具减少到 500-1100 件。具体数据在谈判中协商解决，新条约的有效期为 10 年。^②正式条约是 2010 年 4 月 8 日由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布拉格签署的，俗称“布拉格条约”，也是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CHB-3）。

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美国武装部队中总共部署 762 件装载核弹头的运载工具，俄罗斯有 526 件；美国部署在运载工具上的核弹头总共有 1538 枚，俄罗斯是 1648 枚。总体上，已经部署的和未部署的陆基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等各种发射装置的数量，美国是 898 件，俄罗斯是

① 李永全：《莫斯科咏叹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94-98 页。

② Договоры СНВ-1 и СНВ-2.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 5 декабря 2009 г. <https://ria.ru/20091205/197064278.html>

877 件。^①对于СНВ-3，俄罗斯军事专家大都给予积极评价。比如，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伊·科罗琴科（Игорь Коротченко）认为，СНВ-3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可以使俄罗斯和美国未来发展和完善核力量的过程置于监控之下。条约是妥协的产物，其中无疑考虑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包括放弃此前条约中规定的对俄罗斯移动导弹部署区域的限制。也就是说，这个条约也使俄罗斯解开了束缚，可以放手独立选择发展战略核武器的种类。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这有利于俄罗斯。对运载工具和弹头的限制也适用于美国。双方明白，保持战略核力量平衡是可以接受的，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财政经济角度考虑都是如此。但俄罗斯武装力量前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Юрий Балуевский）将军则认为，虽然条约具有平等条件，但是这个条约对美国更有利，“有什么能让俄罗斯驯服？唯有剥夺它的安全保障即核武器。”根据俄罗斯专家的判断，美国不想延续СНВ-3，美国专家不断问俄罗斯人：为什么俄罗斯那么迫不及待地想延续СНВ-3，你们的利益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言外之意，СНВ-3 对美俄没什么影响，美俄是平衡的，而美国不延续条约是不想受条约的牵制。的确，俄美之间是达到战略平衡的，全球战略稳定实际上就是美俄之间的平衡，因此在全球战略稳定问题上，在是否继续执行即将到期的СНВ-3 问题上，首先是指两个核大国对世界和平的责任，对核不扩散的义务。

至于俄美经济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与俄罗斯的贸易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俄罗斯在美国出口中只占第 31 位，在进口中占第 33 位。俄美经济关系被政治化，双边贸易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从 2014 年 3 月起，美国对俄罗斯诸多自然人和法人实施制裁（总共有 700 个），使双边经济关系几乎中断。目前，俄美贸易额只有 200 多亿美元，美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占据第 6 位。俄美经济关系近几年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美国开始在欧洲能源市场排挤俄罗斯，为美国页岩油气和液化气开辟市场，美国阻击北溪 2 号就是例证。其次，俄罗斯也不示弱，不久前爆发的石油价格战即是明证。但是，从总体上看，俄美经济关系比较简单，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俄美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

^① Эксперты о СНВ-3: можно ли заставить Россию быть покладистой. 5 февраля 2016 г. <https://tass.ru/armiya-i-opk/2642028>

治博弈，或地缘政治关系。这种关系与博弈的核心内容，是美国阻止俄罗斯的一体化进程，防止俄罗斯再次复兴为强国。

普京的俄罗斯复兴战略是与欧亚国家，即原苏联地区国家，或者至少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一起成为世界的一极。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坚决反对并阻挠欧亚一体化。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经明确表示，美国坚决反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不管这种一体化怎样称呼，是欧亚联盟还是欧亚经济联盟。希拉里认为，无论怎样称呼，俄罗斯都是想恢复苏联。在欧亚一体化进程中，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立场是具有决定性的。俄方认为，三个斯拉夫民族由于历史、语言、文化的关系，是任何一体化结构的核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尝试组建联盟国家，白俄罗斯对一体化基本持积极态度，尽管仍问题重重。而乌克兰在这个进程中则成为俄美博弈或争夺的重要对象。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日趋更加亚洲化”；同时，华盛顿坚信，“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①俄罗斯与美国争夺乌克兰的博弈异常惨烈，乌克兰的下场也异常残酷，不仅发生若干颜色革命，而且2014年危机最终导致失去克里米亚和国家陷入长期动荡。其实，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警惕，并试图继续瓦解俄罗斯，原苏联地区发生的系列颜色革命无不与美国有关。在俄罗斯方面看来，美国在欧亚地区针对俄罗斯搞混合战争，而颜色革命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俄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社会 and 人文等领域。如果我们把独联体大致划分成若干地理板块，斯拉夫板块（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高加索板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和中亚板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会发现：在斯拉夫板块的乌克兰，高加索板块的格鲁吉亚，明显是美国在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获得的战利品。美国对中亚的重视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122页。

程度与日俱增，通过“C5+1”机制和各种传统影响手段，在中亚培养了大批亲美精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中表现出的独立自主成分，除本国政治进程因素外，不同程度地是受到了美国和西方的影响。独联体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济体制的差别，以及各国独立近 30 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为俄美博弈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当然，俄美关系发展具有一系列制约因素，也具有促进因素。制约因素包括：第一，俄美之间在战略武器平衡领域实际上是非对称平衡，因此美国对俄罗斯的警惕不会消失，俄罗斯对美国的失望和警惕也不会消失；第二，俄罗斯要实现振兴，必然继续推进欧亚一体化，俄美在后苏联空间的博弈不会停止；第三，俄美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俄罗斯与欧洲某些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内的复杂关系，无疑都受俄美关系的影响。所谓促进因素，俄美作为掌握全球 90% 以上核武库的两个大国，对全球核安全具有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俄美之间无论产生什么矛盾，历史上形成的对话渠道和相互熟悉的博弈套路，总会使双方把控分歧；其二，在全球反恐与核不扩散问题上，双方都有对话和适度合作的愿望；第三，作为在相当长时期内相互之间唯一的军事战略对手，保持对话与适度合作，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有其必要性。总之，俄美之间在全球战略稳定领域的博弈，最终结果是双方在保持战略遏制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各自可以放手实施自己的地区战略或策略，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冲突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特点。俄美之间在独联体地区的博弈，对欧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将是长远和深刻的，对欧亚地区各国社会政治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将是显著的。

三、中俄相处之道及在欧亚地区的合作

中俄同为欧亚地区大国，欧亚地区的稳定与中俄关系健康发展密不可分。今天的中俄关系是近 70 年双边关系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即从结盟-对抗-缓和直至战略合作历程的总结，因此是严肃、严谨、健康、稳定的双

边关系。中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新型国家间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的事业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和围堵，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创造和平发展环境还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军者的苏联，都是新中国需要依靠的力量。因此，新中国外交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在中苏结盟岁月里，社会主义中国得到苏联大量无私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基本上是在苏联的指导下完成的，并且是与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配套安排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援助是不可替代的。中苏还签订了协助中国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帮助中国培养了大量核工业人才等。

中苏结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体现了双方的战略需求。中苏关系不仅仅是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也是各自内部政治进程的延续。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局势大背景下发展的。对于中国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苏联来说，中国的加盟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和影响。但是，中苏结盟关系持续了不到十年就开始出现裂痕并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中苏双方盟友关系不仅破裂，而且最终走向对抗，视对方为头号敌人，这段历史是值得反思的。中苏双方都为这种对立和对抗付出了沉重代价，对抗给双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损失。1978年底，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实行和平外交政策。苏联在重新评估中国威胁和中国外交走向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断释放希望改善关系的信号。从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透露出希望改善关系的信息，到接连不断的“葬礼外交”，以及改善关系“三大障碍”的破解，在经过7年努力后，中苏终于迎来了关系正常化。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推动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很快，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继承者。

苏联解体彻底改变了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首先，一向比较稳定的欧亚地区进入动荡时期，各主权国家的建立过程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局面；其次，欧亚地区出现地缘政治真空，由于俄罗斯自顾不暇，欧亚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第三，区域内及周边各种不稳定因素在欧亚地区发酵、泛滥。此时，将中苏关系顺利过渡到中俄关系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要任务。1992年12月，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①《联合声明》的发布，标志着中俄两国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4年，中俄两国又决定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中俄决定将双边关系上升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此，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当代中俄关系的定位，也成为中俄新型国家关系的正式表述。

2001年7月，中俄在深入总结双边关系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继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两国签署的又一个确定双边关系性质的基础性条约。《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指导两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两国关系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基础上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处理双边关系中遗留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确定了友好的解决方式。正是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中俄双方妥善解决了遗留的边界问题，为两国关系的友好未来扫除了障碍，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争端树立了榜样。

中俄关系70年发展的历史经验让双方得出的结论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70年发展历程总结的相处之道是，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相互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不结盟、不对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国家间关系，在发展战略对接中寻求长远合作，在合而不同氛围中加强人文交流。这个相处之道，可以长期指引双边关系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成为欧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在双边、多边及国际组织的有效

^① 《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央视网，1992年12月2日，<http://www.cctv.com/special/903/6/70491.html>

合作，不仅增强了互信，而且促进了欧亚地区的发展。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有效保障了欧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为各主权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中俄在欧亚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接，成为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亮点。

中俄战略对接首先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实现合作。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与欧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5月，中俄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①，双方商定，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2018年5月17日，中国商务部代表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及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代表在努尔苏丹签署《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济贸易合作协定》，为对接合作提出原则性行动纲领，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②

中俄战略对接其次是在“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2016年，普京总统提出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中俄在“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合作谈判已经开始，并商定将建立欧亚经济伙伴关系作为对接点。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可以很满意地指出，我国与中国建立了真正的友好关系，在很多关键领域，毫不夸张地讲，两国关系具有战略性质，是具有优先伙伴关系的战略性质。”^③2019年10月25日，《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济贸易合作协定》正式生效，对于建设共同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网，2015年5月9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5/09/content_2859384.htm

② 相关评论参见张子特：“‘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取得新成果”，《欧亚经济》，2018年第5期。

③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Китай гл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России. 13 декабря 2016 г. <https://ria.ru/20161213/1483449040.html>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形势下，保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推进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并持续在高水平运行。在近 6 年时间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进行了 30 多次会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并不多见。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莫斯科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②，再次把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在双边关系方面不断探索发展战略对接，在地区事务上密切配合，在全球事务上开展战略协作，为世界与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

中俄关系经受住了疫情考验，两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的积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友好关系。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多次通话，双方保持了高水平的战略沟通。俄罗斯是第一个派遣防疫专家代表团来华的国家，中国是向俄罗斯提供抗疫物资支持最有力的国家。疫情期间，中俄合作与相互帮助，中俄对全球疫情的态度以及处理本国疫情的基本国策，凸显双方关系的性质和中俄对全球一系列问题看法的相似、相近和相同。中俄共同抗疫的经历，将转化为疫情后中俄关系提速升级的动力。中俄在欧亚地区的合作与协作是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践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这是与霸凌主义和丛林法则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原则，必将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四、结语

大国关系对欧亚地区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俄美关系均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因此，中俄美三边关系互动备受瞩目。中俄美关系，无论各方如何考虑，任何互动都在牵动三边关系的发展变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网，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6/content_5397865.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网，2019 年 6 月 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6/06/content_5397869.htm

当代俄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首先，在军事政治领域即全球战略稳定问题上，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其次，反对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和插手后苏联空间事务是美国的长期政策；第三，俄美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很强烈地反映在俄美关系中；第四，美国对欧洲能源市场的认识使俄美关系增加了新的摩擦点，不久前的能源大战只是一个插曲；第五，缺乏信任和相互失望的情绪不会很快消除。特朗普对以维持“腐败”精英统治的现行世界秩序大加批判，而拜登则计划领导美国重回巅峰，一方面继续与俄罗斯和中国对抗的总体战略，另一方面不排除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战略稳定等议题上与中俄进行对话。所以，不管谁主政，美国都将继续走与中俄对抗的路线，贸易战、经济制裁、地缘竞争和军事对抗短期内都不会结束。^①

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美国对中国施加的种种压力，包括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信息战等等，凸显美国对崛起中大国的焦虑甚至敌视。最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还将目标对准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执政党，试图改变成功的中国道路，这已经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不能允许被超越，哪怕是理论上、预期上。遏制对手成为美国国策，遏制方法是不择手段。随着美国全球战略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美国对华战略也从“接触-遏制”转向“遏制-接触”，通过所谓“亚太再平衡”及“印太战略”对中国实施围堵，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明显上升。从当前华盛顿的政治氛围看，未来双方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也将继续升级。在中美交往史上，中国从来没有挑战美国的地位，相反，始终是抱着学习美国和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的态度，在此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包容、谦逊乃至妥协。但是在根本制度问题上，中国不会妥协。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大国关系中出现一些新情况，牵动欧亚地缘政治进程和欧亚地区的稳定。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千方百计在疫情问题上“甩锅”中国，在某些国际事务中排挤、污蔑中国，试图拉拢俄罗斯打压中国。一方面，美国欲召开扩大版的“G7”峰会，邀请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印度等

^① Лев Соколышник.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США 2020: эффект для мира и России. 17 марта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cs-and-comments/analytcs/prezidentskie-vybory-v-ssha-2020-effekt-dlya-mira-i-rossii/>

参加，讨论中国问题。讨论中国问题不让中国参加，岂非咄咄怪事，低估了中国，也低估了伙伴。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试图动员俄罗斯一起拉中国进行裁军谈判。美俄所拥有的核武库占全球 90% 以上，中国的战略核武器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防御，而且中国明确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最终目标是消灭核武器。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对华态度更加凸显美国的不负责任和自私自利，说到底还是冷战思维的遗毒。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斗争中，特朗普积极争取俄罗斯的支持，希望俄在美即将与伊朗和中国发生的冲突中站在美国一边或保持中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会更加谨慎地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扮演三方对话倡导者的角色，以加强战略稳定。^①虽然中国的崛起部分抵消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关注，但美国和俄罗斯的对抗也是系统性的，两国关系重启的空间有限。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原有的世界体系、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已经变了，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变化。疫情暴露了国际社会中长期累积的矛盾，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国际力量失衡。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进一步巩固。在欧亚地区，只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欧亚稳定就有保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欧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这当然不是说中俄之间没有问题，有美国专家认为，随着中俄经济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俄罗斯不太可能接受充当中国次要合作伙伴的角色，这或将促使其修复与美及欧盟的紧张关系。^②目前看来，俄美之间仍有结构性矛盾，而且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都不会缓和对中国俄的政策，那么即使中俄间存在不一致，中俄关系都将持续向好。^③更为重要的是，中俄两国能够认识到自己对地区稳定的责任，存在高度政治互信，并在双边关系出现问题时能够有效消除分歧，求同存异。

①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 России удержать равновесие в 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м биполярном мире. 15 апреля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541>

② Ryan Nabil, "Evaluating Russia's Pivot to Asia",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10, 2020, http://yalejournal.org/article_post/evaluating_russias_pivot_to_asia/

③ Адиль Каукенов. Как COVID-19 повлияет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25 марта 2020. <https://cacds.org.ua/?p=8936>

【 Abstract 】 The Eurasian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political process of Eurasia. Almost all major events in the past 70-odd years have occurred in or are related to Eurasia. The position of Eurasia in the world geopolitical map determines the complexity and importance of this region. Main contents of the current Eurasian geopolitical process include: Russia-led Eurasian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U.S.-Russia game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the post-Soviet states' sovereign-building and their diversified diplomacy, China-Russia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Eurasian region and so on. The Eurasian region is also a stage where various geopolitica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layers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There are not only legacies of the Cold War, but also practice of concepts such as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a multipolar world". The COVID-19 pandemic, to varying degrees, has changed people's view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o the pursuit of fair and just cooperation in a complex changing worl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ino-Russi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n irreplaceable positive factor for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Eurasian region.

【 Key Words 】 the Eurasian Geopolitic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Multilateral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процессом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почти все осно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более 70 лет происходили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ли были связаны с ним. Положение Евразии 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рте мира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ложность и важ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Осно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нынешне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й Россией процесс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гра между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роцесс построения сувере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их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ареной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и участник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не только наследие мышления и поведения времё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практика концепции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общим будущим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концепции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изменила взгляды людей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разной степени, страны стали уделять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 и поиску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и чест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ложных миров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Здор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заменимым позитив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мир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Евраз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я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责任编辑 刘 军)

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 ——兼论“一带一路”对三方关系的影响*

冯绍雷**

【内容提要】 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这三种区域进程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与主导政治观念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平和速度也不同，但中、俄、欧这三大行为主体也有寻求接近与合作的愿望。推动欧亚大陆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动力，不光显著地出自经济领域，还来自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构变迁，更由于观念形态所出现的深层变化。当然，三大主体间的接近与合作，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阻碍和牵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一带一路”以其各种功能，既可以穿行在欧亚大陆不同的区域体制之间，成为连接各个国家的交往管道；同时也必定会在共同利益之上，经过长时间努力，建立起机制和规则，推动互联互通。在可见的将来，这种目标合宜、小步推进、避免冲突、求同存异、非排他性的建构方式，能够为推进欧亚合作，乃至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中俄欧三边关系 欧盟 欧亚经济联盟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4-0020(41)

欧亚大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主要政治主体之间是否能够和谐互动，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的中国定位与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9JJD810001）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方并不相同的利益诉求如何才能相互连接、促进福祉，这是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无论是亚历山大远征、十字军东征、蒙元帝国横跨欧亚的进军、当今北约与欧盟东扩，也无论是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结束时刻的欧亚秩序建构，都不能与新世纪以来的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国内政治条件下欧亚大陆的深刻变迁，以及构建相应秩序的紧迫需求相比拟。一个重大而紧迫、又难得其解的问题在于：当代欧亚大陆各方——居于大陆西侧的欧盟、大陆中间部位的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位居东亚的中国，这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构建和调处，才能够适应当代的挑战与危机。

正当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来临之际，在前所未有的国际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形势出现了罕见的变化，各方都面临着重大的选择。在此时刻，中、俄、欧三大板块间能否避免误解、分歧与冲突，在各不相同的制度、观念、实力、战略取向下，走向互相接近、互相协作、互联互通的新形态？新形势之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欧亚大陆中、俄、欧三方的互动？如何判断与这一话题相关联的种种内部和外部复杂动态与深层趋势？在这一复杂又蕴含诸多合作机会的进程中，“一带一路”面临着怎样的发展空间与挑战？显然，这些态势正以前所未见的动能、不断翻新的样式和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迎接着一个国际格局新阶段的到来。

鉴于本文主题“中俄欧在欧亚大陆的互动”是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国际进程，很难找到任何单一学科的现成理论框架去加以分析，因此，本文首先尝试从这一进程本身的正向与逆向两个过程展开，从现实经济动力、结构关系要素、思想观念演变这三个方面，展示这一过程的逻辑动因；然后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以及各大国际主体区域构建进程的差异性角度，分析其障碍之所在；最后，以危机条件下“一带一路”构想与实践取得的进展和突破，来论证当今中、俄、欧三大板块互相接近与合作的可能性，并分析“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继续推进中尚需关注的若干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不合时宜，还是有备而来？

2017 年 3 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半之后，也是“一带一路”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政治声明发表大半年之后，一个颇有政治影响和学术口碑的欧洲老牌独立智库——欧洲改革研究中心，以该中心对外政策研究部主任邦德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能否一起工作？”报告认为，当今欧亚大陆上有三种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方式：第一种是欧盟的一体化，第二种是由俄罗斯和原苏联部分成员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第三种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①那么，这三者之间能否通过相互交流，逐步走向合作共处呢？抑或，只能是各自为政、不相往来，甚至对抗冲突、兵戈相向呢？

邦德的结论，在谨慎乐观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紧迫感。在他看来，在所有可预见的困难面前，欧盟努力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和中国接触是值得的。但是邦德也提出，第一，欧盟当然应该看看，中国是否对经由俄罗斯向欧盟输出，以及反过来输入欧盟的商品真正感兴趣；欧盟也需要弄清楚，中国是否会真正帮助俄罗斯克服对西方机构及其意图的怀疑；此外，欧盟尤其要关注，中国是否还倾向于让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得以继续生存。第二，欧盟也需要看看它是否能与中国达成共同目标。因为，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方面，欧盟已不能再确定自己是否与美国站在同一边，特朗普政府可能破坏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多边组织和协商方式，特朗普不喜欢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②第三，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时代之后，欧盟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兴趣尝试与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谈判共同的标准。虽然，它很可能不会成功。然而，更大的风险在于，如若欧盟自己不做出尝试，那么就是让其他国家来塑造未来的秩序。显然，邦德很期待把有关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三者间建设性互动的问题列入政治议事日程。

无独有偶，又是一年多后的2018年12月，笔者受邀参加了一个更具官方色彩，但是主题类似的国际研讨会。这是经由德国外交部委托，作为准官方机构的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所属的中东欧、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与由俄

① Ian Bond, “The EU,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One Belt, One Road: Can They Work Together?” 16 March 2017,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17/eu-eurasian-economic-union-and-one-belt-one-road-can-they>

② Ibid.

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领衔的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在莫斯科联合举行的研讨会，题为“欧亚的连接：欧盟-俄罗斯-中国-中亚之间关于相互连接的战略对话”。参会人员不仅来自上述各方智库，而且包括决策部门、企业界等各领域代表。这次会议的宗旨在于，共同确认正在出现的战略合作机会，确定在工作策略和所选领域方面需采取行动的优先次序，提炼政策方向，加强协调，确保欧盟、中国“一带一路”、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包括中亚主要国家之间持续的相互连接。这次会议显然来自于德国方面的倡议，而且这已经是同一主题之下由德方发起的第二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了。这次会议召开之际，刻赤海峡危机突然爆发。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一度又恶语相向。但是，当时的冲突没能阻止来自上述各方的代表济济一堂，与会者依然是相当热切地讨论着三方寻求合作的当下进展、问题和前景。与之前的会晤比较多地停留于构想和展望相比，这一次多边会议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具体、微观，且事关操作进程。^①在老练的欧洲战略家提供的平台上所展示的这一问题，看来又一次触动了各方的思绪。虽然新形势下问题愈加复杂，但各方显然有备而来，并不因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而止步不前。

2020年春天，笔者又一次受邀前往欧洲参加相关的学术交流，由于疫情暴发而受阻。然而，有关欧盟、俄罗斯、中国三方互动，探寻“一起工作”机会的进程并没有中止。

二、三大板块的差异：走向疏离，还是互相接近？

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三种不同的区域进程，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

先来看欧盟。二战结束之后，起初是为了防止德国重新崛起，法德之间通过煤钢联营，借助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方法，来实现战后复兴和欧洲两个最大的世仇法德之间的和平。尔后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① 2018年12月4日，由DGAP（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和RIAC（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名称为：Connecting Eurasia: EU-Russia-China-Central Asia Strategic dialogue on connectivity。

一直到冷战结束不久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告了欧盟的成立。此后还包括世纪之交欧元区的诞生、申根协议的确立，欧洲希望通过这一连串体制机制的创建，既避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欧洲战争的残酷搏杀，也力争确保欧洲各国能够抱团取暖，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欧盟的历史性特点在于，第一，欧盟以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是一个在市场、法制、民主体制构建方面都有着数百年丰厚积累的民族国家间的联盟。第二，欧盟一体化进程具有一系列超越主权国家的区域治理模式；同时欧盟依然是西方联盟的一员，其一体化进程明显具有意识形态的排他性。第三，欧盟是当今世界巨大的经济体，但在安全领域，还不得不大大借助于，同时也受制于美国和北约。

欧亚经济联盟先是由哈萨克斯坦于 2004 年发起，转而由俄罗斯于 2011 年推动，2015 年正式成立，旨在运用原苏联地区传统联系的纽带，发挥能源资源与合作的潜能，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形成经济合力，维护地区稳定。就其特征而言，第一，欧亚经济联盟一开始就明言以欧盟为样板，这是典型的普京式绵里藏针的表达。虽然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特别是与欧盟的东部伙伴计划具有明显的对冲性，但普京的说明旨在昭示这一建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第二，该联盟不可避免地带有原苏联地区国家处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深重痕迹，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仅仅是在逐步提升的过程之中，以资源经济为特征的禀赋条件受国际行情变化的影响大。第三，从沙俄直到苏联的复杂历史与地理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进程。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作为新兴主权国家的共同体成员，尝试以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的协商方式推进一体化，这是大势所趋。当然，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作为欧亚经济联盟所要求的内向聚合与各成员国的外向“多边”选择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博弈态势，一直伴随着欧亚经济联盟的成长过程。^①

而“一带一路”倡议，借重于中国经济成长的活力，通过欧亚大陆和海上的互联互通，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地区的合作与和平。“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未能走出低谷的困难背

^① Андрей Коргунов. Почему мир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м//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6 июня 2018 г.

景之下所提出的一项动议，既关照本国和周边的发展与稳定，也旨在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就其特点而言，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都不相同，它没有预设的区域政治经济体制，也不是地缘政治联盟，这是一个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排他性的国际合作进程。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注重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联合工业发达国家，以互联互通推动产业合作和基础设施共建。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市场为基准、以平等互利的合作项目来推进的国际合作进程；但这又是一个拥有与俄罗斯及欧美西方都很不相同的古老东方文明背景、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高速发展、但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倡议。

这三种区域进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与主导政治观念不同，社会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不同，这就必然会导致三大主体既有时代条件下寻求接近与合作的愿望，又有出自各自背景的种种差异。一旦时机成熟，各方对推进区域合作的做法和路径，也必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这将会是一个较长时期存在的历史现象。面对这三种不同区域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慎重考虑和调处应对，将相互间所需要的合作与不可避免的竞争引导到：既能够发挥“一带一路”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尽可能地符合各方利益，进而稳健而理性地完善地区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

三、推动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结构与理念因素

推动欧亚大陆三大板块出现互相接近趋势的动力，不只是显著地出自经济领域，同时也来自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构变迁，更由于观念形态所出现的深层变化。以下就这三个方面的动态依次展开分析。

（一）三大板块互相接近的经济动力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价值-信息链接，为推动欧亚大陆各方交往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机会。

1. 冷战后三大板块间的相互经济引力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欧亚大陆各大政治经济板块相互间的联系问题。欧盟1991年为帮助俄罗斯推进转型，提出

过塔西斯（TACIS）计划。1993年，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过“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方案。欧盟曾经提议通过加强欧亚大陆之间的铁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欧盟在中国、俄罗斯、中亚等地区的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也为当时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亚欧大陆桥开通而激动。欧亚大陆各方的一个可贵共识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大陆内部各方贯通的基本动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亚间“日益一体化在多大程度上将会重塑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取代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大西洋路线”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莫斯指出，欧亚大陆间的商品贸易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跨大西洋贸易的两倍多，早在2013年已达1.8万亿美元。据荷兰商业银行2018年的报告，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不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已占世界贸易的28%。^①如此强劲的发展态势，势必要求欧亚大陆的各大主体寻求新型的相互关系，以适应变局。

2. 近两年三大板块间经贸关系的持续推升

以近两年统计，2018年中欧贸易额已达到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创历史新高。2018年，欧盟已经连续1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中国连续14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②

中俄双边贸易额2019年历史性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关系近年来受到危机与制裁的严重干扰，同时俄罗斯又在大力推动其经济东向发展，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欧之间传统的经贸纽带依然得到维持。截至2017年底，欧洲仍是俄罗斯第一大出口市场，其占比远远高于亚太方向，二者之差超过20个百分点。^③

到了2019年，中国无论是与整个欧洲还是欧盟，双边贸易额都继续上升。与德国、法国、英国等传统伙伴的贸易额总体上也在上升。其中，尽管英国处于脱欧的严峻形势之下，但中英双边贸易额增长了7%以上。相比之

① Shi Jiangtao, “Dominance or development? What’s at the end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07059/dominance-or-development-whats-end-chinas-new-silk-road>

②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2019年4月4日例行记者会上发布的数据。

③ 曲文轶、苏兆荣：“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地缘经济的演变”，《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

下，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往来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大幅度萎缩。

表 1 2019 年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贸易统计（亿美元）

国家（地区）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累计比上年同期，±%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欧洲	7449.08	4367.08	3081.99	1.8	5.0	-2.4
欧盟	7051.09	4285.14	2765.95	3.4	4.9	1.1
德国	1848.57	797.49	1051.08	0.6	2.9	-1.1
英国	862.72	623.74	238.97	7.3	10.3	0.1
法国	655.35	329.54	325.81	4.2	7.4	1.2
俄罗斯	1107.57	497.05	610.52	3.4	3.6	3.2
美国	5412.23	4185.09	1227.14	-14.6	-12.5	-20.9

数据来源：综合中国商务部欧洲司、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数据计算而得，<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zojmgx/date/202003/20200302941074.shtml>；http://sputniknews.cn/russia_china_relations/202001141030443262/

到 2020 年第一季度，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之下，尽管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贸易往来受到严重冲击，呈略有下降的态势（特别是中美贸易下降得更为明显），中俄双边贸易却非常不容易地实现了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近两年来经济贸易关系势不可挡的态势，表明了中、俄、欧三方之间存在着无比强劲的接近与合作的潜能。

表 2 2019/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与部分国家贸易统计（亿美元）

国家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同比，±%
美国	958.04	1198.23	-20
法国	123.93	155.02	-20
德国	374.75	440.69	-15
俄罗斯	253.39	245.31	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计算而得，<http://www.customs.gov.cn/>

3. 欧亚通道建设显现强劲潜能

从目前欧亚之间货物运输通道来看，9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陆路通道和空运仅承载了 5%。事实上，铁路运输时间总体上为海路的三分之一，价格为空运的五分之一，可见陆路运输所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迄今陆路运

输无法畅通的原因，人为的政治安全因素远甚于自然条件带来的障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条线式布局看，欧亚国家之间以新铁路线路建设、中欧班列、公路合作、航空运输合作、能源管道设施合作、通信设施合作为标志的串联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大通道建设方兴未艾。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等通道的建设，明显提升了内陆国家的海外交往能力。尤其是中欧班列在各国推进通关便利化的举措之后，不仅班列的次数大幅增加，此前一直被困扰的回程物资较少的问题也得到改观；政府对班列的补贴有所减少，开始依靠市场机制运行。^①东西走向的能源管线建设在各大经济主体之间加速推进，不仅中俄之间、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天然气和石油管线，而且俄欧之间的能源管道也冲破障碍加紧实施。从点状式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看，巴基斯坦瓜达尔、斯里兰卡汉班托特、希腊比雷埃夫斯、阿联酋哈里发等一系列重要港口的兴建，展示了欧亚各方互联互通的强劲意愿，为未来欧亚大陆各方合作做了重要的铺垫。

4. 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的构建

基于欧亚各方的多年努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一个以产业-信息-金融-价值链为构建目标的多边合作进程，一步一步地展现其后劲。首先，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投入将使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加4.1%。^②其次，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国，到2018年底发展到93个成员国，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400亿美元。至2020年7月底，亚投行成员国达103个。在“一带一路”概念下，国际产能合作得到推动，中英法三方参与的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堪称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跨国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迅速，中白工业园令人瞩目。在电信产业合作领域，尽管美国竭尽全力打击与干扰，华为依然以5G技术领先优势，表现出推进欧亚大陆电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强劲潜能。

① “智库问答——中欧班列：载着货物与友谊，穿行‘一带一路’”，《光明日报》，2019年4月27日特刊。

②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人民日报》，2019年4月23日。

以上进展表明，无论“一带一路”经受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各方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势将推动这一倡议不断落实与扩展。

（二）大国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化引导三边关系调整

观察欧亚大陆政治经济变化的一个较为普遍和常用方法，就是从力量结构变动趋势来判定多边关系的前景。虽然复杂的国际现实并不等同于相对抽象的几何力学结构，但是把国际政治单位简约并抽象为由力量要素组成的结构性现象，观察它们相互间的力量消长和纵横捭阖，至少对判断国际政治复杂互动背后的深层结构性趋势，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依然是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国际力量格局

对当今大国关系的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说法。究竟是中美两极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威权国家”组合、中美俄三方博弈、中美俄欧四边互动，还是由更多角色参与的多元、多边、多样化的力量正在形成当今国际社会的核心格局，迄今都还各执一词。但是可以发现，人们不完全是以数量规模（GDP排名，可统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而且还从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决策单位（具有多大的、但未必可以用数量计算的影响力），来审视当今世界最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格局。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一，尽管欧盟安全力量匮乏，政治决策能力受颇多牵制，但它毕竟是当今世界巨大的经济体，也是区域体制建构最有经验（当然未必完全成功）的政治经济单位。欧盟以相当丰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影响着国际事务。其二，欧亚经济联盟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但兼具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深厚基础，俄罗斯在其中的主导性影响还是十分强劲。其三，总体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得益于多年和平发展环境中的实力增长，逐渐进入了经济体量、结构水平、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属于领先国家的行列，中国稳定开放的步伐更是令世界瞩目。普京总统多次明言，大国之中只有中、美、俄三家能够做出独立的外交决策。^①但是就体量、声望和实际影响力而言，欧盟显然也是当代大国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换言之，在欧亚大陆上，中俄欧各主一方，各有千秋；在国际层面上，也是除了处于另一大陆的超级

^① 根据笔者自2006年以来参加年度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论坛的观察，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普京有几次提及，只有中美俄是能够进行独立外交决策的大国。

大国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行为主体。鉴于这一现实状况，近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的主流看法是，越来越不太赞同当今世界格局纯属“中美两极对抗”的说法，而比较多地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格局，但出现了中美对抗风险较高的状况。^①

2. 国际关系史上的罕见现象：“一超”同时挑战“诸强”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把中、俄同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美欧关系也由于美方不断对欧方施压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敏感状态。美国与中、俄、欧三方，虽程度不同，但几乎都同时处于关系恶化的状态。有学者提出，最主要的国际力量单位——如中、欧、俄、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出现三方合作而同时反对或抵制第四方的现象，大概仅见于新世纪以来的中、俄、欧联手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单边主义。^②从新世纪之初的伊拉克战争，一直到晚近的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中东巴以争端、中导条约、古巴地位、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包括在 2018 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英、法、德、欧与中、俄代表共同会商，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欧盟推出旨在绕开美国的“特殊目的工具”（SPV），得到了中、俄的支持。有学者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常态”。^③在 2020 年国际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美国完全不顾及包括中、俄、欧在内的国际舆论要求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抗疫情中的重要作用，一意孤行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表明美国以“脱群”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立场，已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诚如德国外交部长马斯最近所言，即使特朗普之后民主党能上台执政，跨大西洋关系也未必会有乐观的前景。马斯依然认为德美关系“极其重要”，必须努力加以改善，但是他也明确指出，“认为民主党上台就能让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恢复如前的人，都低估了已经发生的结构性变化。”^④

① 冯绍雷：“中美对抗，还是回到联合国？”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0 年 6 月 12 日。

② 张健：“美俄欧中互动：欧盟角色及其政策取向”，《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2 期。

③ 同上。

④ “Europa hat viel dazugelernt”, *Auswärtiges Amt*, 29.06.2020,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de/newsroom/maas-dpa/2358574>

这就说明，美国与中、俄、欧这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转圜。“一超”如此打压“多强”，这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实属罕见。

3. “弱者”的接近与合作：以弱制强的必然逻辑

当前的国际现实是，一方面，冷战终结以来相对和平开放的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实力解决难题成了较为普遍的趋势。但是，一个并不具备霸权式“硬实力”、却拥有诸多“软实力”的欧盟，相对较多地受到合作者的关注。中欧之间，尽管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出现了新的亟须互相适应、调整化解的重大问题，但双方在战略竞争与合作方面仍表现出寻求均衡的诚意和努力。俄欧之间，虽然纷争不断，但无论是传统的历史文化纽带，还是当代大规模的经贸往来，都使其难以分离。当然，也无法想象，美欧间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战略合作盟友关系，会顷刻之间消失。欧盟通常被描述为，一个主要是基于民事、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中、美、俄三方“安全威胁”的共同体（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因而，在多方互动之中，欧盟相对更多地处于折中机动的地位。^①欧盟同美国结盟关系的疏离，对于中俄虽有抵制、但在保持距离下的探求合作，特别是中、俄、欧基于在气候变化、伊核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合作问题上相互接近的立场，使得三方不但在欧亚大陆内部，而且也在全球形势曲折多变的背景下，寻求新的合作空间和相互联系的纽带。

国际疫情来临之时，面对特朗普政权蛮横且日益自我孤立的态势，中、俄、欧三方的接近与合作，是自主自立、由弱求强的自然而然的逻辑要求。国际疫情暴发后，其一，中俄合作持续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对比，并在疫情形势下经受住了考验。其二，俄欧因乌克兰危机虽然胶着对峙，时有抵牾，但双方明显萌动了通过对话寻找出路的意愿。2019年8月，马克龙总统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释放出希望改善对俄关系的信号；2019年底，欧、俄、乌就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所做的新一轮虽未成功但十分重要的推动；以及2020年2月，由欧、美、俄各方权威人士组成的欧洲-大西洋

^① 张健：“美俄欧中互动：欧盟角色及其政策取向”。

安全领导小组（EASLG）发布解决乌克兰安全问题的十二个步骤声明^①，皆可被视为反映这一趋势的重要迹象。同时，欧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经受了美国粗暴而无情地冲击，依然坚定地得以推进。这是俄、欧、美三边关系中一个前所未见的重要变化。其三，美欧间的传统伙伴关系出现了深刻裂痕。总体来看，欧盟虽然还不愿付出西方意识形态联盟解体的代价，但从北约费用、俄欧能源合作受到打击，一直到驻德美军的迁移，表明美国与欧盟的传统关系下降到了一个历史低点。其四，中欧 2020 年 6 月视频峰会前后，默克尔坦承“欧洲不是中立体而是西方政治的一部分”，欧盟将依然是“西方利益共同体可依赖的伙伴”，并在其后香港国安法问题上对中方持批评态度，中断与香港的引渡条例，表现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旨在维系欧盟最大国际运作空间的巨大惯性；但与此同时，默克尔肯定“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决心”，赞扬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9 月，正当香港局势动荡之时，默克尔坚持率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以示与中国发展合作的决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德国等欧盟国家在维持施压的同时，坚持不追随美国退出多边架构、不与中国搞战略对抗、不放弃与中国合作的基本立场。其五，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特朗普政权没有放弃在欧亚大陆分化离间的战略谋划。如，对欧盟国家普遍施加的巨大压力，挑拨新、老欧洲国家间关系，对中亚地区以“C5+1”的新方式介入，一直寻找机会在中俄关系之间打进“楔子”等，但其权重和威望已经大打折扣。

总的看来，中、俄、欧、美之间的结构性变化，蕴含着未来多种发展的可能。但基本趋势是，在总体国际格局依然保持多极、多元、多样，而非只是“两极对抗”的态势之下，欧亚大陆各大力量在遭逢不确定性风险，包括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面前，出现了加强连接与合作的结构性条件。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敏锐地反映着海洋与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对欧亚大陆的国际主体来说，没有理由放弃机遇，理当积极推进当下中、俄、欧等各方的相互接近与合作，同时理性、冷静地调处与美国的关系。

^① Euro-Atlantic Security Leadership Group — EASLG. Двенадцать шагов по укрепл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Украине и в Ев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РСМД). 14 февраля 2020.

（三）观念变化推动着对欧亚新格局的探索

在一个财富涌流、物质力量的威力高度呈现的世界，思想并没有全然消失。相反，智识演进的态势显示出，观念的力量依然具有宽广空间。与欧亚大陆发展现状和前景相关联，当代思想潮流繁衍播迁的基本特征是：四五百年来主导世界潮流的西方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衰落之中，美国一部分极端政治势力依然顽强地以意识形态的霸凌姿态维护传统地位。与此同时，新兴国家走向多元与自主，兼顾合作与竞争。欧亚大陆的各政治主体之间吁求多边互动、互相接近的意愿显著抬升，与此相伴的思想观念不断呈现。

1. 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助推欧亚新格局

冷战终结后，顺应客观需求而形成的全球化进程，在当时西方主导的历史背景下，身不由己地在其发展过程中夹带着欧美意识形态的深深印痕。因此全球化不光推动着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也伴随着西方模式在各地被普遍复制。因此，20世纪80-90年代在欧亚各地盛行的自由化浪潮过后，出现了“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在全球层面上，经历过“9·11”事件、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欧亚地区层面上，经过了从科索沃战争一直到乌克兰冲突等危机，不仅在新兴国家，而且从欧美国家的知识精英开始，出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以及对西方文明体系开始走向衰落的揭示”。“休克疗法”的大力推动者杰弗里·萨克斯逐渐转变了原先的立场，他于2017年著文表示，“当今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趋势不是‘美国第一’，也不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冷战，而是欧洲与亚洲，尤其是欧盟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一个重要的受益群体将是处在西欧和东亚之间的地区（包括俄罗斯与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新基础设施将更加有效地把这些欧亚大陆腹地国家与西欧和东亚联系起来。”^①杰弗里·萨克斯是从当年的“华盛顿共识”立场逐步转向接受中国发展道路的众多精英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位。从他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历史见证者对该地区沧桑沉浮的反思，及其对未来欧亚大陆新格局与实现路径的期待。

2. “历史多元” vs. “西方中心”：国际史观的新视点

^① Jeffrey Sachs, “Eurasia is on the rise. Will the US be left on the sidelines?” *The Boston Globe*, April 9, 2017.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无论在人文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多线性发展与多样性特征的大量反思性研究与诠释。这一股潮流经久不衰，反过来成为推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进一步走向多元、多极状态的强劲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各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转向。就欧亚大陆三大板块历史地位的研究而言，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巴里·布赞从“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历史观，转向以多文明共同创造国际关系历史的新视角，为各大板块多元、多样、多极态势的发展，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述。2020 年 5 月，巴里·布赞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此前流行的国际关系历史分段，诸如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5 年维也纳体系、1919 年凡尔赛体系、1945 年雅尔塔体系和 1989 年冷战结束，都较多侧重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在他看来，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中国似乎没有关联。按照他的最新研究，至少可以将最近五六百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以新的标准加以分段：1453 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1689 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意味着中俄两大帝国确立边界，在相当长时期内能够维持大体和平，并结束草原帝国的历史）、1519-1521 年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人、1839-1842 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1975 年美国越战失败和 2001 年全球反恐战争爆发。巴里·布赞认为，这种重新思考历史的努力，可能会迫使人们转向从全球视角来决定国际关系的历史分段，这是必要的，因为西方在世界上的统治即将结束；从“欧洲中心”转向“多主体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谱系衍变，昭示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认知与偏好正在酝酿十分重要的转变。^①

3. 地缘政治思想变化预示大国关系的新走向

21 世纪以来，地缘政治思想领域对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对抗型地缘政治思想远未绝迹，甚至以变本加厉的方式在误导决策者与民众。这里既有以新保守主义为底蕴的“先发制人”“不断革命”思想，又有超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必然走向冲突”，还有种种形式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在明里暗里推波助澜。但是当代国际关系领域

^① Барри Бузан о Шести значимых событиях, которых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пересмотра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8 мая 2020.

更富远见的思想探索，既不提倡冷战意识形态对抗，也不鼓吹北约、欧盟的排他式扩张，而是尝试构建一种新型的地缘政治关系。

第一，传统对抗型的地缘政治思想依然存在，但正在朝多方互动与协调的方向微妙转变。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 2010 年 6 月在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政治论坛上，配合着“美俄重启”，曾公开呼吁建立包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内的“北半球民主共同体”。^①这是从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一直到美俄关系重启期间的一个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排他性、含有一定程度对抗性的战略倡议。但到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目睹欧亚大陆危机日趋深重，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地缘政治大家则多次呼吁重视和建立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三边合作关系，一直到布氏逝世。这一转向的含义意味深长。^②

第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学界，都出现了强调美、欧、俄等各大传统地缘政治主体的合理存在，而不是鼓吹相互间的排他性、对抗性的新动向。欧洲资深学者理查德·萨科瓦在其新著中引用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戴维·卡莱欧教授的思想，强调美国、西欧和以俄罗斯为主干的欧亚地区，各自独立存在、自成一体，主张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欧、美、俄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北约东扩式的伸张。^③在类似权重人物的出版物中，也可见当年曾参与北约东扩酝酿阶段政策设计的美国前防长威廉·佩里的认真反思，他的基本观点是，为北约东扩忽略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考量而感到深深遗憾。^④

第三，在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走向的描述中，美国“可被取代性”的假设得到强调与关注。颇有影响的美国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专家罗伯特·卡普兰描绘了未来欧亚力量分布的图景，直言美国作为“最后一个帝国”可被取代的前景。他认为，尽管“未来可能扮演地区稳定力量的角色——印度、俄罗

① 笔者于 2010 年 6 月间参加由梅德韦杰夫总统发起的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政治论坛，美国战略思想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该论坛上发表讲演，呼吁建立“北半球民主共同体”。

② Збигнев Бжезинский. Неплохо, если Путин будет думать о будущем// Газета. 30 марта 2017.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17/03/28_a_10599701.shtml

③ Richard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 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37.

④ [英] 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斯、中国和欧盟，还有着各自的问题”，但“二三十年后，孕育新体系的条件可能会成熟，这一体系中有多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不断有机演化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组成新的政体结构。”虽然“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和稳定，仍主要是美国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能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一个短暂的帝国霸权，我们受命经营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正等待着自己被淘汰。”^①卡普兰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布热津斯基在二十多年前的名著《大棋局》中把美国作为欧亚大陆“最后一个帝国”的“可替代性”表述甚为接近。^②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面临“被取代”前景的帝国心态，如何在推进欧亚大陆各方互动的同时，也妥善处理与美国的相互关系。

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重新走红。与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相比较，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论主张，看来更多地被转化为俄罗斯官方立场。与杜金有所区别，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有关“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最新阐述中，除了依然突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之外，强调“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应是俄罗斯-中国组合。在朝大欧亚前进的同时，除了强化俄罗斯未来几年向亚洲的倾斜，还应思考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理念基础上与欧洲这一传统伙伴落实合作。”^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摩擦不断，但俄罗斯主流精英还是没有放弃要把欧盟纳入他们自己所构想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

4. 主张美国离异于传统欧洲文明的新观点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促使思想精英们反思：欧洲与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正走向离异？虽然这一话题自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就被欧美学术界所关注和

① [英] 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第 43 页。

②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81 页。

③ Richard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 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p.137.

争议,也曾经引发过欧洲主要思想家哈贝马斯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流派学者之间的争论,但如今在“特朗普现象”的刺激之下,从文明和思想源头上区分欧洲与美国的努力,似乎正在重新开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担任哈德逊研究所非驻所研究员、Flint Global公司顾问,并加盟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深学者布鲁诺·玛萨艾斯,在2020年出版的新著《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美国的诞生》中提出,目前美国正处于一个与其“欧洲过去”彻底切断的进程之中,它将重塑自我,并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明诞生。玛萨艾斯认为,受人尊敬的托克维尔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认为美国是欧洲梦的完美版本,但是,“美国与欧洲式的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有着巨大的区别,是一段与欧洲相互分离的”全新开始。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舆论的热议。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前主任凯润·斯金纳评论说,“这本见解深刻的书提出了大胆而违背直觉的论点,国际体系已为民族国家间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繁荣做好了准备。”^①无论玛萨艾斯的这一论点引起多大的争议,它至少表明,美国与传统欧洲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从客观上说,这一趋势会深刻而持续地作用于欧盟与欧亚大陆其他主体间的互动。

5. 孕育中的欧亚观念格局新形态

思想潮流的变换,推动着人们对未来欧亚地区格局,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格局的种种思考。与上述布鲁诺·玛萨艾斯有关欧美文明割裂性的判断相反,中国学者施展的《枢纽》一书提出,“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聚成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②施展强调,中国经四十年改革开放介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后,居于海洋性法权和大陆性法权体系之间的独特中介地位。这一独特而具有强劲势能的地位,不仅凸显了欧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而且表达出对于不同治理空

^① Dominic Lawson, “History Has Begun: The Birth of a New America by Bruno Macaes Review”, *The Times*, May 24, 2020.

^②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导言。

间之间的相互关联；作为兼具海洋性法权和大陆性法权特点的中国，其未来意识形态的构建，天然地承担着在主权界定与非主权界定两种形态之间相互连接的功能，必将在未来欧亚大陆各大板块内部合作与博弈进程之中，以及在调处与传统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海外力量相互关系的复杂进程中，发挥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即使作为俄罗斯保守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亚历山大·杜金，其在 2013 年所著《多极世界理论》一书中，对于中国所兼具的海陆地缘政治特征的刻画，也曾经表达过与施展相类似的思想。^①

总的来说，以谋求欧亚大陆各个板块的自主发展与互相联通的经贸实务，正在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21 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动态势，也表明了中、俄、欧互相接近的逻辑可能；同时，对这种发展与连接所进行的叙事体系的探索与建构，也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化，并开始发挥实际影响。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这样浩大规模与介入深度推进的欧亚大陆强化内部联系的进程。

四、欧亚大陆各板块间的接近与合作又为何远非易事？

欧亚大陆各大板块之间要真正推进高水平的、稳定且持续的相互连接与合作进程，无论从其内部还是外部来看，都远非轻而易举之事。

（一）地缘政治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亚大陆内体量巨大的各大板块聚合，难以避免在域外引起反应，首先是来自美国方面。

其一，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这三者之间尽管很不相同，却都在世界事务排行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就这组三边关系的能级而言，欧盟是当今世界体量巨大的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占据了最为广大的空间地域，而“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则拥有当今世界最多的人口数量和最为活跃的经济态势。^②在这三者的巨大动能作用之下，欧亚大陆

^① Дугин А. Теор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2013 г. С.301-303.

^② Ian Bond, “The EU,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One Belt, One Road: Can They Work Together?”

何去何从，势必牵动世界发展的走向。尤其是欧亚大陆内部三大板块间相互关系的一举一动始终与美国——这个身处欧亚大陆之外的“世界安全岛”，同时又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实体——息息相关。欧盟，是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伙伴；俄罗斯，是当今唯一能与美国匹敌的军事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当今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三大板块中任何一方自身体量的消长，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改变，都会引起美国的巨大反响。更不必说，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三大板块之间的接近与合作一旦加强，美国更是会超乎寻常地做出应对。尤其是当美国意识到自身对世界局势的掌控已远不如以往，而“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也大不如前的时候，它对于中、俄、欧三方间相互关系的走向，不言而喻地会格外敏感。

其二，从地缘政治因素将会恒久地作用于国际政治变化这一定则来看，海洋地缘政治与大陆地缘政治的差异和惯性，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国关系。大陆地缘政治凭借陆地空间相互连续的优势，便于形成互相连接的大陆政治经济合作。而海洋地缘政治以空间的非连续性为其基本特点，可凭身处遥远海外的优势，回应欧亚大陆内部的种种聚合分离及其对外部的影响；甚至，海外力量不必要大规模直接介入大陆内部的利益分配，只需在大陆各个板块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加上一个砝码，就能很容易地改变态势，使之有利于海外地缘政治态势。马克思在其名著《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曾提出，取得制海权后，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另一个海洋强国崛起，并且在大陆国家之间维持均势。^①马克思通过英国案例对海陆地缘政治特性的这一判断，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此后历史演变的重要凭借。

其三，21世纪以来，多次实践证明，一旦中、俄、欧相互接近的态势出现，美国一定会出手阻断。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旨在打击中东反美势力，控制能源产地，同时也意在敲山震虎，以期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打进“楔子”，离间二者关系。^②在此背景之下，当时出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三驾马车同时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抵制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一幕。当时中国也坚决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

① [德]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9页。

② 冯绍雷：“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战争。可见欧亚大陆各大板块的聚合水平，始终反映着海洋与大陆两种地缘政治模式博弈的态势。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经营中、俄、欧三角关系可能是中国外交在 21 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①伊拉克战争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一方面，北约与欧盟维持东扩的惯性，策动“颜色革命”；另一方面，21 世纪初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俄罗斯带来了经济振兴。强人普京聚合民意，不甘忍受西方压力，反呈强硬对抗的局面。

当下，类似于 2003 年伊拉克战争这样带有深刻海陆地缘政治色彩的较量，也在反复发生。（1）特朗普上台后一再宣布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但一直难以脱身。相反，美国还大张旗鼓地介入中东的阿以之争，同时与伊朗紧张军事对峙，这说明海洋地缘政治力量决不会放弃对大陆内部政治经济走势的干预和影响，甚至企图利用欧亚大陆内部这种不均衡状态为自己谋利。（2）2019 年起，美国反导系统在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进行部署（反导系统是以美国名义而不是以北约名义在欧洲部署）。这一部署表面上说是为了对付伊朗，实际上毫无疑问直指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同时也大大制约西欧的走向。而 2020 年 6 月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的部分美军调往波兰部署，则更是明显地以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为由，既施压德国，又威慑俄罗斯，还讨好波兰。这一箭多雕，历来是海外势力介入大陆地缘政治的传统手法。

（3）近两年来，围绕 5G 和华为问题反映出来的欧美间不同立场，以及围绕欧俄能源合作表现出来的尖锐分歧，表明美国不惜赤膊上阵，孤注一掷，也充分说明美欧间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深刻反差。（4）2019 年 5 月下旬的欧洲议会选举显示，传统政党力量有所削弱，自由党与绿党崛起，欧洲各地选举版图进一步碎片化。有学者指出，对于美国而言，在以下三个假设性选项——袖手旁观让欧洲自生自灭、积极介入让欧盟为美所用、粗暴干涉让欧盟加速崩溃——中，特朗普很有可能采取“袖手旁观、釜底抽薪、加上积极介入的策略”。^②总之，一有风吹草动，欧亚大陆出现聚合与分离态势，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和多方干预。

① 相兰欣：“互动中的中、美、欧、俄四极关系”，《动态与分析》（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亚欧研究中心内参），2000 年 9 月 6 日。

② 崔洪建：“欧洲外交未来风险敞口有多大”，《环球时报》，2019 年 5 月 29 日。

（二）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因素

欧亚大陆三大板块之间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强化的身份认同，始终牵制着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近。

意识形态问题，首先反映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与欧盟间的相互关系上。总体上说，欧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但是始终声明欧盟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欧盟与中国都支持多边主义立场，但是欧盟一直认为这两种多边主义政策基于对原则问题的不同理解。在应对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上，欧盟不主张对中国过度施压，但还是同意成员国中止与香港的引渡法案。2014年中国与欧盟宣布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但2016年以后，欧方对此很少主动提及；2019年后欧方单方面对中国提出“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的说法。^①德国从2020年7月1日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其总理默克尔表示，“中国的例子显示，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也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对我们自由民主政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②令人十分感慨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中国与欧洲间曾经以“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关系”这一命题大步走出冷战对抗的阴影，如今虽难言时光倒流，但是意识形态的老调重弹，却严重掣肘了双方接近与合作的进程。

地缘政治问题，突出体现在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相互关系上。其一，放弃意识形态立场，未必能够避免地缘政治打压。冷战终结后，作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继承者俄罗斯放弃了原有意识形态，但美国从未因此停止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打压。其二，国家建构与地缘政治互相交织而强化。面对苏联地区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作为地区力量中心的原有大国（俄罗斯），也处于国家体制重构的过程中，这时便出现了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两重因素复杂的相互交织。国家建构要求明确自身政治边界，固化自身的直接管辖与周边势力范围；而大陆地缘政治空间延续性的特征，使各比邻政治单位间的历史联系难以割断。其三，帝国惯性与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认同张力。历史地看，在欧亚大陆千年复杂历史进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疆

① 黄静：“欧洲中国观的变化”，《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20年7月8日。

② 同上。

界并不清晰的现实，反倒是历史的常态。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各自作为原宗主国）对乌克兰东拉西扯的争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各大板块内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或是与身份认同紧密关联，或是间接折射，但都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相互关系。以欧盟一体化为例，它的区域化进程历史最为长久，经验最为丰富。但无论是难民危机还是英国脱欧，也无论是新冠疫情袭来后各国对自身安全的维护，还是欧盟为加强整体救助能力所进行的努力，种种事态揭示出欧盟内部国家自主性和地区一体化进程这二者之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而这还只是刚刚露出的冰山一角。

至于欧亚经济联盟，这是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困顿的条件下建成的区域合作组织。尽管以欧盟为模版，然而主权国家依然是其底色。在欧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不光有关主权让渡水平的争议依然牵制着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而且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在不同地缘政治经济与身份认同考量下的内外多方博弈，也影响着欧亚经济联盟的走向。其中的一类变化是，一旦热点冲突发生，比如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克里米亚归属变化，国际媒体便马上敏感地关注到俄罗斯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变化。2020年8月白俄罗斯因大选而出现的动荡局势，以及欧盟公开支持反对派，反映出欧盟与俄罗斯及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不仅在国家建构理念方面，而且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对立。另一类变化是，近年来中亚五国内部自主合作进程有所加强，一向被视为难题的各国政治交替过程则显示出较为稳健的态势。同时，中亚发展多方向外交与跨地区战略合作的抱负也有所提升。这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凝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有一类变化是，从欧亚经济联盟外部来看，美国在形式上改变了“颜色革命”时期所惯用的“政权更替式”令中亚各国不安的战略路径，而是以“支持中亚五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新的政策口径。2015年“C5+1”模式确立后，美国大力加强与中亚五国、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美国对中亚政策的调整，显然是期待在介入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时发挥更显著的作用。^①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欧亚经济联盟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омощника Госсекретаря СШ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Юж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Элис Уэллс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Ташкент, Узбекистан. 27 февраля 2019 г.

（三）不同区域进程的对接

三种区域进程相互交织，却又各自结构差异巨大，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对接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渐进积累过程，难免会出现反复和曲折，尤须作长期艰苦努力的准备。

从三大板块中的各组双边合作的实际进程来看，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确认通过“对接”来推进合作。这一政治意愿的表达和确认，为未来合作留下了极大空间，双方也有足够的资源与智慧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接”的全面实施将会是一个长期磨合和逐步推进的复杂过程。“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互联互通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项目，而且还是一个长时段、多领域、富于人文含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无论是铁路轨距的宽窄、还是园区建设的定位，也无论是银行贷款的利率选择、还是企业员工的当地化水平，都关系到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复杂的经济利益、社会心态、政治文化、安全认知等各方面的考量。这远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2019年10月25日，李克强总理和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总理共同发表“关于2018年5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生效的联合声明”，其中的关键内容是：逐步按照WTO原则来处理争议，构建未来“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从而将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从项目推进提升到一个体制共建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即便如此，中国与欧亚国家之间也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通过从“构建规则”逐步向“构建体制”的艰苦过渡，才能够真正使“扩员”“对接”有所推进，特别是在大国关系激变、疫情冲击等突如其来的新形势下，在探索与实践中去解决多边利益、多领域交织的复杂问题。

中国与欧盟之间呈现出来的是反复曲折的竞争与合作过程。21世纪中欧合作从来都是在一波三折中向前行进的。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欧关系的发展。2001年和2003年中欧分别宣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后，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了欧盟在全球唯一增长的出口市场。一直到2016年，在停顿十余年之后，欧盟再次发布对华政策文件，规划对华战略。2018年

中国发布最新对欧政策文件，呼应欧盟对华合作的愿望。^①就近两年而言，2019年3-4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虽然过程极其复杂，但对于合作的期待还是更主导的方面。临到2019年中欧峰会即将举行前，不仅欧洲舆论放出此次峰会不会达成协议和不公布联合声明的口风，而且欧盟委员会更是在3月12日发表措辞强硬的“十点声明”，前所未有地指认中国是“在追求技术领导地位过程中的经济对手”，是“谋求可取代性治理模式的制度竞争者”。但是，中欧最终还是发布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联合声明。^②2020年6月，在疫情冲击的非常形势下，中欧双方举行视频峰会，释放出力争在2020年底前达成被舆论视为中欧经贸关系2.0版的中欧投资协定的积极信号。不言而喻，这一进程始终十分艰难。一方面，欧盟抓住机遇，顶住内外压力，期待改变现状。但另一方面，欧盟的对华认知总体上仍处于相当矛盾和纠结的十字路口：既想强硬对华施压，但实际利益又对其深深制约；既想在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问题上与华纠缠，但又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瞻前顾后、动摇不定，将会是欧盟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难以避免的态度。

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较为正式的互动，还在等待突破的时机。按照欧洲改革中心专家邦德的看法，欧盟虽然意识到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存在，但始终在怀疑这一进程可能更多是一个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影响范围之内的项目，而不是伙伴间的平等合作项目。^③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这两大板块尽管在成员国水平上建立了大量正式交往关系（包括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但是两大联盟组织之间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合作条约。2020年6月30日，欧盟以“黑客入侵”为由，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一直要到2021年1月30日。俄罗斯则决定以牙还牙，进行反制。与此同时，欧盟与中亚地区的经济政治联系多年来并未中断。2019年5月19日，欧盟以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名义发布《欧盟与中亚：更坚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正式文件。该文件并没有排除人权等传统议题，但强调“基于强劲相互利益的长期

① 丁纯等：“改革开放以来中欧外交、经贸关系40年回顾”，载于徐明棋主编：《多重挑战下的欧盟及其对外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

② “Commission reviews relations with China, proposes 10 actions”, EU, Brussels, March 12, 2019.

③ Ian Bond, “The EU,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One Belt, One Road: Can They Work Together?”

伙伴关系”，重申与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关注通过交通运输、贸易投资、边境管理等方面的事务加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紧密纽带。^①欧盟与中亚的双边合作，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未来可能的中、俄、欧之间的总体多边合作框架，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俄罗斯依然处于欧盟国家经济制裁的严峻态势之下，而当下的白俄罗斯危机几乎是火上浇油，冲击着期待调整的俄欧关系。总之，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互动何时启动，尚需时日进行观察。此外，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合作，长期是二者之间稳定关系的基石。21世纪以来，“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推进，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能源合作开辟了一个很大的交往空间。但特朗普言之凿凿地警告俄欧能源合作将会带来问题，蓬佩奥于2020年春、夏接连访问中东欧诸国，显然刻意要在俄欧之间打进“楔子”。

总之，以上种种复杂因素，深刻影响着欧亚大陆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互动与趋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三者之间的合作远非轻而易举。

五、“一带一路”对三边互动的意义与影响路径

如上所述，欧亚大陆三大主体间既存在互相接近与合作的强劲趋势与潜能，又面临着阻碍和牵制它们进一步走进的一系列障碍。正是由于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局面与趋势，如何调处三大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这一项宏大决策的关键性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凸显出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一）“一带一路”凸显联通与互补的重要价值

冷战结束以后，欧亚大陆诸多力量中心曾尝试通过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构建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成败利弊引人反思。一种是“民主扩张式”的区域连接。北约与欧盟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推动制度转型和扩大成员国的进程，其作用虽然因地制宜，不尽相同，但这一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伴有排他性、差等结构式的跨区域过程，引发欧美与“被转型”国家间的不少问题。21

^①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May 15, 2019.

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多次危机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证明，西方排他式区域建构无节制地扩展，导致各方对立，在欧亚国家内部及东西方相互关系中，带来了深重的后遗症。乌克兰危机后，不但俄罗斯等国对这一模式尖锐批评，就连欧盟国家自己也开始对此进行反思。^①

另一种连接是“传统纽带式”的区域聚合。欧亚经济联盟力求运用原苏联传统基础设施、经济与人文关系纽带，发掘该地区的合作潜能，模仿欧盟推进一体化。但问题是，由于地处内陆的地理条件，欧亚经济联盟的对外交往受到限制，而其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模式也日益显出弊端。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阴影始终难以消散，因此成员国既保持同俄罗斯的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多边外交，欧亚经济联盟内聚力始终受到考验。因克里米亚危机，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尚未恢复交往，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也还刚刚开始。因此，欧亚经济联盟发展空间的稳定与巩固，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努力。

再一种连接方式是“多元并存式”的区域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跨区域进程，主张不同历史文明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力和发展程度的各国之间，平等友好相处，互利共赢发展。此类模式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如何在“非均质”的成员国之间有效推进合作，在实践中要比理论上和想象中艰难得多。问题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外溢效应”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中国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地带，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需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合作。问题之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扩员之后），令该组织在发展方向的选择、成员国内部关系的协调等方面，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制度化过程。因上合组织的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特性，有机会使得各成员国能够在一个自己创造的新兴国家地区组织中相互适应，合作成长；但在当前的变局之下，上合组织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和落地——特别是面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带推进有效合作——尚需新的动力与路径。

上述对欧亚大陆三大区域建构的冷静思考和评估，有助于探寻当代大变

^① 佟巍：“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周边治理的理念与实践”，载于周弘等主编：《欧盟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局下更为理性务实的相互连接和接近的新路径。

从形式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具备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那样的区域体制构建。如何与上述两种具有较为明确而固定体制构建的区域进程交往与合作，还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需要重点加以思考的是：

第一，欧盟和以其为楷模的欧亚经济联盟乃是区域合作建构中的“同质进程”。但是“同质结构”并没有排除它们相互间也完全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正面对抗。原因在于，现有的区域进程建构没能解决两大板块之间、特别是在两大板块的交错部分——比如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乌克兰——的利益切割与竞争问题。

第二，欧盟与俄罗斯两大区域建构之间虽然在经济结构上相互依赖，但是这种结构上相互依赖性的实现，还需要兼顾内部和外部的数量复杂因素。2014年后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说明在这两大区域建构之间互补潜能的存在，但又完全不排除同时还有着“对冲性”张力。

第三，事实表明，问题并不在于需要合作的各个地区间是否具有相似的区域制度构建。经验证明的恰好是相反的事实：即使制度相似，一旦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相悖，仍孕育着非常巨大的冲突风险。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当今欧亚大陆各大主体间的交往，需要通过非传统的区域构建安排，开创一种新的跨文明共同体式的交往路径，超越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的人为排他性因素，避免仅仅以单一文明单位来区分彼此。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跨区域性制度构建、多元文明交往、非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非排他性等特点，可以成为欧亚大陆各板块间平等交往与互利合作的有效路径。

（二）“一带一路”以独特的体制创新服务于既定秩序的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没有提出关于未来区域体制构建的具体预设，但是在几年来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辅佐性的体制机制安排，旨在对现有秩序起到完善和改革的作用。

1. 以现有机构的示范效果，助力欧亚合作机制的演进

中国与 100 多个国家共同创设的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合作机构，正在为欧亚合作提供机制上的铺垫。亚投行以其开放合作的价值观、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公平有效的贷款项目管

理，不光吸引了英、德、法、意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加入，而且还在 2017 年获得三大国际金融评估机构 AAA 最高信用等级。亚投行在未来欧亚三大板块合作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在笔者参加过的有关欧亚大陆多边合作的国际研讨中，经常被提及的观点是，中亚可能是这一宏大合作进程成败与否的关键区域。有鉴于此，来自欧洲、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法比恩·博苏伊特主张从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介入，来探讨欧亚接近与合作的路径。她提出，“在实践层面上，短期内以‘混合’的形式进行合作：针对某个项目，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外，欧盟可以提供一笔赠款，不足部分再由亚投行的贷款补充。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与亚投行共同为中亚地区的项目提供过贷款。由于欧盟经常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中亚地区合作，也认为亚投行是符合国际规范的可靠合作伙伴，因此，作为小规模试验的这一做法，可以推动今后更大规模的联合融资计划。”她又补充道，“从长远来看，欧盟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之间的直接合作也是可能的。一些合作已经开始了，比如在欧洲投资基金和丝路基金支持下的‘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旨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容克计划’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中期，欧盟与中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直接合作可能在中亚地区成为现实。”^①从长期效果看，这样的投融资合作机制势必推动制度层面的互动、开放、合作的逐步深化。

2. “17+1”：创设新型的多边合作平台

2019 年中欧峰会期间，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间的磋商平台进一步拓展，在希腊加入后成为“17+1”。尽管此前的 2019 年 2 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专访中东欧的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旨在对中俄等在该地区的合作施加压力^②，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中小国家间的合作进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欧盟还不能如在欧洲核心地区那样照顾到相对后进地区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存在弥补了这样的缺失。这既有利于欧盟

^① Fabienne Bossuyt, “Connecting Eurasia: Is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China, and the EU in Central Asia Possible?” May 30, 2019,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connecting-eurasia-is-cooperation-between-russia-china-and-the-eu-in-central-asia-possible/>

^② “US warns of Huawei’s growing influence over eastern Europe”, February 10,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09928e84-2be0-11e9-a5ab-ff8ef2b976c7>

均衡发展，促进欧盟团结，也成为中欧关系的有益补充。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还吸收了以金砖国家为核心带动周边合作的经验（“金砖+”机制），进一步向中东欧地区推广。比如，“17+1”机制中波兰的“三海倡议”，汇集了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周边的12个成员国，其中11个已经是“17+1”的成员。鉴于波兰不仅在当今欧盟事务中，而且在欧美关系中的作用也很独特，因此借助波兰在当地的现有网络，实现增益效应，是一项值得进一步尝试的举措。迄今为止，尽管欧洲舆论对此还存在争议，但“17+1”平台是在高度体制化的欧盟和相当务实灵活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进程之间，所形成的一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积累了多方谋求共同发展的意愿和创新实践。

（三）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关系调整的重大机遇

新冠疫情既对中、俄、欧三方造成巨大挑战，同时也带来三边关系调整与发展的重大机遇。一方面，美国面临疫情迁延传播而无法控制的局面，企图以“甩锅”中国、抹黑俄罗斯、打压欧盟等一系列手段，嫁祸于人。特朗普试图进一步以“脱钩”“退群”“制裁”等手段，大幅度毁坏多年来构建的建设性大国关系。从深层次看，特朗普政权的胡作非为，反映的是全球化进程遭逢逆转，欧美发达国家处于衰落中的全面调整期，助推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强势崛起。再加上国际疫情危机、能源金融动荡、大国关系紧张、文明与种族矛盾等综合性问题同时爆发，使得中、俄、欧诸大国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之中。另一方面，国际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美国的霸凌政策，在客观上又给中、俄、欧这三大板块的接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1. 美国的挑战行为

疫情期间，美国再一次同时挑战中、俄、欧三方，犯国际政治中企图“长臂施压”而伸展过度之大忌。本来，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签署，以及国际疫情的来临，为中美两大国的接近带来了机会。但是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经济阻遏和在南海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军事威胁，企图将中美关系拉回到尼克松访华之前的对抗状态。美俄关系本来是两国政治精英寄予厚望能够得到调整的一个领域，但是美国坚持要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一系

列美俄之间重要的双边军事安全条约，加上大选来临之际，所谓“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话题旧事重提，使得半年内普京与特朗普之间五次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通话，难见成果。美欧关系原本是处于力量不对称格局之下的西方盟友关系，在欧盟整体上处于弱勢的背景之下，面对美国在伊朗、古巴、国际刑事法院及国际气候问题上一系列对欧洲严重不利的举措，特别是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耳其溪”项目二线工程上美国的连续打压，欧方官员已经忍无可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声明，美国实施“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德国外长马斯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对参与“北溪2号”输气管道项目的相关企业实施制裁，欧洲能源政策应由欧洲制定。^①表面上看，美国出于疫情无法控制以及大选将临，特朗普政权方寸大乱，慌不择路，于是向中、俄、欧三大主体发难。实际上这是在国际大变局之下，美国霸权衰落，欧亚大陆三大主体势不可挡地趋于互相接近与合作这一态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2. 国际疫情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中欧班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中白工业园、5G 合作等大型标志性项目的成效。国际疫情期间，令人振奋的是，几乎上述所有项目在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面前，都有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

国际疫情下，全球贸易与交通运输量急剧下降。但“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依然增长了 11.7%，贸易额增长了 3.2%，其中不少得力于中欧班列的贡献。2020 年 1-4 月，中欧班列开行数与发货量同比上升 24%和 27%，累计运送了 8000 吨抗疫物资。^②

继 2019 年底中国承建和运营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完成 565 万标准集装箱（TEU）运输量，从而使得十年前濒临破产的该港口，如今已经跃升为地中海第一大港、欧洲第四大港。面对疫情，该港口坚决配合希腊政府的防疫举措，在严格管理之下，整个公司上千名中外员工无一人被感染。同时，2020

① “欧洲政策应该由欧洲决定”，《解放日报》，2020 年 7 月 19 日，第 3 版。

② 王毅：“中国与各国携手推进‘一带一路’的信心不减，决心未变”，新华网，2020 年 5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4/c_1210631791.htm

年 1-4 月比雷埃夫斯港三个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2%。^①

至于国际媒体多年关注的匈塞铁路项目，2020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匈牙利财政部签署了匈塞铁路匈牙利段贷款协议，标志着这条曾经被推迟多年的国际铁路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9 年 5 月，中匈企业联合体经过关键性的公开招标程序成为该项目的主承包商，并签署了工程总承包（EPC）合同。2020 年 5 月 19 日，匈牙利国民议会以 133 票赞成、58 票反对和 3 票弃权通过了匈塞铁路升级改造工程法案。这说明匈塞铁路完成了极其关键的一项法律程序。

中国最大的海外工业园区——中白工业园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正式宣布成为白俄罗斯首个 5G 应用技术试验平台，由华为白俄罗斯公司提供 5G 设备用于园区。该工业园区的 5G 项目试验，将推动无人机、无人车、无人仓库等一系列项目落地，并由白俄罗斯向周边地区推广。

在国际疫情不见好转的艰难形势下，“一带一路”大型标志性项目的显著推进，标志着中国与当地政府及合作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坚定决心，也说明即使在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一带一路”项目依然显现了巨大的潜能和影响力。

3.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俄欧长期合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带一路”大型标志性项目在国际疫情下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显示了其所蕴含的长时段作用与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成为欧亚大陆贯通南北东西贸易运输通道的重要铺垫。联通欧亚大陆两端的东亚与欧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目前，有三条贸易通道联通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第一条是传统航道，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地区，经南中国海，进入马六甲海峡，再经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苏伊士运河，横穿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北上西欧和北欧各个港口，然后通过陆路交通辐射整个欧洲。这是目前最主要的、以海运为主的贸易通道。第二条是中国近几年开辟出来的，从重庆、武汉、义乌等城市发出的中欧班列，经中亚、俄罗斯、东欧，然后到德国、奥地利等欧洲中心地区。显然，

^① “比港集装箱吞吐量 565 万，为中国与希腊合作注入新活力！”，搜狐网，2020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sohu.com/a/401089424_120145143

这一条贸易通道对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内陆国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第三条是中欧海陆快线，从中国港口出发，到达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通过建造中的匈塞铁路，经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中东欧国家，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这条海陆快线结合了海洋运输的低成本和铁路运输的时间优势：时间上比传统海运路线缩短 7-11 天，运营成本不到从中国发出的中欧班列的四分之一。^①短短几年，横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贸易通道从一条增加到三条，这显然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俄欧三方互联互通所做的重要铺垫。尤其重要的是，目前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运输通道日益活跃，但相比之下，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区，贯穿南北，连接波罗的海与地中海、黑海的交通干道，欧盟与俄罗斯虽都有期待，但却难以推进。在此背景下，从比雷埃夫斯港经过匈塞铁路而深入欧亚大陆的线路，不仅着重打通南北，而且能够将欧亚大陆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通道逐步连成一片。这不仅是欧亚大陆上中俄欧三方的共同愿景，而且势将深刻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空间态势。

其次，“一带一路”为跨国、跨领域、跨行业的超大型复杂项目提供积累。“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一个特点，在于促进了多国、多领域、多行业，在前所未有的宽广而复杂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方面，积累了经验。上述海陆快线通道，包含了比雷埃夫斯港和匈塞铁路两个大型项目。虽然这两个项目涉及许多国家与地区，但是由于对欧盟国家、特别是对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南欧、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欧盟和项目所在国都对项目立项给予高度重视，同时要求也十分严格。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与沟通，其中还包括 2016 年欧盟对于匈塞铁路项目的专门调查，历经重重考验，欧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项目。

2018 年 9 月，欧盟提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系统地阐述了欧盟对于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与实施路径，表示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加强合作。^②从现有文献看，海陆快线项目不仅关乎东西方十几个大小不

① 曲胜斌：“中欧海陆快线助力中欧‘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远洋海运》，2019 年第 9 期。

② 同上。

等、背景各异的国家，而且涉及海陆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国内法律事务、项目规划管理、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等异常纷繁复杂的跨国、跨行业、跨领域的知识与信息。毫无疑问，这一项目对于加强各国间的沟通与合作，对于优化各领域的复杂知识、信息和技术准备，对于促进这一复杂系统中各方的衔接，都有极大的好处。^①

再次，“一带一路”在推动欧亚大陆内部合作时，兼顾海外主体的公平参与。欧亚大陆的中俄欧三方合作能否得到推进的一个关键，乃是如何处理欧亚大陆之外的国际主体，特别是美国参与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在起步时就关注到了这一重要环节。例如，中白工业园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主导型工业园区，它是在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建立的一个中国在海外最大规模的工业园。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亲自下令给予 10 年免税和 99 年土地使用权的优惠待遇；习近平主席在 2010 年（时任国家副主席）和 2015 年先后两次到园区进行考察。到 2018 年 7 月，已有 36 家企业和机构入驻该园区。在这 36 家入驻单位中，除了有来自中国、白俄罗斯的企业，还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典、以色列、奥地利、立陶宛等国的企业与机构。德国企业作为园区股东，还拥有 0.67% 具有象征意义的股份。中白工业园区的这一开放式姿态，为以后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基础。^②

美国智库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一直有着不同的反应。其中不无带有疑虑甚至敌视的立场。比如，或是强调以“多边化加以应对”，或是主张“应与中国良性竞争”，“旨在重获基础设施项目上的主动权，并先发制人地保护战略上非常重要地区不受未来中国投资的影响”。^③同时，也有智库和学者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合作态度。比如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是协调

① 桑小川：“中国对欧港口投资的缺失与风险——以比雷埃夫斯港为例”，《国际论坛》，2019 年第 3 期；毕森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及港城关系变化分析”，《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李雄等：“中国企业投资进入希腊港口的启示”，《港工技术》，2020 年第 1 期；宋剑等：“境外铁路合作项目管理实践与探索”，《中国铁路》，2020 年第 3 期。

② Беларус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парков и особ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он//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Ноябрь 2018 г.

③ Amar Bhattacharya, David Dollar, Rush Doshi, et al., “China’s Belt and Road: The new geopolitics of glob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April 19, 2019.

欧亚大陆内部聚合与美国利益之间非常可能的有效途径。还可以包括在欧亚大陆以外的合作。比如，有学者建议，美国与澳、日、新等联手取得了价值 17 亿美元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电网项目，由于巴新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空间寻求与中国的合作。^①美国智库学者甚至开始讨论如何在“一带一路”比较关键的枢纽性区域寻找合作机会的问题。比如，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表的萨贝娜·西迪基的文章提出，中国和巴基斯坦双边合作开发的瓜达尔港开通，大大缩短了中国与中东、非洲之间贸易距离。因此，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近来也显示出参与瓜达尔港建设的巨大兴趣。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推进，那么，有人认为，这不但将大大提升瓜达尔港本身的国际开放度，而且也将撬动与沙特阿拉伯等有着传统伙伴关系的美国等大国的合作。^②

最后，“一带一路”经验有助于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交织发力和深化改革。自 2011 年 3 月“渝新欧”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的系统运行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该项目的目标之一，是打破欧亚地缘政治经济的国家间阻隔，缩短时空距离，推进跨国跨洲陆路运输的常态化和便利化。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已使这一目标显著地得以实现，其中包括，中方在疫情暴发后的 2020 年 2 月 24 日提出“海关-铁路运营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和快速通过伙伴合作计划”等十项举措。目标之二，是通过中欧班列来实现“磁场效应”，提升沿途城市的产业聚合和“溢出”效应。因“渝新欧”的启动，惠普、宏碁等笔记本电脑巨头落户重庆，从而使重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之一；因“蓉欧快铁”的开行，使得已在成都落户的戴尔、TCL、联想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因中欧班列的开通，德国的汉堡、杜伊斯堡，波兰的华沙、罗兹、马拉舍维奇，以及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城市进一步成为贸易集散枢纽。^③上述一系列事例表明，即使在国际疫情暴发和延续的情况下，中欧班列依然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新目标。一方面，要

① Parag Khanna, “Washington Is Dismi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That’s a Huge Strategic Mistak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30, 2019.

② Sabena Siddiqui, “Why Saudi Arabia Joining CPEC Matters”, *the Diplomat*, February 2, 2019.

③ 许英明、李鑫：“中欧班列对中欧经济地理的影响及展望”，《当代世界》，2020 年第 6 期。

克服中欧班列目前还存在的“通而不畅”“线路重复”“信息滞后”等缺陷，把研究国际规则与改革国内体制紧密结合起来。^①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战略对接的高度，真正实现把“大写意”落实到“工笔画”的要求，通过中欧班列串联各地的境外合作园区、加工基地、仓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基地，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合作；以中欧班列向欧亚大陆纵深地区延伸为契机，推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形成循环和两种改革的交织发力。

六、几点结论

（一）关于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的相互关系

以“一带一路”推动欧亚大陆三大主体的互相接近与合作，远非没有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安全，依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的现实障碍。在全球化受阻、欧洲感受到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成长的巨大压力背景下，当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泛滥之际，重祭意识形态大旗、重新强调西方意识形态联盟，甚至借重文明对抗与种族主义沉渣泛起，无疑成为西方一部分政治精英手中的“利器”。同时，欧亚大陆依然存在着诸如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等冲突热点。对此，还没有一种既能超越各方歧见、又切实有效的国际体制机制可以去应对和制止。“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复杂多变的国内政治与安全形势，更是带来了各种不确定因素。

越是存在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危机，就越是需要借助经济杠杆来进行调节，使得各方能有共处与合作的空间，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分歧与经济合作之间，并非互相隔离，恰恰相反，它们是紧密联系、并可以互相转化。即使一时难以改变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体制竞争，也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诸多场合一再强调，欧盟将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的立场，来处理对华关系。这意味着欧盟虽不放弃意识形态原则，但也不会奉行美国式的僵化立场，其目的就是为务实合作留下余地。以法国为例，与

^① 许英明、李鑫：“中欧班列对中欧经济地理的影响及展望”。

前政府主张对外武装干涉相比，现任总统马克龙认识到，“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对利比亚的干预战争是一个错误，干预的结果催生了失败国家，使其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①

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大国政治合作是各国间经济合作的基石。我们要强调的是，反过来说，经济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乃是欧亚大陆国家间政治与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冷战后期一直延续至今的欧俄能源合作基础设施网络——从横跨欧亚大陆的“友谊”输油管道到今天的“北溪 1 号”“北溪 2 号”——哪怕在大国间安全与政治形势危急的时刻，都还能起到难以替代的稳定作用，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在中美关系急速下滑的形势下，俄罗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再公开批评美国对华无理打压，明确主张避免中美冲突，承诺与中国的合作优先，坚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无可替代的稳定作用。同时，俄罗斯也表示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甘当“新世界秩序转型期的协调者”“新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②，也坚决不被用来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③这表明，几十年来中俄双方努力营建的经济合作网络，正在与其他因素一起，对稳定大国间的政治关系和安全形势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正值美国全力打压华为的高峰时刻，2020 年 8 月 11 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报道，德国政府部门认为无须设华为禁令。该报道称，这是来自总理府、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以及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的指示，不应从一开始就禁止华为供货。^④

德俄两国在中美关系滑坡的关键时刻所表明立场，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体现出当代国际政治安全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

① Interview d'Emmanuel Macron: "L'Europe n'est pas un supermarché", 转引自张骥：“开放的独立外交——2017 年法国总统大选与马克龙政府的外交政策”，载于徐明棋主编：《多重挑战下的欧盟及其对外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 年。

②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Москва, 2020.

③ Максим Стародубцев. Новая гармония: запад, восток и реальный мир. 4 июля 2020.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zapad-realnyj-mir/>

④ "5G-Netz: Deutsche Behörden halten Huawei-Verbot für nicht nötig", 08.11.2020, <https://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digitec/5g-netz-deutsche-behoerden-halten-huawei-verbot-fuer-nicht-noetig-16900177.html>

（二）国际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与调整

在 2020 年疫情暴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下降、产业链与供应链受阻、再加上美国蛮横打压中国的国际合作伙伴、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之下，全球瞩目于“一带一路”何去何从。从 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始，已经出现要把“一带一路”从“大写意”推进到“工笔画”的总体要求。对“一带一路”已有的发展规模和各类项目做一次梳理、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从产业链、供应链合理布局角度出发，集中资源和精力于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与国家的项目推进，十分必要。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两者继续相互促进的前提下，首先着力于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完全合乎时宜。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既有布局，特别是那些重大的标志性项目，不光影响巨大，而且也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突破与进展。在国际疫情的背景下，这些标志性项目与当地政府合作所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劲生命力和巨大价值。所以，在尊重当地利益与意愿，着眼于互联互通的共同愿景，值得继续提供足以保持其运行的投入与推动。

（三）关于“一带一路”推进中的体制、机制和规则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带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也不提倡经济利益相互孤立和相互隔绝的区域构建，但这并不是说，“一带一路”倡议就不需要任何体制与机制的支撑。笔者认为，事实表明，首先，“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已经和正在形成一系列为各方所接受、逐渐趋于成熟的双边或多边体制、机制和规则。这并非一个是否需要的问题，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约定俗成地形成的体制、机制和规则。比如，2016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的《G20 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2017 年 5 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27 国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019 年 10 月“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所确认的引入 WTO 规则。还比如，上述“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不仅在推进方面，而且在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境外园区建设、各国通关、国际运输、国际税收等各个领域的建章立制所提供的广泛积累，都是“一带一路”带动了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和规则构建的例证。其次，由于“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广

泛领域与地域，所发生的复杂多样的实践，尤其是因为“一带一路”本身所具有的国际合作倡议的特性，因此这些体制、机制和规则的形成，必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反复曲折又自然而然的、也是志同道合者经过长期合作而成型的过程。现有各领域的建章立制既不能照搬西方，又不能单边强制，而必须是多方酝酿合力产生的。因此，对于这一过程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充满博弈与反复，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最后，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体制、机制和规则的形成过程不是单边强制的，更不是强力胁迫的，但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是需要花极大功夫去实现突破的。从当下看，“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①

“一带一路”的推进，犹如中国古典思想所说的“上善若水”，灵活流动，无处不在，高度活力，以亲和、合作为本。但是这一国际合作倡议并非毫无章法与约束，也并非完全任其自然发展而毫不顾及未来国际与地区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一带一路”以其各种功能，既可以穿行在欧亚大陆不同的区域体制之间，成为连接各个国家的交往管道；同时，也必定会在共同利益之上，在经过长时间努力建立起来的体制、机制和规则之下，推动互联互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目标适宜、小步推进、避免冲突、求同存异、非排他性的建构方式，能够为推进欧亚合作乃至未来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Abstract】 The three regional process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iffer in historical, cultural backgrounds, ideologies and dominant political concepts, in addition to levels and speeds of thei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se three main bodies also seek to approach and cooperate. The motivation for the rapprochement among these three major plates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originates not only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structural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forces, but also from profound perceptual changes. Undoubtedly, there also

^① 李向阳：“‘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

exist considerable obstacles and constraints on cooperation among these three main bodies. It i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it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long-term value. With its various func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ld travel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systems in Eurasia and become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connecting various countries. Meanwhile, the interconnectivity will definitely be promoted through mechanisms and rules establish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ffort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is approach, with appropriate goals, by advancing in small steps, avoiding conflicts,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exclusive construction means, could make due contribu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Eurasian cooperation and even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Key Words】 China-Russia-Europ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Аннотация】 Тр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цесса —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и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 имеют раз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рни, разные идеологии и доминирующ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а также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разных уровнях и скоростях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днако эти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актора также стремятся к сближению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сближения этих трёх основных «плит»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фера, но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роста и пад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л, а также глубокие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Конечно, близость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тремя основными акторами также созда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выявила своё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Обладая различными функциями,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может перемещатьс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в Евразии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каналом связи, соединяющим разные стран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н,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общих интересах, механизмах и правилах,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после долг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апряжённой работы,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заимосвязям. В обозримом будущем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целей, продвижению небольшими шагами, избеганию конфликтов, поиску точек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а не взаимоисключении, может внести должны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будущег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责任编辑 崔 珩)

俄罗斯政治外交新动向

俄罗斯的政治结构及发展趋势 ——2020年宪法修改前后的比较*

费海汀**

【内容提要】当前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而是“总统-三权”二元结构。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主体，通过会议咨询机构、办事机构和政党系统等方式，对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支系实现了领导与控制。可以根据结构性权力与程序性权力两个标准，对俄罗斯政治体制加以分析。结构性权力包括产生方式和任免能力；程序性权力包括工作机制和人事组织。2020年修宪只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关系的调整，不涉及“总统-三权”二元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变动。其总体趋势是在维持并巩固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削弱可能造成权力机构间对抗与冲突的硬性结构性权力，同时加强权力机构间协商互动的软性程序性权力。未来，从结构的角，总统将具有更加超然的地位，总体协调三大权力机构的工作；从事权的角，总统与联邦委员会将主控国家大政方针，而国家杜马和政府总理将为治理绩效承担更大的责任。俄罗斯政治体制将会延续总统与总理之间“政治-行政”区分的二元格局，并使“政治-行政”的区分更加清晰，而非改换为总统、总理或议会独大的一元结构。在政治体制的变动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总统、总理与议会多数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俄罗斯新宪法 俄罗斯政治结构 俄罗斯政治发展 俄罗斯总统

【中图分类号】D8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4-0061(2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苏联-俄罗斯政治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 19CKS016)的阶段成果。

** 费海汀,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青年研究员。

2020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提出要对现行宪法进行七个方面的补充修改。随后，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关于宪法修订等内容，经讨论通过后，将对权力平衡和行政、立法、司法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联邦政府应该给总统做出一切必要决定的机会。^①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俄罗斯宪法第117条，梅德韦杰夫宣布现任政府集体辞职。随后，宪法修改草案进入杜马审读程序。经过修改之后，新的宪法草案2020年3月由杜马三读通过，7月举行全民公投，最终以67.97%的投票率和77.92%的支持率获得通过。^②

2020年宪法修改涵盖了俄罗斯政治体系的诸多重要方面，因此可以预见将对俄罗斯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普京的政治改革措施即将产生的效果以及未来俄罗斯政治的大体走向，势必需要结合当前俄罗斯的政治结构进行分析。理解当前及未来俄罗斯政治的关键，在于对三个问题做出回答：其一，当前俄罗斯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其二，在宪法修改之后，这一政治体制是否会出现变化？其三，具体权力结构、制度和程序的变化，提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怎样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本文尝试对俄罗斯2020年宪法修改前后的政治结构进行比较，以便为更加系统地分析俄罗斯政治体系的运转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一、导论

（一）政治体制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有学者认定为超级总统制，有学者倾向于将其界定为三权分立。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两种体制在俄罗斯并存，并出现了混合，由此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政治结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根据俄罗斯宪法的规定，联邦总统并不属于三权中的任何一权^③，因此不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行政首脑。所以，当前俄罗斯的

① Медведев объяснил неожиданную отставк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19 января 2020. <https://ria.ru/20200119/1563597060.html>

② Поправки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ссии вступают в силу// ИТАР-ТАСС. 4 июля 2020. <https://tass.ru/politika/8884687>

③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11. <http://constitution.kremlin.ru/>

政治结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在联邦总统治下的三权分立。

1990年10月12日，由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委员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第一部宪法草案，取消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国家权力机关体制，确立三权分立原则。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联邦议会、总统、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1993年11月10日公布了以法国式半总统制为蓝本的第四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12月12日，宪法草案通过，即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权力，由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政府、联邦法院共同行使。

鉴于联邦总统在整个政治体系中极其特殊的地位，因此，俄罗斯也被学界认为采用了“超级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半总统制是由迪韦尔热提出的定义法国政治体制的概念。其特征是：同时设置总统与总理，其中总统民选，而不是由议会选出；民选总统提名总理。^①凯里和舒格特则将半总统制划分为两个子概念：（1）总统-议会制，即总理由总统提名并由议会通过；（2）总理-总统制，即总理由议会提名，然后经由总统任命。^②根据松里公孝的总结，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民主国家都选择了半总统制；在32个苏东国家中，只有2个选择总统制，6个选择议会制，其余的24个国家都选择了半总统制。在各种原因之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半总统制和原苏东国家党和政府二元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相似性。

将半总统制与苏东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对比，存在着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半总统制的特征在于同时存在总统与总理双重设置，二者之间的职责分工则是依据“政治-行政”的标准。总统负责国家整体的战略规划与宏观决策，总理则作为行政机关首脑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以及战略与规划的实施。而根据乔纳蒂的归纳，苏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是在

① [日]松里公孝：“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37页。

② Matthew S. Shugart, John M.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转引自[日]松里公孝：“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第37页。

国家的行政官僚科层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立的政党科层。两个科层通过互连线相互联系，同时政党也通过互连线完成对行政官僚科层的领导与控制。^①这一体制也被乔纳蒂归纳为“政党-国家”体制。由此可见，二者的相似之处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存在一个独立于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权力主体；其二，这一权力主体通过功能、机构、机制、人员或/和组织的方式，影响国家权力各个分支，特别是行政官僚科层。

对于俄罗斯，这两个特征无疑都具备。从独立权力主体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是联邦总统。从制度层面看，联邦总统不属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支系中的任何一系，但又与联邦政府、联邦会议和联邦法院共同构成、执掌与行使国家权力。从实践层面看，虽然理论上联邦法院和联邦会议共同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但由于条件苛刻，这一权力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俄罗斯联邦总统及其附属机构，是独立于三个权力支系、特别是独立于俄罗斯联邦政府这一行政机关的权力主体。

从影响行政官僚科层的角度来说，俄罗斯联邦总统也正是通过功能、机构、机制、人员和组织的方式，领导和控制联邦政府。其一，在功能方面，由于总统负责国家整体的政治决策，所以俄罗斯国家的大政方针实际上都出自总统，总统直接领导总理及部分行政机关。总统同时具有向国家杜马提出法律草案和批准、公布法律的权力。同样，由于总统有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因而也拥有部分法律解释的权力。其二，为了使领导权力得以实现，俄罗斯总统建立了一系列直属权力机构，至少包括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全权代表机构、直属办事机构、直属国家机关四个类别。^②由于是总统权力的延展，因此这四类机构同样也不归属于行政、立法、司法的任一支系管辖。其三，总统通过其主要的咨询机构，如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和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等，会同联邦政府主席团、联邦会议首脑及总统指定人员，共同决定国家政策。这些咨询性机构或会议，实际上成了俄罗斯的决策中心。其四，

① [匈]玛利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李陈华、许敏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② 参见宋锦海：“俄罗斯总统-议会制建设中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7期，第3-5页；刘向文、王惠敏：“谈俄罗斯联邦总统活动的保障体系”，《今日东欧中亚》，1999年第4期，第3-5页。

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联邦政府的行政官员，也可以通过政党影响联邦议会成员的构成，还可以通过与联邦委员会的协商影响联邦法院的人员构成。

需要注意的是，“总统-三权”体制与“政党-国家”体制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总统能通过咨询会议、办事机构、全权代表和国家机关对国家层面的各权力支系施加影响，但单纯通过全权代表和联邦区的方式影响地方事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与“政党-国家”通过一个庞大、严密的政党系统获得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的全面影响力难以同日而语。在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中，暂时充当这一工具的是议会多数党，即统一俄罗斯党。总统通过控制议会多数党、放开对行政官员入党的限制，使地方到基层的官员同时也具有多数党党员的身份，以此来实现对央、地各权力层级的控制。

因此，俄罗斯总统作为一个政治机构，不能简单视作一个人，而应视为一个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特别是政府行政官僚体制之外的权力主体，同时又是一个能领导、控制和影响整个政治局面的权力体系。当前，俄罗斯存在“总统-三权”双重体系的二元政治体制。

（二）政治权力

从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特征可以看出，俄罗斯各权力主体所保有的政治权力，并非仅限于制度和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政治权力是一个复杂且综合的概念。通过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往往不难对政治权力的边界和种类进行静态描述。但在现实政治中，政治权力常常产生于多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例如选举、议会斗争、政策制定、人事任免等。它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一个恒定的量，因而很难对其进行此消彼长的量化分析。不过，政治学依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上的调整，对政治权力的增强和削弱进行动态呈现。政治权力的分析通常可以遵循结构和程序两个标准，对现实政治中的制度权力和实际权力进行描述。

结构（或形式）权力主要表现为既定制度中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以及各权力分支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权力的视角主要用于分析某一特定的政治机构在整个政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因此结构权力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产生方式；其二，任免能力。产生方式是指特定政治机构在既定制度框架中的产生、组建和构成方式，主要包括选

举、任命等。衡量这一内容的关键，在于机构的产生是否受到其他政治机构的影响和制约。影响能力主要是指特定政治机构在既定制度框架中，影响其他政治机构任免情况的能力，常见方式包括任命、解散、弹劾、驳回其他政治机构的任职诉求。衡量这一内容的关键，在于特定政治机构是否能够决定、影响或制约其他政治机构的产生。产生方式越是自主，影响能力越大，政治机构的自主性就越强，在整个政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就越重要，相对应的政治能力就越强。例如，总统是通过普选产生还是议会（或类似议会的机构如苏维埃）选举产生，其自主能力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是否能影响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及其人员的任免，其影响能力也会存在显著的区别。在影响能力当中也常会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提名权和解职权。二者对其他政治机构的影响程度和侧重也有不同。提名权与政治激励相关，通常决定人员的获职和晋升；解职权则常与权力更替相关，往往决定人员的去职和贬职。因此，提名权更多影响执政主张，解职权更多影响执政绩效。

程序（或实际）权力主要表现为，现实政治中不同权力分支在互动过程中所处的实际地位。程序权力的视角，主要用于分析某一特定的政治机构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影响其他政治机构行为活动的能力。因此，程序权力至少包括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可描述为工作机制和人事组织。工作机制主要是指特定政治机构对其他政治机构活动的直接影响能力，主要包括会议、协商、竞争、投票、否决等。衡量这一内容的关键在于，特定政治机构在与其他政治机构的既有交互过程和决策程序中，是否能直接促成或阻止其他机构的行为和活动。而在政治程序特别是决策程序中，所处的位置越接近决策末端，其影响力就越大。人事组织主要是指特定政治机构对其他政治机构活动的间接影响能力。在国家权力层面，任何一个政治机构都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组成的，而是包括一系列人员、组织、团体和机制。因此，一个政治机构很可能通过影响、控制、干涉其他政治机构人员或组织的方式，促成或阻止其他机构的行动。决策能力越大、越能影响其他机构的工作，那么，某一政治机构的政治权力就越大，它在政治程序中所处的位置就越重要。例如，在总统与总理的分工中，一种情况是总统赋权总理进行直接决策，总统本人不加干涉；另一种情况则是总统通过各种会

议的方式会同各权力支系首脑进行决策，总理只负责执行决策。后一种情况下，总统的程序性权力要显著大于前一种情况。另外，是总统具有法律的提案权和否决权，还是议会完全垄断立法领域的权力，这对总统的权力也有显著影响。同时，议会中是否有多数党，多数党是否支持总统，总统对多数党有何种程度的控制能力，都对总统的实际权力有着重要影响。

结构性权力是制度中的硬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规则和互动中形成的权力，相对而言可描述为软性权力。程序性权力能使权力主体通过对程序的设置与变更，避开或减少与其他权力主体的直接对抗。例如，按照正常程序，决策应该由总统做出，总理施行，议会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决策产生间接影响。但这一正式程序，很可能因为总统、行政与立法机关之间缺乏沟通，导致政策缺乏法律基础，而议会又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限制政策的实施，造成总统、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直接对抗。总统则可以通过前置一个决策程序，预先会同总理、联邦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进行四人会议，使协商、竞争、冲突、妥协都发生在更小、更可控的范围内，而不必直接在大规模的争论中决策。再比如，如果按照正式程序，总统即使具有法律的提案权，其提案也必须交由杜马广泛讨论才能通过，这就使得总统所提草案通过的效率大大降低。而如果总统可以通过影响议会多数党，使法案首先在政党内部甚至更小的政党最高委员会数十人内部取得共识，不需直接进行全面而复杂的议会斗争来影响立法机构活动，从而避免总统、行政和立法机关之间的直接碰撞。

程序性权力的形成，实际上是结构性权力在社会转型期间落实的结果。结构性权力从制度上确定了总统的特殊地位。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更换宪法，司法机关力量不足，加上总统通过议会多数党对立法机关的整合，这就使总统切实掌握了强大的程序性权力。

二、俄罗斯总统权力体系的形成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并非是单纯的三权分立，因此，研究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理解附属于联邦总统的权力体系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一是，总统凌驾其上、游离于其外的政治权力如何得以体系化地落

实；二是，三权之外的总统权力体系如何领导、控制与影响三权体系。

俄罗斯总统权力体系的建构，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叶利钦执政时期与 21 世纪初普京执政初期。可简述为，叶利钦完成了总统权力体系框架的建构，普京则完成了总统权力体系对三权体系的控制。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总统权力体系的建构并没有清晰的计划与路线图，而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在权力支系之间的对抗冲突中逐渐定型的。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机构、总统直属办事机构和政党体系，是总统权力体系中的三个重要部分。

（一）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机构

俄罗斯总统会议咨询机构是在一系列单纯咨询机构的建立和废止过程中，逐步分化、演变、发展成为俄罗斯国家决策中心的。当前，总统通过有政府首脑、联邦主体首脑、立法机关首脑参加的各种重要会议咨询机构，牢牢地掌控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

这类咨询机构最早可追溯到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建立的总统委员会（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совет）。最初，苏联国家的决策中心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特别是转任苏联总统后，不能再将其作为协商与决策平台，于是组建了总统委员会，涵盖一些重要的政府成员，如部长会议主席、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文化部长等，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家、科学家、作家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①这一机构已经与苏共体系内的政治局完全不同，人员立场高度冲突，因此只能将其视作一个简单的咨询协商机构，而非决策中心。1991 年以后，叶利钦继承了这一机构，更名为总统咨询委员会（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ый совет）。1993 年，恢复总统委员会名称，负责为总统提供内政与外交方面，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战略建议。其成员主要包括各种法学家、政治学家、作家、议员、政治活动家等，成分复杂。总统委员会于 2001 年废止。

1991 年，叶利钦还设立了总统直属国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负责确保俄罗斯各国家权力支系的协调运转，协调联邦中

^① [俄]鲁·格·皮霍亚著：《苏联政权史》，徐锦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71 页。

央与各联邦主体的关系。1991年的国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务秘书、国务顾问、部分政府部委首脑等（当年废止，1993年部分恢复）。^①2000年正式恢复后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РФ），成员主要是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首脑。2012年后，国务委员会成员包括联邦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以及各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首脑和国家杜马各党团首脑等。^②但国务委员会始终是个临时性机构，不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

同时，在宪法危机期间（1992-1993年），叶利钦还设立了安全会议（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用以协调强力部门的行动并为总统提供咨询。1993年后，安全会议根据新宪法成为总统组建的常设咨询机构。2001年后，成为协调决策事关国家安全活动的中心机构。现任常务委员包括安全会议秘书、总统办公厅主任、联邦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政府总理，联邦安全局、内务部、外交部、国防部部长，对外情报局局长以及特定总统全权代表；非常务委员包括总统驻联邦区代表、联邦主体首脑，政府副总理及其他部委官员，联邦总检察长等。^③由此可见，安全会议、国务委员会等共同构成的总统会议咨询机构，已逐渐摆脱了单纯的咨询性质，上升到国家最高决策中心的地位。2020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恢复并加强国务委员会功能的建议被写入新宪法，使总统对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程序的控制与影响更加完善。

（二）总统直属办事机构

俄罗斯总统办事机构同样经历了一系列部门的去留、重组、合并，逐渐形成了以总统办公厅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如果说总统会议咨询机构负责政策

① 总统直属国务委员会由1991年8月14日第17号总统令设置，当年11月6日又发布了第172号总统令，使前一总统令失效。1993年的“部分恢复”是指新的总统令（1993年2月4日第180号）撤销了之前废止国务委员会的总统令。但国务委员会仅仅是在制度与机构意义上得到恢复，其实际功能、职权与地位并没有恢复。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叶利钦身边长期存在多个非正式的权力中心。一个权力中心为采取集体行动而设立的部门或平台，很容易被另一个权力中心所废止或弃用。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治的特点更多体现为“因人设事”，而非“依规办事”，许多政治机构都很难获得必需的稳定性，只能长期以临时性机构的形式存在和运转。以国务委员会为例，直到2000年普京执政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并发挥重要的功用。

② Сост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http://kremlin.ru/structure/state-council/members>

③ Состав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scrf.gov.ru/council/composition/>

的制定，那么总统办事机构的任务就是负责政策的实施。总统办公厅通过人员流转、监督推动政策落实、广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等方式，确保了总统对各国家权力机关的控制。

总统办事机构的确立，同样表现为一系列部门的建立与废止。在叶利钦时期，总统办事机构就至少包括总统办公厅、总统安全局、总统助理局等多个机构。总统办公厅（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初设于1991年，1993年后成为宪法认定的国家机构。总统办公厅的部门和人员构成及其实际权限一直在变动，且很大程度取决于时任负责人。1996年，丘拜斯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时，推动叶利钦颁布法令，将其认定为保障总统工作的国家机关。1999年，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总统办公厅应该协调各国家权力机关工作，监督落实总统决定。2004年普京签署总统令，确认总统办公厅的宪法地位，认定其为“保障联邦总统工作并监督总统决策落实的国家机构”。^①

20世纪90年代，总统办公厅不同机构和人员的重要程度及权限，主要取决于总统对其领导的信任情况。因此，在总统办公厅中，总统安全局、总统助理局等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②如，总统安全局就曾被授权组建专门侦察腐败行为的机构。时任安全局局长的科尔扎科夫曾与古辛斯基等金融寡头直接对抗。1995年科尔扎科夫去职后，总统安全局权限缩小，恢复到一般的保卫职能。1992年，总统助理局将总统秘书处领导设为总统第一助理，试图建立新的权力中心。^③1996年丘拜斯任职总统办公厅后才被废除。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6.04.2004 г. №.49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я об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20769>

②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与总统安全局、助理局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比较频繁的变动。以总统安全局为例：1995年7月28日第773号总统令，认定总统安全局为国家机关，隶属总统办公厅领导。但1996年6月20日第964号总统令，将其并入联邦保卫局，不再隶属总统办公厅。1992年5月6日第465号总统令设立了总统助理局，1996年10月2日第1412号总统令将之撤销。撤销后，总统助理（помощник）依然保留，功能和人员基本并入总统办公厅。总而言之，总统安全局与总统助理局的废立都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治的一个特征：当某一机构的领导人特别受到信任时，其所在机构的地位就会以进一步接近总统的形式得到提高；当领导人失去信任或在竞争中失败时，其所在机构也会受到影响，以变更隶属关系或增加间隔层级的方式远离权力中心。

③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8.05.1992 г. №.221-рп. «О службе помощников и Канцеляр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可见，总统办公厅作为联邦总统权力的附属和延展，在设立初期表现为大量的顾问、秘书、助理之类的非正式机构，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机构权限划分，使总统权力分散且无法落实，实际上围绕总统形成了多个权力中心。而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和科层设置，又使总统权力无法对国家权力的相关分支施加影响。

普京上台执政后，总统办公厅的政治、法律地位得到稳固。总统办公厅开始逐渐成为总统对国家权力体系实施领导控制、施加影响的有力工具。除机构本身的权限外，总统办公厅的主要领导也通过人员流转的方式，进入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在历任总统办公厅主任中，沃洛申（1999-2003年）先后转任国家统一电力公司（ЕЭС）董事会主席（1999-2008年）、乌拉尔农业化工公司董事会主席（2010-2014年）、第一货运公司董事会主席（2012年）。时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999-2000年）的梅德韦杰夫先后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和主席（2000-2008年）、总统办公厅主任（2003-2005年）、政府第一副总理、总统、总理。索比亚宁（2005-2008年）先后转任政府副总理、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董事会主席、莫斯科市市长。纳雷什金（2008-2011年）先后转任国家杜马主席、对外情报局局长。伊万诺夫（2011-2016年）则在离任总统办公厅后转任总统全权代表，同样参加安全会议。以上所述只是历任主任的流转，副主任的流转基本遵循同样的规律。例如总统办公厅前副主任谢钦（1999-2008年），曾转任过联邦政府副总理（2008-2012年）、俄罗斯石油公司首席工程师、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等职。

不难发现，在普京执政过程中，总统办公厅的政治逻辑已经从单纯的精英输入逐渐向精英输出转变：即从“能获得总统信任的精英进入总统办公厅”向“获得总统信任的总统办公厅精英转任关键国家机构首脑”。从总统办公厅政治精英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们牢牢控制了国家的重要企业，特别是能源、交通、媒体等命脉产业；同时也积极转任国家其他权力支系，如行政（联邦政府）、立法（国家杜马）等机关以及地方政府（莫斯科市）的首脑。在2020年俄罗斯新宪法中，总统办公厅从一个临时机构转变为常设机构，并赋予其“保障总统行使权力”之职能。这一描述也为总统办公厅权力的定位与延伸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

（三）政党体系

如上所述，俄罗斯总统通过会议咨询机构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程序实现控制。同时，他又能通过总统办公厅的监督职能与人员流动，实现对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工作的影响与控制。那么，对于总统而言，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在于立法机关和地方首脑。这二者由于各种因素，使总统很难通过人员任免实现直接控制。且这二者利益相近，人员数量庞大，单个成员拥有的权力大致近似，很容易在立法机关内组成联盟，对总统的决策进行抵制或干扰。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建构过程中影响政体形成的常见现象：地方精英在代议机构中组成联盟以抵抗中央政府的政策。另外，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从理论上讲，总统权力需要通过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体系才能间接实现对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领导，进而产生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也正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政治现实。

在停止苏共活动后，叶利钦放弃了对政党体制的经营，并未主动建设政党^①，但许多苏联改革末期的社会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政党，这就使得总统权力很快面临着来自立法机关的压力。1992-1993 年，叶利钦直接面临最高苏维埃的挑战。在 1996 年总统大选中，叶利钦更是需要直接与一个拥有完善、成熟、庞大的全国性组织体系的俄共竞争。这令总统的结构性权力和程序性权力都难以实现，典型例证如 1999 年叶利钦提名的总理连续三次遭到议会否决。

相对而言，普京更加重视政党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对议会多数党的建设。1999 年大选前，围绕政府就形成了“团结”竞选联盟。随后，联盟逐渐吸收了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并联合卢日科夫的“祖国”运动。2001 年，“团结-祖国”联盟改组为“团结-祖国”党，又称统一俄罗斯党（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简称“统俄党”）。时任联邦内务部部长格雷兹洛夫（2004-2008 年）、总理普京（2008-2012 年）、总理梅德韦杰夫（2012-2020 年）先后任党主席。目前，梅德韦杰夫以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身份继续担任统俄党主席。

^① Michael McFaul, “Lessons from Russia’s Protracted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t Ru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9, Vol.114, No.1, pp.103-130.

值得注意的是，在组建以来的发展过程中，统俄党已经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单纯的西方式议会政党。它更接近于一个俄罗斯国家权力各支系之间，特别是行政机构各支系政治精英与各地方政治精英的协商平台；它不仅包含了大量作为地方精英的联邦主体首脑，也包含了众多联邦政府官员。从地方精英的角度说，“团结”运动的组建就是 39 位地方领导人发起的倡议。而在统俄党内部“国家-爱国者俱乐部”中，不同时期其成员就曾包括联邦教育部长、文化部长、紧急情况部长、工商业部副部长等官员。2003 年，统俄党吸收了 29 名地方首脑、3 名部长和多名市长。2007 年吸收了 65 名地方首脑、4 名部长和多名市长及联邦主体部长。2011 年吸收了 54 名地方首脑、8 名联邦政府成员。^①许多俄罗斯联邦主体领导人同时也担任统俄党地区分部的负责人。^②2020 年，在 85 名俄罗斯联邦主体首脑中，66 名属于统俄党，13 名属于无党派人士（其中 7 名由统俄党推荐），2 名出自俄共，3 名出自自由民主党，1 名出自公正俄罗斯党。^③有学者指出，加入统俄党已成为当前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主流选择。^④在取消联邦官员入党限制后，统俄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2020 年以前，在议会多数党、政权党、执政党三者并不重合的情况下^⑤，不拥有组阁权的统俄党主要是发挥加强政权对政治体系整体控制的功能。在 2020 年 1 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建议将总统任命总理的权力移交给议会，并由总理自行组阁，但总统保留解散政府和解职总理的权力。^⑥这一建议也基本被完整地保留在了新宪法中。^⑦这使得政党及立法机关开始与总统共享

① Заявление о практике включения в партийные списки кандидатов лиц, не собирающихся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лос. 27 июня 2016 г. <http://www.golosinfo.org/articles/103411>

② Главы 13 субъектов РФ возглавят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тделения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ИТАР-ТАСС. 24 октября 2019. <https://tass.ru/politika/7041802>

③ 联邦主体首脑履历参见俄罗斯政府网站，<https://governors.ru/governor/assignment>

④ Ora John Reuter, “The Politics of Dominant Party Formation: United Russia and Russia’s Governors”, *Europe-Asia Studies*, 2010, Vol.62, No.2, pp.293-327.

⑤ 李兴耕：“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制度”，《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11-17 页。

⑥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5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582>

⑦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что меняется? 14 марта 2020. <http://duma.gov.ru/news/48045/>

组阁权，对政策走向具有了更强的影响能力。但鉴于俄罗斯总统并非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统与议会互不隶属，因此短时间内，议会多数党、执政党、政权党不重合的局面仍将延续。政党仍将是总统权力在三权体系中的工具和延伸，而非与之竞争的对手。

三、俄罗斯国家权力机关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表现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大致分立、互不统属，而总统又能对三权都施加极大影响的“总统-三权”政治体制。鉴于俄罗斯特殊的“总统-三权”二元政治体制，分析俄罗斯政治结构的变化至少就应该包括两个衡量标准：其一，总统权力体系与三权体系之间的关系，即总统对三权体系的控制能力是否增强、削弱或丧失；其二，三权体系的内部关系，即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支系所保有的政治权力是否增强、削弱或丧失。

（一）总统

如果说总统权力体系通过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机构、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和国家机关等，实现了总统的程序性权力和对三权体系的实际控制，那么从宪法中可看出，总统还保有强大的结构性权力。

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看，总统具有最为自主的产生方式，同时对其他三权机关都保有一定的任免能力。首先，俄罗斯联邦总统并非由议会产生，而是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具有四个国家权力机关中最强的合法性与自主性。这一方面代表了最大比例、最为广泛的民意，另一方面则是其产生不受行政、立法、司法的干扰。唯一可能产生影响的只有弹劾程序，但这需要国家杜马首先提出并通过指控，联邦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予以证实，再由联邦委员会做出弹劾决定。可见，行使这一权力需要立法、司法机构通过复杂的程序共同协作，效率和力度就会降低。其次，2020年修宪以前，总统可以任命总理、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可以直接影响行政机关的人员任免。^①同时，总统可以提名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的法官，由联邦委员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83. <http://constitution.kremlin.ru/>

会任命；其他联邦法院法官可根据总统提名，征得最高法院院长、仲裁法院院长同意后按程序任命。^①总统还能任命联邦总检察长，并根据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提名任命联邦主体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法官。^②可见，总统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司法机关的产生。最后，对于立法机关，总统虽然不能任命联邦委员会主席和国家杜马主席，但依然能够用各种方式对联邦主体行政首脑与议会构成施加影响，从而影响联邦主体派驻联邦委员会的代表^③，况且总统还保有解散杜马的权力。此外，总统藉由多数党实际领袖的身份，还能推动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因此，总统对立法机关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从程序性权力的角度看，总统能通过工作机制对其他权力机关的活动实施比较强的影响，还能通过人事和组织的方式对其他权力机关保有比较强的干预能力。首先，在工作机制上，总统本身具有行政权。在总统与总理的分工中，总统有权主持(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вать)联邦政府的会议。^④总统直接领导政府的外交和强力部门，总理则主要领导政府的经济、社会、财政部门。同时，总统可以通过安全会议、国务委员会等机制，把握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其次，在人事和组织方面，由于总统同时还是议会多数党的实际领袖，因此可以通过政党内协商的方式，对国家杜马的立法活动施加影响。另外，许多政府成员和联邦主体首脑也是多数党党员，总统也可以通过党内的非正式方式对其活动施加影响。最后，2014年宪法修订后，在联邦委员会中引入总统特别代表，不超过联邦主体派驻联邦委员会代表成员总数的10%。^⑤这就使得总统能够在获得全国联邦主体一半支持的情况下，使提案在联邦委员会得到通过。

2020年宪法修改后，总统的结构性权力出现调整，但总体上呈现增强的趋势，程序性权力则明显进一步增强。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说，总统的产生方式不变，但对其他权力机关的任免能力出现变化。首先，行政机构部分变动最大。在新宪法中，政府总理的候选人由总统提名，国家杜马通过之后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83.

② Там же.

③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95.

④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83.

⑤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95.

由总统任命。同时总统能直接解职总理，不需要通过杜马。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候选人从原先的“总理建议-总统任命”，调整为“总理提名-国家杜马通过-总统任命”，并特别写明总统无权拒绝这一由总理和杜马共同拟定的候选人名单。^①但是，总统仍然保留了对一些涉及政权问题的机关（如国防、国安、内务、司法、外交、紧急情况、公共安全等部门）的领导权。这部分联邦机构的领导人不是经由杜马，而是经由总统与联邦委员会协商确定。更值得注意的是，总统虽然无权拒绝由总理和杜马拟定的非总统直属部门候选人名单，但总统仍可决定在联邦政府中，哪些部门直属总统领导，哪些部门由总理领导。^②换言之，在特殊情况下，总统虽不能直接任命这些部门的领导人，但仍可通过变更归属的方式对其进行领导。因此，总体而言，新宪法将总统的权力按“政治-行政”的思路一分为二，政治部分权力保持不变，将行政部分权力与总理和杜马共享。同时，如果分享行政部分权力的总理和杜马出现冲突，最终依然由总统决定解散政府或解散杜马。如果总理的内阁提名始终无法获得杜马通过，在空缺 1/3 以上时也可由总统直接任命副总理与各部部长。^③其次，从立法机构的角度看，卸任总统有权成为联邦委员会终身参议员（сенатор），在任总统能直接任命的代表数量提高到 30 人，其中包括 7 名终身参议员。^④在杜马否决总理候选人、否决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候选人、对政府表示不信任时也可解散杜马。这就使得总统对立法机构的程序性权力也得到增强。另外，总统对司法机构的结构性权力，也从 2020 年前的向联邦委员会提名或提议解职法官、总检察长和副总检察长，转变为向联邦委员会提名或建议解职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及其他法院院长、副院长和法官^⑤；与联邦委员会磋商后任命或解职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检察官和联邦主体检察官。^⑥显然，这使得总统对司法机关的结构性权力进一步增强。而从程序性权力的角度看，总统在工作机制中更强调国务委员会的意义^⑦，

①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что меняется?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⑥ Там же.

⑦ Там же.

使其能掌握地方精英的总体态度，督促政策在地区层面的落实，因此这方面的程序性权力将会得到提高。同时，总统能就法案预先向宪法法院提起合宪性审查，以避免法案通过后的否决。^①另外，总统还能通过更多的形式对政府工作施加影响，从总统令增加为总统令、指示与委托（указ,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и поручение）。^②可见，在新宪法生效以后，总统不仅不会退居幕后，反而能对各领域的工作实现更宏观和直接的领导。

（二）行政机关

在俄罗斯既有的总统、行政、立法、司法四大国家权力机关中，总理的结构性权力与程序性权力相对有限。总理权力最弱的时期发生在叶利钦执政初期与中期，即总理作为单纯行政机关领导人的时期。中期，丘拜斯在担任第一副总理后接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后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这使得行政机关的权力得到增强。后期，切尔诺梅尔金所组建的政权党发展迅速，同样也使政府具有更大的权力。2012年后，总理梅德韦杰夫同时出任统俄党主席，这使得总理的权力得到提高。

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看，总理具有四大国家权力机关中相对最不自主的产生方式和偏弱的任免能力。首先，2020年修宪以前，总理的产生本身受制于总统与议会。俄罗斯的总理不由议会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提名，议会通过。如果议会三次无法通过则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例如叶利钦执政末期的情形）。总理的解职则不需要经过议会程序。其次，在行政机关内部，2020年前，总理不能任命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只能向总统建议任命）^③，仅有权自主任命副部长，因此其对行政机关的把控能力有限。同时，总理不能影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对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任免能力。

从程序性权力的角度看，总理通过工作机制能对行政机关保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能力，也有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人事和组织渠道对立法机关施予一定的影响力。从工作机制上讲，总理直接领导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同时也能通过参与总统会议咨询机构掌握其他部门的工作状况。从人事和组织的角度讲，当总理同时也是统俄党即议会多数党主席时，一方面，能够通过议会多

①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что меняется?

② Там же.

③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ья 83.

数党对议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杜马的活动施加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俄党吸收了大量联邦主体首脑和政府官员，总理也能通过政党内的非正式机制，掌握政策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动议、决策、实施情况。

2020 年修宪后，对于联邦政府影响最大的就是总理的任免程序及总理自主权力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总结为：总理的结构性权力在“一定限度内”得到增强，但其程序性权力基本保持不变。结构性权力增强，是指总理获得实际组阁权，自主提名副总理及各部部长。这毫无疑问会使总理具有更强的能力来保障和推动政策实施。同样，对于共享行政部分结构性权力的国家杜马而言，总理权力的增强实际上也使行政和立法机构达到了一定的平衡。总理并非只具有提名权和动议权，并全面受制于国家杜马。相反，如果国家杜马多次阻止或干扰总理的组阁和施政，总理可通过发起信任案的方式进行反制。^①如果杜马依然决定不信任，则杜马本身也可能面临解散。所谓“在一定限度内”是指，首先，总统依然保留了对政府官员的解职权、对强力部门领导人的提名权，以及对军队和护法机关的直接领导权。这意味着总统依然保留了对行政机关的总体控制，依然掌握总理对杜马的反制能力以及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间的平衡关系。无论是三次否决候选人提名还是不信任案，最终都要交由总统裁决。其次，总理的产生依然受制于议会和总统。如果总理能继续担任多数党党首，那么他在产生方式的自主程度、特别是组阁能力方面，就会获得更大空间。总理在人事组织方面的程序性权力，也将同样取决于他在多数党内部的地位与影响力。可见，宪法修改使总理的角色向更加纯粹的技术官僚方向转变，在削弱其可能对政治部分权力产生影响的同时，在一定框架内赋予其在行政部分权力领域内更大的空间与自主性。

（三）立法机关

总体而言，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议会的权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随后又逐步复苏的过程。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也逐渐由对抗转向合作。目前，议会在俄罗斯整个政治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可以说是四大国家权力机关中比较强势的一个支系。如果将 1988 年苏联的政治体制描述为“政党-国家”结构，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

①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что меняется?

让政治权力大量向苏维埃体系倾斜。这一趋势也体现在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因此，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实际上拥有很强的政治权力，乃至有实际限制总统的能力。但在 1993 年宪法危机后，议会权力遭到极大削弱，总统独立于三权体系成为一个权力主体。此后，在议会，特别是在国家杜马中，由于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党始终占据相当数量的席位，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经常处于对抗状态。2003 年第四届杜马选举后，统俄党逐渐占据议会多数党的位置，其他政党比例日益缩小。由于统俄党支持政府的立场，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得以开始合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分析联邦会议这一立法机关时，有必要区分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不仅联邦会议的权力无法一概而论，而且上下两院的结构权力也有差异。

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看，联邦委员会的产生方式自主程度偏低，但任免能力强；国家杜马的产生方式自主程度较高，但任免能力弱。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联邦委员会的自主程度经历了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90 年代中后期，联邦委员会的代表由联邦主体的行政首脑与立法机关首脑本人兼任。2002 年以后，行政与立法机关首脑不再兼任联邦委员会代表，而是改为由两个机构派驻代表。联邦主体首脑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平台转移至国务委员会。2014 年后，宪法规定，联邦委员会中将包括总统派驻联邦委员会的代表。这就使地方精英对联邦委员会的影响能力逐渐下降。但从任免能力的角度看，联邦委员会有能力影响司法机关即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院长与法官的任免，也有权影响到总理的任命。这就使其任免能力不可忽视。

相对而言，国家杜马的自主程度则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1993 年 10 月以后，叶利钦宣布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方案：共计 450 名代表，225 人按单席位选区制选出，另外 225 人经由比例代表制选出。在 2007 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混合代表选举制改为比例代表选举制，取消小党在杜马内的话语权，杜马由各大党占据。在 2016 年第七届杜马选举中，比例代表制又改回混合选举制，进入国家杜马的得票门槛由 7% 降到 5%。单席位选区制有利于地方，比例代表制则有利于政党。选举制度本身就会对国家杜马整体的自主性产生影响。但无论如何，杜马代表的产生也是来自广泛选举，有较强的不可控性，虽有一定波动，但始终具有较高的自主水平。从任免能力的角

度看，杜马能参与对总理与行政机关的任免程序，但对总统和司法机关的影响都不大，其任免能力要明显弱于联邦委员会。

从程序性权力的角度看，联邦委员会在工作机制方面的权力较强，但在人事组织方面的权力较弱；而国家杜马在工作机制方面的权力较强，在人事组织方面的权力也较强。在工作机制方面，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的主席都是安全会议的常任委员，一些国家杜马党团首脑和联邦主体首脑也能通过此类机制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此外，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都实际掌握立法权，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为政策奠定法律基础或对政策进行法律上的限制，因此，二者都保有比较强的程序性权力。在人事组织方面，国家杜马的活动主要表现为政党竞争。议会多数党即统俄党，主要是由政府官员、联邦主体首脑、知名科学家、艺术家、社会评论家或社会活动家等组成。^①因此，统俄党能通过党内的人事组织程序对行政机关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统俄党在人事组织方面的权力主要取决于总统、总理与政党的关系。总统、总理如果对政党的控制能力较强，那么杜马在人事组织方面的程序性权力就弱，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就主要表现为合作与支持；若二者的控制能力较弱，则杜马权力变强，立法与行政机关就可能表现为对立与竞争。

2020年修宪后，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在任免能力方面的结构性权力都得到显著增强，产生方式的自主程度基本不变。同时，二者在工作机制方面的程序性权力得到增强，人事组织方面的程序性权力则基本维持不变。宪法修改后，联邦会议的职能将会更加明确地向“政治-行政”二分转变。联邦委员会掌握更多政治部分的权力，国家杜马则在行政权力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联邦委员会的参议员受总统影响的部分增大，其产生方式方面的结构性权力略微降低。但联邦委员会将能够与总统协商任命或解职涉及政权机关的领导人^②、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检察官和联邦主体检察官^③，也能够经总统建议，任免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与法官。^④这使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共同行使的对司法机关的任

① Высший совет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https://er.ru/persons/supreme_council/

②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что меняется?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免能力得到完善，也意味着联邦委员会在确保总统影响力的情况下，能获得更多政治部分的赋权。相对地，国家杜马的构成方式不变，但将获得更强的对行政机关的任免能力。国家杜马不仅能在候选人阶段与总统共同决定总理人选，而且能在候选人阶段与总理共同决定政府各部门的首脑名单。这就使国家杜马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实际组阁权。虽然行政首脑不是由杜马决定，但杜马已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构成。当然，这部分结构性权力的增强与总理一样，是发生在一定限度内的。这一限度就是：在产生分歧与冲突时，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总统手中。对总理的提名权依然取决于总统、总理与议会多数党的关系。总统、总理二者的关系及其与多数党的关系，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议会组阁的自主性程度。从程序性权力的角度，新宪法要求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在各自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一方面体现在二者都有权实行议会监督，可以对政府部门和地方自治机关提起质询^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联邦委员会将听取总检察长关于联邦法律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国家杜马将听取中央银行的年度报告。同时，由于国务委员会地位的提高，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都将更能通过工作机制的方式参与国家决策，这就增强了各自的程序性权力。这意味着联邦委员会将在一定限度内与总统共同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而国家杜马则将在人员选任、政策制定，特别是治理绩效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而非既往由总统承担最大责任。

（四）司法机关

在四大国家权力机关中，司法机关的权力相对较弱。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转型的现实原因。俄罗斯的司法权力在苏联解体后才独立出来。苏联时期议行合一的政权结构，使苏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审判和检察机关都只是其下属机关。1992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第一次确认了司法独立的原则，确认司法权属于法院，建立联邦宪法法院、仲裁法院和军事法院。此后，俄罗斯开始在普通法院和仲裁法院系统中实行单一制，而在司法审查系统中实行联邦与联邦主体并行的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宪法危机期间，宪法法院本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毕竟，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结构、权力机关职权划分、多党制建立、联邦与联邦主体职权划分等方面，都出现

^①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что меняется?

过呈请宪法法院裁决的案例。但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宪法法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比较有限。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同时也进行了宪法的更换，使宪法法院对宪法的解释能力受限；另一方面，宪法危机后，叶利钦不满宪法法院采取的司法积极主义立场，对其权限进行了限制。

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看，俄罗斯司法机关的产生方式自主程度偏低，任免能力也是如此。由于总统和联邦委员会共同行使任免最高法院、宪法法院院长和两院法官的职权，使司法机关的组建过程很明显地取决于总统与立法机关。在任免能力方面，司法机关无权主动影响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组建与解散，即使对于合宪性问题的审查，也需要由其他机关提起诉讼才可受理。同样，司法机关也不能单独行使对总统的弹劾权，而是需要国家杜马首先发起，司法机关进行认定，再由联邦委员会做出决定。实际上弹劾的动议和决定都归属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是进行法律事实的认定，这使其结构性权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而言总体偏弱。同理，从程序性权力的角度看，司法机关无法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无法主动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无法在政策出台后主动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因此其工作机制方面的程序性权力比较被动。在人事组织上，除行政机关内个别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之外，司法机关无法直接影响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程序性权力也很有限。

2020 年宪法修改后，司法机关的结构性权力进一步受限，但其程序性权力得到提高。总统与联邦委员会将共同完善对司法机关的任免权，使司法机关在产生方式方面的自主性程度进一步降低。但是，应总统的请求，司法机关将可以在政策出台前，而非出台后，对政策本身进行合宪性审查，这意味着司法机关虽仍被动，但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在政策出台前进行合宪性审查，将使政策更具法律基础，避免其他权力机关以违宪问题或从法律角度对政策进行限制。换言之，司法机关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政治性角色进一步受限，工具性角色则得到增强。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20 年宪法修改之后，俄罗斯四大权力机关的权力变化情

况大致如下。

表 1 俄罗斯权力机关的权力变化情况（2020 年宪法修改前后）

		总统	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
结构性	修改前	产生方式自主性最高； 任免能力最强	产生方式自主性低； 任免能力弱	联邦委员会产生方式自主性低，任免能力强； 国家杜马产生方式自主性高，任免能力弱	产生方式自主性低； 任免能力弱
	修改后	产生方式不变； 对行政机关任免能力减弱； 对司法机关任免能力增强	产生方式自主性低（取决于政党）； 任免能力增强	产生方式不变； 任免能力增强	产生方式自主性继续降低； 任免能力不变
程序性	修改前	工作机制方面权力最强； 人事组织方面权力最强（取决于政党）	工作机制方面权力强； 人事组织方面权力强（取决于政党）	联邦委员会工作机制方面权力强，人事组织方面权力弱； 国家杜马工作机制方面权力强，人事组织方面权力强（取决于政党）	工作机制方面权力弱； 人事组织方面权力弱
	修改后	工作机制方面权力增强； 人事组织方面权力不变（取决于政党）	工作机制方面权力不变； 人事组织方面权力不变（取决于政党）	工作机制方面权力增强； 人事组织方面权力不变（取决于政党）	工作机制方面权力增强； 人事组织方面权力不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上表可知，如果将俄罗斯现行国家权力体系视为“总统-三权”的二元政治结构，2020 年俄罗斯进行的宪法修改，更大程度上属于三权体系的内部关系调整，而非政治结构的整体变化。宪法修改后，总统的权力和地位基本保持不变，甚至会要求总统扮演更加积极的、协调三权运作的角色。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然受总统的领导和影响，但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空间。

同时，国家权力更加清晰地按“政治-行政”的区分方式一分为二，政治部分的权力由总统总控，与联邦委员会共享，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以及事涉政权的各类问题；行政部分的权力由总理与国家杜马共享，实际承担国家治理的职责，决定各类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变革中，考虑到即将举行的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和 2024 年总统大选，议会和总理将会为国家的选人用人、政策制定、治理绩效、发展速度承担更多责任。

总结可知，2020 年的宪法修改提示了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三方面特征。

其一，政治秩序。一切的权力调整都建立在确保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本

次宪法修改没有越过“总统-三权”这一二元政治结构的框架，总统依然确保了对各种事关政权稳定的机构、程序、事务的最终裁定权。新宪法赋予总理与国家杜马在行政事务方面的更大空间，同时也详细规定了二者出现分歧时的解决方案。无论是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否决权，还是行政机构通过不信任案反制立法机构的能力，最终决定权都掌握在总统手中。这就使总统制、半总统制下总统与议会双重合法性的天然对立，不至于引起政局动荡，三权之间的分歧也不至于影响政权稳定。

其二，政治协商。本次宪法修改对许多硬性的、能造成三大权力机关直接冲突和对立的结构权力，都进行了削弱、调整或加上了重重限制。对许多软性的、能促进权力机关合作协商的程序性权力，都进行了增补，例如将直接任命调整为确定候选人，将合宪性审查提到法案通过之前，对立法机构的否决权进行补充与限制等等。即使在描述总统权力时，也大量增添了“有权（вправе）”的字样，这为总统在做出最终决定前的协调工作留下了大量解释空间。换言之，总统可以选择解散政府或杜马，也可选择不解散。这就避免了1998年杜马三次否决总理提名后总统必须解散杜马的情况，也体现出当代俄罗斯政治中尽量通过协商而非对抗来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思路。

其三，政治精英。无论从总统权力体系的构建或是联邦委员会与国家杜马的分工都不难发现，当代俄罗斯政治的根本问题依然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这既是指如何构建一个精英协商机制，也是指如何使大众的政治参与能同政治精英达到平衡。从苏联解体后的政治发展可知，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支持，但政治秩序的破坏与颠覆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如果政治精英能在一定的框架内和平台上进行有效协商与合作，则政治秩序能够得以保持；如果政治精英出现分裂、对立甚至冲突，且既有的制度设计无法弥合分歧、无法限制其行动，则精英分裂就容易威胁到政权稳定。因此，以本次宪法修改为典型代表的俄罗斯政治发展体现出：尽量减少精英集团的直接冲突和对立，加强其协商与共识，是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

因此，对于俄罗斯政治结构未来的变化而言，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依然会存在于总统、总理和政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目前，统俄党是俄罗斯政治中

最大的精英集团和精英协商机构，它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吸纳不同派系、立场与层次的政治精英。如果“总统-总理-政党”的结构（即总统、总理各自为政党实际领袖与形式领袖，政党作为议会多数党影响立法机关，同时吸收大量政府成员和联邦主体首脑）发生变化，则其对俄罗斯政治产生的影响，将远远大于决策程序改革或个人职务变动。如果总统不再担任政党领袖，总统的程序性权力将大为受限，总统将失去对国家垂直权力体系的完全控制以及通过非正式方式控制行政机关的能力。如果总理不再是政党党首或形式领袖，总理的组阁权将大大受限于议会竞争，总理对行政机关的控制能力会大幅度降低，也将更加受制于立法机关。如果政党（统俄党）不再是议会多数党，那么总统与总理影响立法机关的能力就会降低。如果失去这一地位，政党对联邦政府成员和联邦主体首脑的吸引能力降低，更会使总统和总理对政治体系的控制能力降低。这将可能导致一个“吸引力降低-控制力降低-吸引力进一步降低-控制力进一步降低”的恶性循环。正如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所提示的：“（半总统制下）精英的活动模式与其说取决于宪法原则，不如说更取决于政治因素，甚而取决于政党制度、议会政体是否存在，以及立法机关和总统以及多数党或集团之间的关系。”^①

从政治结构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俄罗斯将继续保持总统制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而非向议会制共和国转型过渡。首先，从政治学基本理论的角度，总统制共和国与议会制共和国的关键区别就在于，行政机关对总统还是对议会负责，而不单单取决于由总统还是议会产生政府首脑。从本次宪法修改的方向看，总理和联邦政府虽然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但依然要通过会议咨询来制定决策，总统仍然对一些部门保有控制，同时保有解散政府、解职总理的权力。在此情况下，总理和政府将依然对总统负责，而非彻底转向由议会产生、向议会负责。其次，从俄罗斯政治史的角度看，如果将苏联体制视作“政党-国家”二元结构，那么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就可被视为从近似于半总统制的“政党-国家”二元结构，向近似于议会制的一元结构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迅速导致了苏联政党体系的分崩离析，同时也令苏联的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94页。

政体坍塌并引发了国家瓦解。其教训之沉重，使俄罗斯不大可能再次向议会制共和国转型。将来的改革将更多地表现为引入精英竞争和精英协商，而非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俄罗斯未来的政治结构，更可能向总统-总理之间的“政治-行政”职权更加明确划分，即总统更加总控国家大政方针、总理负责具体政策落实，二者共同通过政党影响议会的二元结构方向发展，而非转向单总统、单总理或单议会的一元结构。

【Abstract】 The current Russian political regime is not a simple sepa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owers, but instead a dual structure of “president and three powers”. As an independent body of power, the president has achieved leadership and control over the three powers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conference advisory agencies, offices, and party systems. The Russian political regime could be analyzed based on the two criteria of structural power and procedural power. Structural power includes generation method and ability to appoint and remove; procedural power includes working mechanisms and personnel organization. The 2020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s only an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powers, and does not involv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dual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president-three powers”. The overall trend is to weaken hard structural power that may cause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power agencies on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and consolidating political order, while strengthening soft procedural power for negoti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agencies. In the future, structurally,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a more detached position, coordinating work of these three power agen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of office, the president and the Federal Council will control the country’s major policies, while the State Duma and the Prime Minister will tak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will continue the dual structure of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distinction between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and make the distinction clearer, rather than change to a unified

structure where the President, the Prime Minister, or the parliament dominates. As to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biggest uncertainty lies in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ident,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majority party in the parliament.

【Key Words】 the New Russian Constitution, Russian Political Structure, 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Russian President

【Аннотация】 Ны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и судебной властей, а двой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езидент — три ветви власти». Как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орган вла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 добился лидерства и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тремя ветвями власти —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и судебной с помощью таких методов, как консалтинговые агентств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е органы и партийные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а по двум критериям: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власти и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й власти.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власть включает способ генераци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азначать и снимать;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включает рабочий механизм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персонала. Поправка к конституции 2020 года — это всего лишь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и судебной властями и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двой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президент — три ветви власти». Общая тенденц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ослаблении жёсткой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власти,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конфронтацию и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властны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пр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м усилении мягкой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дл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властны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и укрепл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будущем со структур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 будет занимать более обособленную позицию и будет координировать работу трёх основных ветвей власт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ла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 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совет буду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ны,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 возьмут на себя больш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одолжит двой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политик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 сделает это различие более чётким, а не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в еди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в которой доминируют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 или парламент. В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самая больша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связана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 партией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в парламент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ов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崔 珩)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德米特里·苏斯洛夫 等**

【内容提要】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这份报告(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国家杜马的支持)认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建立新的秩序。在此过程中,渐行渐远的不仅是“单极”或者“两极”时代,还有西方近几百年来在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并未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而是像催化剂一样激化了既有矛盾,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重新分配。该报告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在外交和国防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胜利,但是需要更为充分地加以表达和阐释,同时有必要拓展新的外交政策方向并为其提供思想保障。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是维护和平;二是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三是共同保护自然环境,加强人文合作,应对包括流行病在内的新的全球性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新思想 中美俄关系 多边战略平衡 世界秩序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4-0089(29)

* 本文译自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202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维护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Москва, 2020)。感谢高等经济大学授权我刊翻译和发表。原文篇幅较长,译文有所删减。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

**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А. Караган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者;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В. Сусл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А. Примаков),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伊戈尔·马卡罗夫(И.А. Макар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拉里莎·波波维奇(Л.Д. Попович),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卫生健康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未来世界格局与俄罗斯对外政策新议程

俄罗斯国内外的外交政策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思想已进入完全不可预测的混乱时代。这一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它不仅反映出混乱趋势正在加剧的既定事实，还说明过去使用的智识、概念方法无法预测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西方国家设定了“智识模式”，因而西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新的现实，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地位正在经历长期的衰落。

大众智识和情绪状态确实是难以预测的因素，因为“00后”“80、90后”（或“iphone”一代）已习惯超级链接，依赖信息环境，难以区分现实与虚拟，尤其容易受到外界潮流和自身情绪变化的影响。心理状况受信息环境影响的最新案例，是与新冠病毒相关的集体情绪失控。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的持续研发，使得世界的发展愈发难以预测。但是，如果人类不失去基本的价值观——珍视生命、渴望社交、持守家庭、热爱祖国和本土文化，那么人工智能就无法占统治地位，至少其影响是有限的。

大多数发展趋势是可预测的（尽管可能发生各种偶然事件，受到领导人性格和行为的影响，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领导人的作用与日俱增），新冠疫情非但不会改变世界的发展趋势，反而成为强化这种趋势的催化剂。负面进程（大国之间激烈角逐）和正面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同时进行。

在新（主要是亚洲）、旧（主要是西方）领导者之间，正在上演历史上最激烈、最迅速的权力再分配。新冠疫情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和信息战，加剧了这一进程。在西方整体走向衰落的趋势中，美国也许是个例外，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仍会是超级大国。但是，即便是美国，也在迅速丧失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无力左右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总体发展方向。于是，美国成为近年来最危险的国际角色，从维护现状的国家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虽然算不上“复仇主义者”）。从其内部走向来看，最近几年的美国仍将是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

发生这种变化的深层及主要原因是，西方近500年来建立在军事优势基础上的、在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已行将就木，世界

正在回归传统的多极格局。

大部分国际协调机构和机制日渐式微或被有意取消。瞬息万变的局势和激烈角逐，使全球和区域大国之间的争斗无视规则，这是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作用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不是唯一原因）。

即将到来的世界将呈现出数字化发展、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以及大规模移民等重要趋势。这些因素势必加剧各国内部的社会紧张局势，也将激化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是从智力还是从体制的角度，人类都暂时无法解决这些挑战。尽管这些挑战在客观上具有全球性特征，但新冠疫情表明，可行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地下沉到国家或区域层面。

这种张力正在提升对国家精英的要求。领导力以及政治和外交中的人格化重新占据上风，同时全球问题和全球相互依赖发展到了全然不同的层次。

二战后美国构建的全球经济体制正在瓦解，全球化也在部分倒退。世界经济支离破碎，区域经济各自为政。最重要的是，世界经济正在被政治化，其背景是尽管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相互依赖原本主要是积极因素，而现在越来越成为弱点。新冠疫情加剧了这种认知，进一步削弱了全球治理。

有一种取代美国（西方）控制下的“世界政府”或霸权主义的强烈趋势，倾向于将世界政治以及一部分经济重新国有化，恢复民族国家、其精英和领导人的作用及影响力。新冠疫情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疫情凸显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可替代性，其合法性和生存取决于能否首先保障本国公民的社会福利。疫情强化了国家主权因素。虽然由于全球化以及流行病、信息革命等全球威胁，各国无法完全掌控本国局势，但它们仍努力在内政、外交问题上做出自主抉择。各国追求主权、政治和文化独立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仍将持续。中小国家的民众都渴望政治上的主体性，向本国精英表达了更多的独立诉求。其原因在于，全面信息化和通信手段的推广带来了人民的“政治觉醒”，以及传统领导者不再具有榜样的吸引力。许多中等国家和区域大国不仅拒绝盲从超级大国，而且如果没有它们的参与，一些关键的国际冲突和问题便无法解决（中东局势就很明显），更遑

论全球的有效治理。在全球对抗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和区域大国不想在华盛顿的胁迫下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于是产生了“新不结盟”的客观需求。

正在不对称地形成“中国+”和“美国+”两个技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正推动世界走向新的两极化，并试图借此恢复自身的活力和领导力，把对抗强加于人，削弱那些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美国的抗疫行动（无力阻断病毒在本国的蔓延，对盟友的自私态度），与中国在本国的成绩及对他国的援助，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新的经济危机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世界领导权争夺变得白热化。华盛顿对北京采取更加敌对的政策，并且对盟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新冠疫情几乎成为美国对华信息战的核心内容，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中国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在抗疫成功的背景下，转而开展信息-政治战攻势。在俄罗斯学者看来，疫情暴发之前，中国虽然愈发自信并奉行面向全球的政策，但仍竭力回避对领导地位的诉求；现在则不然，中国外交在政治心理方面的内敛性已经减弱，中国公开表示正在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

显然，欧盟主导的欧洲错过了（与俄罗斯联合）成为世界新秩序第三支柱的机会，它将慢慢走下坡路。尽管欧盟不大可能彻底解体，但势必将进行大变革。新冠疫情再次强调国家（特别是大国）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冲击了跨国机制。欧元区可能将发生重大变化。最有可能的是，欧洲次大陆的中部和南部将倒向东方，西部和北部将倒向美国。

俄罗斯仍有充足的回旋余地。确切地说，从地缘政治来看，俄罗斯仍将是一个独立的中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和国防政策。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俄罗斯将会逐渐趋向东方，同时又保持政治和军事的独立性。在中国的支持下，俄罗斯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但何时实施，尚不明确。

国际环境将再度意识形态化。国际共产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宗教弱化（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之后，全球自由民主又加速衰朽，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由此产生了填补“真空”的争斗。部分“真空”被左翼-右翼民族主义、社会不满情绪和“绿色”激进主义填补。俄罗斯尝试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填补“真空”，而中国则使用了尚不太清晰的“命运共同体”概念。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向其地缘政治经济

竞争者发起了不负责任的政治-舆情战，企图利用信息工具方面的优势妖魔化竞争对手。然而，那些能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意识形态并填补“真空”的国家、社会和文明，在争取未来世界秩序领导地位的斗争中，将获得巨大优势。目前，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反俄情绪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试图通过塑造“敌人形象”，从传统精英手中夺取社会传媒的控制权。

尽管俄罗斯有效增强了战略威慑力，但在可期的未来，发生重大国际冲突并升级到全球战争的危险将显著增加。原因如下：

——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将其提上议程。

——在许多国家，受舆情及政治进程的影响，社会精英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在退化。越发常见的是，庸人被选拔出来，有责任心的精英则被边缘化，取而代之者则越来越依赖用舆情造势，缺乏长远规划。

——信息革命、环境变化、社会不公增加、反抗情绪高涨、移民日益增多、传统管理机制弱化，导致传统精英失势，慌乱情绪和“简单化处理局势”的潜意识（包括诉诸武力）日益增长。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围绕新冠疫情所表现出的歇斯底里情绪，分散了民众对未解问题和各种失败的注意力，反倒像一场“小胜仗”，用以排解社会的不满。

——发展核武器、常规精确制导武器、高超声速武器、网络手段、军用机器人、无人机等装备，形成了破坏稳定的“混合体”。

——军控机制日渐式微，大国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渠道不畅通，不信任 and 战略不确定性在增加，政治敌意进一步强化。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一系列破坏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的武器装备持续扩散，出现了一些军事实力不断壮大的国家。这非但不能巩固多边相互制约，反而同上述因素一样，削弱了战略稳定，增加了爆发武装冲突并升级为世界战争的风险。

——对战争的恐惧已退居其次。“战略惰性”占据上风，相信 75 年相对和平的日子仍将持续。但这是错觉。对大部分俄罗斯人及部分精英人士而言，这种太平心态颇为典型，有可能会在未来削弱民众对发展国防力量的支持。

——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使亚洲和非洲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势必引发新一轮大规模移民潮。

——人类将可能达到“增长极限”。无论如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都将继续成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头等大事。“绿色”正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俄罗斯在该领域表现得不太积极，或者说比较被动。俄罗斯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提出新发展哲学（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的领导者之一。况且俄罗斯拥有大量资源（特别是在环境保护领域可以提供和开发的资源），这不仅将改善国内生活，还可惠及整个世界。

——一个更大的挑战逐渐浮出水面。显而易见的是，建立在不断扩大消费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愈发同社会需求乃至世界本身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在应对新冠疫情上暴露得尤为明显。人类必须确定新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该模式的研究与推进可谓恰逢其时（可作为对保守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我们所提出的相关概念和口号的补充）。

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业绩

凭借经济的部分复苏、军事实力增强、巧妙且意志坚定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再加上对手自身实力削弱，俄罗斯得以跻身世界“排行榜”前三名。面对外部压力，俄罗斯大部分民众与精英团结一致以及对外交胜利自豪发挥了作用。但是，目前俄罗斯经济仍停滞不前，人口问题亦不容乐观。反对者和潜在的盟友认为，长期看来，俄罗斯将衰弱下去。

社会民调的结果与大多数专家的观点一致，即民众对俄罗斯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度不断下降。以积极进攻型的外交政策获取民众对政府支持的能力正在下降，即便该政策目前是成功且有效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未向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即俄罗斯的海外军事行动不仅是安全所需，而且大多成本较低，能够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双赢。另一原因是，人们愈发觉得，参与外部事务会导致疏于解决对广大民众而言更为迫切的内部问题。

当前的世界形势、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俄罗斯的社会现状，都要求提出一套鼓舞人心、团结一致和“提振精神”的俄罗斯内政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

内核，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对俄罗斯和世界均有吸引力的前瞻性方略。

俄罗斯的外交卓有成效，这些成就体现出了俄罗斯对国际事务的正面贡献，可以也应该向世界、向本国人民加以宣示，即俄罗斯足能承担“使命”。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的外交成就和使命未被概念化、资本化，没有被广泛宣传并转化为政治倡议性的语言。

在全球层面，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安全的维护者、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及主权的保护者。

俄罗斯通过成功升级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装力量、实行平衡的防御政策、保持战略威慑力、不卷入新的军备竞赛等策略，恢复了全球范围内的均势，并彻底打破了西方依仗军事优势在近 500 年来支配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西方肆无忌惮地侵略和破坏稳定（如北约扩张，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支持或挑起“颜色革命”，使整个地区陷入混乱和痛苦）的“单极时代”结束了。

俄罗斯提高了国际关系的民主程度，为文化多样性和国家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先前受压制文明的崛起提供了机遇，许多国家得以在经济较量中充分利用本身的竞争优势。西方国家对世界 GDP 的贡献下降，获取“军事寻租”的能力减弱。

俄罗斯正在通过制造高超声速武器、升级现有战略核力量以及协助中国创建导弹预警系统等方式，加强针对俄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战略制衡。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实现坚不可摧的无敌状态幻想，以及企图解除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武装的幻想日益破灭。

高超声速及其他类型武器和系统的研制成功，降低了俄罗斯参与核武器及常规战略武器竞赛的诉求。于是，俄罗斯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虽未增加国防预算，却显著提高威慑力的大国。俄罗斯没有增强战略核武库的动机，这凸显其作为负责任核大国履行了《核不扩散核条约》规定的义务。此外，俄罗斯打消了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取军事优势的期望，对美国而言，军备竞赛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且毫无意义。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增强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减少了冲突。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陷入“双线作战”的境地。这使得两国的冲动行为少，

责任感多，两国关系亦成为加强国际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因素。

在区域层面，随着国家军事实力的恢复，俄罗斯奉行的积极而平衡的外交政策，同样维护了和平、安全、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自由及国家主权。俄罗斯作为重要的平衡者抑制某些国家追求霸权地位，从而维护了它们的独立和主权。

1. 在欧洲

北约和其他西方联盟向原苏联空间的扩张被暂时遏制。与本可能发生的欧洲大战相比，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和当前乌克兰冲突造成的恶果要少得多，倘若欧洲继续扩张到对俄罗斯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大战完全可能发生。为阻止西方扩张，俄罗斯采取了强硬行动，这为未来俄欧睦邻关系以及俄乌关系奠定了基础。一些欧洲国家看到了俄罗斯的决心和实力，看到自己依仗的机制开始走弱，尽管这些国家依附美国，但它们已开始尝试寻找接近俄罗斯的新途径。

俄罗斯非核威慑力的巩固，预防了在非核战争（如果这类战争爆发的话）中战败的危险，同时也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由于奉行“向东转”战略，俄罗斯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次大陆的力量关系，使之于己有利。先是构建“欧洲共同体”的想法失败，继而建立以欧盟为中心的“大欧洲”计划受挫，取而代之的另一种可能性出现：建立一个更稳定，较少取决于外部角色的“合作、发展与安全体系”，即“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一趋势终结了在政治和心理层面认为俄罗斯从属于西方和欧洲的认知，促使欧盟具有爱国情怀和战略头脑的精英寻求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欧盟开始意识到自己处于战略僵局，出路只能是恢复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但现在已非1990-2000年代的语境，即俄罗斯的“欧洲化”，而是需要基于睦邻友好、平等合作的原则，共同制定规范。

2. 在欧亚大陆中部

俄罗斯建立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保证两大邻国之间不存在公开的地缘政治博弈。

中俄伙伴关系加强了中亚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它们无须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还可以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在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互

动中进行一体化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欧亚经济一体化”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俄中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巩固了中亚和阿富汗地区的安全。

外部大国破坏稳定、强行发动“颜色革命”和推行“分而治之”策略的能力正在减弱，近东和中东重要大国对中亚的争夺也被抑制。

俄罗斯在叙利亚取得了胜利，削弱了国际恐怖主义实施破坏行动的能力，数千名来自俄罗斯和邻国的恐怖分子被消灭。

3. 在原苏联地区

俄罗斯用支持和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与集安组织的方式，巩固了成员国的安全与主权，又不限制其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奉行多元外交政策的自由。这些机制保障了成员国之间，以及与中国、欧盟、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和平。

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遵守协商做出决定的原则，这不仅是具有不同政治和经济体量、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间平等合作的典范，而且也是中小国家真正扩大主权的典范。在与外部大国的相互关系中，成员国身份有效加强了中小国家的地位，如白俄罗斯与波兰和欧盟，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和伊朗，中亚国家与中国。所有国家都从一体化中获益，但受益最大的是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小国。

4. 在亚太地区

俄罗斯支持中印之间保持军事平衡，并确保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上合组织。从长远来看，这两项努力可促进中印和印巴之间关系的改善，将避免亚洲的冲突。

俄罗斯降低了亚太地区分化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可能性（美国和在一定程度上的中国），通过更积极地参与整个亚太政策，与亚洲其他所有主要力量中心（首先是印度，还有韩国、日本、东盟国家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平衡的伙伴关系，同时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减少了亚太地区的冲突，还巩固了该地区中小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使它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从而保持了其独立性。

5. 在中东地区

俄罗斯阻止了以武力方式更迭中东地区政权的企图，为中东各国提供了

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机会，包括探索如何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把世俗与宗教、威权与民主相结合。

在俄罗斯协助下，中东国家避免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西方联盟入侵伊拉克后，该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动荡，目前混乱局势正在逐渐消弭。

俄罗斯成功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并说服中东各国接受这一现实，降低了（至少目前）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伊朗与土耳其之间冲突升级的危险。“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斯塔纳模式的形成，有助于改善土耳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作为“平衡者”，并且与美国一样是“域外”力量中心，促进了中东国家（如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的独立及多维度外交。

在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俄罗斯遵循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消灭恐怖分子，防止相邻区域发生动荡，操练俄罗斯现代武装力量；俄罗斯扩大了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在叙利亚的成功也推动了俄罗斯武器市场的增长。

三、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俄罗斯在 2015-2019 年间取得了诸多成就，迫切需要为外交制定有魅力且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新思想。最好既能巩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展示其作为大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又能促进俄罗斯国内的发展，确保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举措，得到社会的支持。

所有讨论内容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不向本国社会和世界各国提出这些思想，如果缺乏我们想与其他国家共建（我们要起主导作用）的美好世界图景，俄罗斯便不能把在外交和国防领域毋庸置疑的成就转化为资本。俄罗斯必须用道德和思想内涵巩固外交和军事成果。

拥有这种思想是大国地位的标志之一。显而易见，俄罗斯不想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国家所期望的、所谓的“正常”国家；如若放弃大国主义，俄罗斯就会轰然倒塌。

苏联是因失却宏大思想而失败的典型案例。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统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弱化和退化。眼下的例子是欧盟的欧洲。欧洲国

家放弃了大国的民族思想，这使它们成为中等国家（只有法国试图保持之前的地位）。欧洲宣布以欧洲世界为目标，目标达到了（其实，主要是因为美苏两个核国家争斗），却开始走下坡路。欧盟曾有机会整合新的宏大思想，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安全与合作空间，将欧洲的技术、金融与俄罗斯的资源、人力和战略实力整合在一起，但欧盟拒绝了这一方案。

也有一些宏大思想曾经被提出过，但是不现实，给实施它的国家及精英带来灾难。这类思想包括试图以武力统一欧洲，先是拿破仑，之后是德国皇帝，最后是希特勒。对于苏联来说，这种思想的载体是共产国际。对于近几十年的西方国家来说，自由民主主义也是此类思想，在各种明争暗斗之后，开始节节败退。

在苏联解体后的 25 年里，俄罗斯及其精英拟定了许多目标（尽管是次要目标），如“跻身欧洲”“站起来”“恢复世界大国地位”“内部政治稳定”等等。有的是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因而被放弃了，有的则实现了。如今旗帜鲜明且面向未来的思想，是几年前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建设合作、发展、非零和博弈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首先以转向东方、中俄伙伴关系、“带盟”对接、上合组织为基础，同时向欧盟和东盟开放。但是，依靠该倡议在新的条件下丰富俄罗斯外交思想并形成外交身份显然还不够。而且部分专家还认为，这一倡议并未得到发展。“转向”本是可推动国家发展、具有潜力的强大思想，现在濒临沦为单纯的经济-专家治国项目，可能使之无疾而终。

残余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俄罗斯仍然有影响力——试图利用任何场合和机会为西方说话。面对西方一贯不负责任的政策，理当加以批评。但在新形势下讨论未来世界秩序的建立时，这种批评应该只是俄罗斯外交议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主要部分。应着重强调的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强大的俄罗斯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全新的、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秩序。

最近有迹象表明，此前俄罗斯外交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逐渐减弱，正在从政治-心理上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思想，是波斯湾和中东多边集体安全观念的新发展。这已被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整个地区采取的行动证实了。2019 年 10 月普京总统在“瓦尔代”会

议上的讲话，是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发表的与非西方国家关系的首个纲领性阐述，其中并没有对西方提出批评。然而，目前该倡议还比较松散，缺少 constants、牢固的基础，比如，需要整合进来一些重要的理念（俄罗斯对世界独特的积极贡献，强大的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作用及其“使命”等）。

俄罗斯外交需要新的、旗帜鲜明的前瞻性战略思想，需要形成颇具魅力的外交认同，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世界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思想竞争加剧、为建立多极化新世界秩序而争斗、大国间的战争威胁增大、世界各国追求独立自主。总的看来，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俄罗斯必须明确自身定位。

第二，缺乏新思想会导致公众对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坚实的国防政策支持减弱，带来内部停滞、部分精英和民众不满、自由派更加活跃，还有可能巩固地缘政治对手在俄罗斯思想阵地的地位，并增强其在俄罗斯国内主动或被动盟友的力量。俄罗斯外交身份的演进并明确加以表述，有助于向公众展示，这种思想可带来大国地位和积极独立的外交与国防政策，以及强大的俄罗斯能以较低成本对外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像所有民族思想一样，这类思想应吸引并促进形成社会意识，使国家生活更加理性，应最大限度地使精英与公众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这类思想在广义上应符合社会基本价值观，不违背社会利益。不久前的俄罗斯历史就发生过这类矛盾。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一部分俄罗斯精英不仅想“融入欧洲”，甚至为获得进入欧洲的“门票”不惜限制俄罗斯的主权。而早在普里马科夫专机在大西洋上空传奇般返航前，这些政策和思想就注定要失败。这种思想引起公众和大部分精英的强烈抵制，对他们而言，历史传承、根植于基因的主权和独立，是最高价值观。只有当灌输给精英和公众的思想被接受时，它才可能有效，并成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为起到引领作用并最终获胜，外交思想与外交身份须符合当前瞬息万变的世界发展趋势。在 1990-2000 年代，多极化思想契合现实又颇为正确，指向众望所归的发展方向，意在抑制美国霸权。不过，多极化只是对当前世界局势的一种描述。对于在可预期的未来无法成为全球多极之一的国家而言，

多极化思想缺乏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多中心主义”思想更具吸引力，更像是确认今天的既成事实。此外，与多极化一样，“多中心主义”缺乏规范基础，没有提出依据哪些规则和原则来确定各力量中心的关系和行为。

我们不建议俄罗斯打造出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不制定所谓“唯一正确”的历史发展观，不追求价值观体系的真理性和普遍性，并将其强加于其他国家。在 20 世纪，这种意识形态让我们和世界都吃尽了苦头。现在我们意识到，“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另一种“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注定崩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突出优势是非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特性。首先，这类政策成本低。其次，俄罗斯可与各国建立平衡的伙伴关系，不被其国内政治制度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所制约；把自己定位为全球角色，但不把任何发展模式强加于人，相反，俄罗斯在创造条件让各国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俄罗斯对自己和世界提出的一组思想，可以发挥三位一体的作用：（1）国际和平的保障者、安全的提供者；（2）维护主权，支持各国自由选择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主张文化多样性，反对任何一种思想、政治和价值观的霸权主义，是“新不结盟”的保障者；（3）环境保护者，主张珍惜自然和地球，主张新的发展模式，维护人类居住环境，特别是人类本身，坚守人类的道德和身体健康，而非无止境的消费。

该使命的前两个组成部分——捍卫和平以及各国选择发展模式的自由——契合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已经在做的事情，也符合近十年来其主要的外交成就。将其作为俄罗斯的世界使命公之于世，可为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积累资本，不会增加外交支出。

维护和平的使命极为迫切，因为近年来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确有增加，且多数非西方国家和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首先是欧洲国家）将认可这一使命。社会舆情调查显示，相对于失控的移民潮和经济危机，德国和法国民众更担心战争和军事冲突。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极有可能爆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战争的危險。

俄罗斯应重视“新不结盟”保障者的角色。独立和自主选择发展模式被大多数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认为是重要的外交价值观。其中很多国家之所以倾向俄罗斯，主要因为不想在美国的逼迫下，在中美这两个 21 世

纪上半叶超级大国之间做选择，它们在俄罗斯身上看到了“仲裁平衡者”的角色。俄罗斯被视为第三个选项，尽管未强大到可以称霸，但足以让许多国家逃避其他国家的霸权。

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主权和文化独特性，符合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根本认同，这是数百年间保卫俄罗斯缺乏天然屏障（高山和大海）的领土锻造出来的认同。仅在 19-20 世纪，就发生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还有国内战争期间外国的武装干涉。对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支持根植于俄罗斯人的血脉。俄罗斯人建立了帝国，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与合并领土的精英进行融合和整合的国家。这种思想也符合俄罗斯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使世界更加美好。它也符合苏联外交传统中最好的一面——反殖民主义。当然，与俄帝国和苏联不同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不会为他人利益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更不用说为别人而战了，应该直接向本国公众和世界表明这一点。

俄罗斯使命的第三点是保护环境、大自然和地球，同样既符合外部需求，又符合国家内部认同，与其竞争优势和内部发展的需求不谋而合。俄罗斯国家内部认同强调对人与社会之精神和文化的倚重，而非单纯依靠物质财富和消费。我们不是广泛号召穷人节制消费，而是有必要采取措施杜绝社会富裕阶层的过度消费。新一轮经济危机抑制消费需求首先体现在富人阶层。这不意味着回归已经证明低效的共产平均主义。但是，社会应该变得更公平。

对大自然的热爱是俄罗斯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必须激活这个要素，让公民不仅为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感到自豪，还要为了国家、人民和地球的福祉做好保护自然资源并使之增加的准备。假如没有多边合作，环保基本没有出路。这一任务具有全球和联合性质，是强大的正面议程，具有凝聚广泛社会运动和诸多国家的潜力。可行的口号是“我们一起拯救地球”。

同样重要的是，保护大自然的议题可团结俄罗斯国内几乎所有人，包括自由派-西方派、国家主义者和当代斯拉夫派。

环保并非总是低成本的。但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早晚都得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发展已到达极限。气候变化就是鲜明例证。需要一套新的哲学发展观，既能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又能改善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最好主动制定并落实哲学发展观，设定主题和方向，从

中获取政治和经济效益，而不是被动反应，以至落于人后。不要再重复“绿色运动”（在西方持续过度消费中产生）的口号和要求，而应同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例如在金砖、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倡议），还有理智的欧洲国家一起，共同提出自己的观念。罗马俱乐部 2019-2020 年之交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关于新的发展哲学的有益观点。

俄罗斯对自身、对世界使命的表达和外交认同都指向未来。和平问题、选择的自由和环保问题只能越来越迫切。

上述三种思想——捍卫和平、维护主权，选择自由，为保护人类自然环境而防治环境污染——即便在未来才能被接受，也没有穷尽所有俄罗斯可以为本国和世界提供的思想。

显然，具有优秀传统的俄（苏）多民族文化，特别是文学、音乐和电影，被公认为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虽然仍在发展，但也要不断进步。这种文化将我们与原苏联空间的人民乃至全世界团结在一起，是俄罗斯的核心认同，但也遭受了部分损失。部分专家认为，亚洲主要国家对俄罗斯文化（包括当代文化）的需求正在增长。

在应对疫情影响的同时，不要忘记其他重大挑战和长期任务。当前的文明模式和世界体系已步入系统性危机。必须与许多显现出来的问题做斗争，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这方面若想取得成绩，关键在于要避免战争。

尤其应当关注未来世界建构的研究和推进工作，俄罗斯将发挥推动的功用。但谈论这种世界格局的现实轮廓还为时过早。目前只呈现出旧秩序解构的趋势，但作为俄罗斯政策的最高目标，捍卫和平的观点针对的正是未来的世界建构。

俄罗斯为本国和世界提出的这些“国家思想”的优势在于成本相对较低。这些思想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和内政方向（尽管要适应内政，要大规模动员公众和精英），俄罗斯不要求它国要符合某种理念，也没有义务为别国的发展承担财政支出。这里指的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政策在思想层面的表述，它反映的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竞争优势（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有吸引力），强调的是俄罗斯对国际事务的积极贡献。

以上思想的提出，应该有助于俄罗斯在世界上为自己获得新定位。我们

是谁？只是实力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国家吗？只是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吗？只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吗？还是都包括在内并加上对自身和对世界的新内容？这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

四、为实现新思想对俄罗斯和世界提出的若干建议

藉卫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二战结束以及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纪念日之际，俄罗斯可以呼吁：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危险正与日俱增。它们之间的任何军事冲突都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俄罗斯应与其他负责任的大国及国际社会一起宣告：捍卫和平、防止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这是俄罗斯的重要使命，也是其国际认同的基础，是俄罗斯作为大国存在于世的要义，也是其对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该领域，俄罗斯政策的核心要素是：减少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及升级为核战的可能性，限制军备竞赛，加强俄罗斯在调解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强化俄罗斯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减少大国间战争威胁的政策有全球意义，首先在于加强核遏制，形成和推动（多边）战略稳定的新哲学观；同时又有区域意义，有助于减少在欧洲、亚洲和中东这三个在国际安全和全球稳定方面至关重要地区的战争威胁。这些地区的战争有可能把世界大国卷入其中，并演化为世界大战。

我们没有把关于减少某些区域发生大规模战争危险的具体建议写在报告之中。如有必要，可召开专门的情景分析会，研究该问题并予以介绍。

（一）减少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加强多边战略稳定

大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核战争，依然是和平、安全与整个人类文明面临的主要威胁。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再次升高（据评估，已经接近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此外，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核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某大国率先对另一国实施突然性的核打击，而是由于政治危机升级到了非核战争状态，进而发展为核军事冲突，或由于误判、挑衅引起。

在新的地缘、政治和技术条件下，预防战争的政策显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做法和观念（保持战略均势，限制和削减核弹头及运载工具）。如果仍然

按照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所采用的方式开始新一轮军控，只会增加不信任感，弱化威慑并加剧紧张局势。必须致力于减少存在于核国家之间的一切战争威胁，这是当今时代的主要威胁。为此，首先有必要改善核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加强相互制约，开展有关支持全新意义上的多边战略稳定的工作（尽管从长远来看，裁军和消除核武器才是最佳目标）。

（二）提出多边战略稳定的新哲学

推进减少核国家之间战争威胁的政策，可能要从使用和普及“多边战略稳定性”这一新概念开始。应强调新概念的包容性及其与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 20 年使用的经典概念“战略稳定性”有所不同。“多边战略稳定性”可定义为“核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状态下，拥核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或者风险很低，军事冲突升级到核战水平的危险同样不存在或很低。”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核武器，而且适用于被大国用来对彼此进行战略破坏的所有类型武器；该概念不仅关涉核战争，还包括核国家之间的所有军事冲突，非有意为之的也包括在内；指涉对象不仅是俄罗斯和美国，还包括所有拥核国家。

世界上许多国家可能会接受对战略稳定性概念的调整，这些国家把俄美双边削减和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进程以及传统的战略稳定性概念，视为冷战时期的一种老旧套话。的确，就目前而言，某个核大国突然对另一个核大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类似网络领域的“灰色地带”发生意外冲突并进一步升级到核冲突，国内或地区冲突升级，这些危险都是现实存在的，涉及世界上很多国家，是大家共同关切的问题。

对多边战略稳定性的全新理解创造了一种条件，能使核大国的专家以及精英代表就减少战争危险的问题开展政治上的讨论，重点关注最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因素：拥核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以及缺乏对抗规则；拥核国家之间的对话机制不畅或缺乏对话；高度不信任；新的作战环境（网络空间、外太空、可能使用生物或基因武器）中缺乏行为准则；破坏稳定的各种类型武器的扩散，模糊了核武与非核武之间的界线。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作为发起此类对话的最佳论坛，原定于 2020 年 9 月在纽约召开。但由于各种原因，有可能无法举行。因此，推

进这一理念就不能单指望这样的会议。

由于多边战略稳定性概念建立在减少核大国之间战争威胁的基础之上，因此，俄罗斯可建议核俱乐部的所有正式成员（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接受一项宣言：国与国之间不使用任何武力，以免核升级以及发生危害地球和全人类的核灾难。最好把它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的成果之一。同时，应继续说服美国再次核准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1985 年达成的彼此不发动核战争的声明。如果美国拒绝，则杜绝核战争的声明必须通过俄印中三国机制、甚至要联合法国和英国一道推出。

（三）加强双边及多边威慑力

由于信任普遍缺失、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斗争日益尖锐、美国为保住渐行渐远的领导权而挑起冲突、传统军控机制和游戏规则瓦解等原因，加强相互威慑（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是减少核国家之间以及大国之间战争威胁的有效途径。核大国的军事政策不应指望通过解除核武器的美好幻想来实现所谓的“打破威慑”，而应寄希望于相互加强遏制能力。

意识到无法赢得战争，是克制使用武力、降低对抗程度的最佳动机。俄罗斯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没有耗费大量资金。最新的战略武器，首先是高超声速武器，不仅打消了西方获得对俄军事优势的企图，而且抑制了军备竞赛。对另一方而言，军备竞赛将耗资巨大。即便爆发军事冲突，俄罗斯常规威慑力量的现代化将抑制使用核武器的冲动。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叙利亚的果决行动，在乌克兰和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削弱了西方的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俄罗斯还在增强其伙伴的威慑力，例如在中美之间，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预警系统。这种系统可增强稳定性，减少由于误判引起的战争。俄罗斯非但不会背负巨大开支，反而可获得经济利益。

我们应继续坚持提高俄罗斯核与非核威慑力的方针，同时提高警惕，以免陷入军备竞赛，并将国防开支保持在 GDP 的 4%-5%。与全球威胁的规模相比，这一比重已经是最低限度。俄罗斯以少于美国和北约几十分之一的投入取得了重大成绩，国防政策不仅为俄罗斯带来了政治与地缘利益，而且还有经济收益（拓展市场和出口高科技产品）。为了不被卷入新的军备竞赛，应坚持研制先发制人的新式武器，但不必转向大规模生产。当然，有必要继

续规避与美国保持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略均势原则（战略核力量的数量接近），也没有必要对等回应美国在军事-战略领域和官方、学说、公开讨论领域的活动。也许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其他非西方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它们（首先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自主的作用。

在官方层面，有必要定期重申，谁也不能对俄罗斯进行“有限”核战争、在欧洲对俄发动核战不可能不殃及美国本土、在大规模常规战争中不可能打败俄罗斯等观点。俄罗斯已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给予了暗示。这类声明最好发表在最高级别的政治会晤中，并将其记录在正式文件中。也许应明确指出，如果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地面核武器和中程导弹，莫斯科将被迫正式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

（四）加强核大国之间的对话

当然，减少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不应局限于加强军事威慑这一种方法。建立和加强双边和多边对话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显然，这些对话的重点不是进一步削减军备，这种尝试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美国当前针对中俄营造出事实上的冷战政治气氛，只会进一步恶化政治关系，增强不信任感。从减少战争威胁、加强信任、设法取得积极成果的角度看，更重要的议题是消除冲突和增强战略稳定性。这类谈判可采用其他核国家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可以是所有核国家，或正式的“五大核国家”，或“俄-中-美”大三角，或“俄-中-印”，或同美国、中国、印度、法国、英国、巴基斯坦进行双边对话，未来还可以加上以色列和朝鲜。

就消除冲突而言，值得尝试就海上、陆地、水域、空中、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达成一致，禁止发生更危险的行为（危险接近、无应答飞行、对重要军事和战略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创建和巩固日常及紧急时刻使用的军事热线及其他交流机制，相互通报武装力量的重要动向，允许观察员参加演习。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工作应致力于消除军事领域的冲突，并拟定行为规则。

根据俄罗斯的倡议，在叙利亚建立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系统，这是防止发生军事冲突的成功案例，可避免在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危险局势时有发生）。2016年，俄罗斯建议北约国家、瑞典和芬兰等国在波罗的海地区领空采取新的安全措施，规定军用飞机必须开

启雷达应答机。尽管该项倡议未得到北约的支持，但值得继续推进此项及其他倡议，包括在其他有核国家（如中-印）之间推行这类倡议。

还有必要提议在俄罗斯和北约相邻的整个空间建立完全意义的消除冲突机制，类似于叙利亚现有的机制。这类倡议应尽可能经常地向公众告知。北约不想减少对抗强度（主要是为了证明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这类倡议经常被其隐藏起来，甚至不让“自己人”知道。

（五）加强预警和信任措施

提高军事领域（特别是战略层面）的预警机制，是减少核国家之间战争威胁的主要方式。需要在可预警和不确定性之间坚持“不偏不倚”。这种方法可增强威慑力，既没有压制其完善军事技术的可能，又可降低危机风险。加强透明度和信任度的措施与机制是确保预警的基本方法，一些协议和公告中包含了这项内容，如《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开放天空条约》（1992年）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维也纳文件》（2011年）。如果美国不同意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则有必要提议，哪怕内容有所删减，也要保留其中关于透明度和信任度的措施，以巩固预警机制。

同时，我们认为，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如德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提议强化《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维也纳文件》）谈提高透明度尚不切实际，因为这会加强对俄罗斯军事活动的管控，却不能消除导致军事政治局势恶化和战争威胁加剧的主要原因——美国和北约的对抗政策。鉴于此，建议不强调开放本身，而应着眼于拟定行为准则，管控诸如网络空间等存在军事升级威胁的最危险领域，同时把加强信任与减少政治对抗相关联。另一方面，与非西方国家（如在金砖、俄中印、上合组织框架下）进行军事领域透明度和信任度的多边机制谈判是可行的。

组织有核国家之间（没必要让其他国家不劳而获）开展军事理论和核理论对话，这是提高透明度和预警的重要方式。俄罗斯可提出进行这类对话的倡议，可与美国进行双边对话，亦可进行包括俄印中机制在内的多边对话。

（六）改善核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降低对抗强度

俄罗斯应不断声明，加强和平不仅需要改善（或缓和）俄美关系，还需要改善（或缓和）美中和中印关系，并提出具体的行动举措。

可提议在上合组织和俄印中三国机制框架内，俄中印就多边战略稳定性新观念以及加强军事领域的互信进行谈判。在上合组织和俄印中三国机制框架下，加强在阿富汗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激进极端主义和毒品问题方面的一体化合作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俄中印在这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应让印度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对接的对话，并就“大欧亚伙伴关系”开展三方讨论。最好签订“欧亚经济联盟-印度”贸易协议。在未来举行俄中印三边联合军演。

可适当调整俄罗斯关于“印太地区”（Indo-Pacific）概念的措辞，同时继续对美国的“印太”概念进行批评，但不针对该概念本身。除美国外，日本和印度也在推进“印太”概念，它们的理解与美国有本质区别，并不明确强调遏制中国，更不要说针对俄罗斯了。此外，印度和日本都主张与俄罗斯保持密切互动，主张莫斯科作为独立角色积极参与解决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俄方支持印度是太平洋地区领导者之一、赞同印度和日本关于将“印太地区”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的想法，这样的态度将加强莫斯科同新德里和东京的关系，巩固俄罗斯作为独立大国的地位，降低阵营对立的风险。

此外，有必要提出“印太地区”（非美国理解意义上的概念）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与互补，反对美国将二者对立起来。加上印度、日本和韩国对欧亚进程表现出很大兴趣，而印度则通过上合组织和中亚政策直接参与其中。相应地，欧亚经济联盟今后不仅可以与印度，而且与日本和韩国，进而或同时与中国，签订自贸区协定（我们对经济的预测表明，未来5-10年，此类协定可能比现在更具吸引力）。

建议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对话，并开始恢复双方境内使领馆的正常工作，克服2017-2018年的外交危机。俄罗斯在抗疫期间向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一步好棋。

有必要恢复与西欧大国就安全问题的对话，以此推进这些国家的战略独立性。已与法国开展了类似的对话。俄罗斯恢复了与法国、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谈。与欧盟对话的重点是气候、环保和非军事领域的网络安全。但最主要的是与一些欧洲国家就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北约仅讨论军事问题。与欧安组织主要讨论乌克兰问题。显然，欧安

组织无望成为可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平台，在乌克兰危机之外，欧安组织很难解决其他危机。必须指出，当欧安组织被用来阻碍构建泛欧洲安全体系时，欧安组织间接地推动了乌克兰危机。

许多专家主张在整体上缓和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减少对抗强度和军事活动。北约故意加剧紧张局势，以维系其日趋减弱的合法性。不值得与之周旋。我们不止一次提到，不能在俄罗斯-北约委员会框架内恢复政治对话，这样做只能将北约合法化并延长其寿命。取而代之的应是俄罗斯与单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瑞士、奥地利和芬兰）一对一进行军事对话。同时我们一再强调，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政治对话毫无意义，而且会适得其反，俄罗斯需要逐步孤立这些国家。

有必要持续不断地向欧洲公众宣传这样的论点：北约欧洲国家的军事开支比俄罗斯高出若干倍。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9年的数据，连法国的军事开支都高于俄罗斯。

我们认为应继续向欧洲国家申明，如果欧洲发生大战，其主要诱因是继续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拉进北约，试图将白俄罗斯拉入西方阵营，以及接二连三策划“颜色革命”。然而，期待北约正式撤回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关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承诺是不现实的，所以有必要说服欧洲的政客和学者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从正式议程中删除。此外，还应以非正式的方式，为乌克兰、格鲁吉亚与北约的合作划上“红线”。这里指的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举措，如在乌、格境内建立北约永久性军事基地，提供可与具有技术装备武器（导弹防御和防空设施等）的对手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武器。

（七）为最容易爆发和升级战争的危險领域制定行为准则

我们认为，减少核大国之间战争威胁的重要方法，是在多边机制中形成“灰色地带”行为准则，并让更多国家接受。“灰色地带”指战争与和平、核武与非核武之间界线模糊的区域，以及军事冲突可能升级到核战的高风险区域。首先是网络手段、常规精准打击武器、外太空武器（在太空中部署瞄准地球目标的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反卫星武器、中短程陆基与海基导弹、军事领域应用的人工智能等。目前这些武器在军事中的作用正在增强。在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中（尤其在初始阶段），这些武器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

但是却缺乏其使用和研发规则，更何谈限制机制。俄罗斯已在这些领域提出许多重要主张。

在军事网络安全方面，如上合组织在 2009 年叶卡捷琳堡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2011 年，俄罗斯向联合国提交了“确保国际信息安全”公约草案，其中包括防止网络空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措施。在 2011 年和 2015 年，俄罗斯和上合组织国家提交“国际信息安全领域行为规则”供联合国审议，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未能通过。2015 年，俄罗斯和中国签署双边《国际信息安全合作协定》。2018 年 11 月，俄罗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项新的决议草案——《国际安全语境中信息和通讯领域的成就》，其中提到各国应该对网络空间行为负责的准则，该草案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俄罗斯主张，不允许在外太空部署武器，并应在联合国层面通过相应的多边条约。早在 2004 年，作为签署此类条约的第一个倡议者，俄罗斯就做出单方面承诺，即不首先在外太空部署武器。2005 年，所有集安组织国家均确认了这一承诺。2014 年，俄罗斯和中国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在 2017 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中俄还提出了更新版条约草案，并得到其他国家的一致支持。条约禁止在外太空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禁止对外太空设施采取任何武力行动。美国反对这项条约。2016–2017 年，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框架下，俄罗斯与美中一起，共同推动了一项倡议，讨论外太空活动的透明度和信任度问题，防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最后，2019 年，俄罗斯和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重申，有义务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

2019 年，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北约国家领导人、北约秘书长、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和中国领导人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暂停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同时强调，莫斯科已做好准备接受相应核查。北约国家中，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愿意考虑俄罗斯的提议，此前他曾表示需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尽管如此，莫斯科仍坚持单方面承诺，不首先在欧洲和其他《中导条约》覆盖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这些举措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美国近期仍会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应集中精力在非西方国家和西欧推广这些主张。特别是将俄中在信息安全和不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方面的倡议，拓展到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充分利用“金砖+”机制（特别是在俄罗斯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和联合国大会平台。应与欧洲国家就军事方面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就《中导条约》和外太空问题开展双边对话，建议欧洲国家支持俄罗斯的主张，或者共同提出主张。

北约认为可以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但不可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对此一如既往地反对。因为很难保证这类常规导弹在紧急情况下不被启用，特别是如果将这些武器部署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会陡增战争危险，导致各方正式宣布将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此外，为减少战争威胁，俄罗斯应该提出军事方面的新举措，涉及网络安全、常规精准打击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和人工智能。

在军事通信技术方面，列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清单，建议其他国家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此类目标进行网络攻击。清单至少应包括核综合设施和对其进行管理的通信系统、导弹预警卫星、政府通信系统、核电站、大城市的供水系统。最好把这项大规划纳入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应决议之中。当然，首先应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俄印中三国机制的框架下实施，之后尽可能与美国、北约、中国、印度和北约的欧洲国家进行双边会谈，让大家接受俄罗斯提出的相应规则。

在精准打击武器方面，永远禁止在距离对方边境较近的地区部署此类武器，因为这可能威胁到对方的核威慑力量和其他战略力量。建议创建透明度系统，将核武和常规装备中的精准打击武器分开，并考虑互相通告可携带核弹头的精准打击武器的移动和部署情况。

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方面，应与美中印以及欧洲国家进行多边和双边对话，就人工智能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在核国家之间挑起战争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制定在军事领域运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和规则，哪怕只有政治宣言的性质。对无人机和机器人的日益重视，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日臻完善，人类直接参与的军事行动在显著减少，这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门槛。会造成失控的

军事-政治局势，本质上提高了包括核战在内的战争风险。

关于俄罗斯的反导防御问题，有必要申明的是，不允许任何一个核大国建立全面覆盖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并建议发表相应的多边宣言。尤其是美国明确表示将在外太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是破坏稳定的行径。应建议有核国家就建立反导防御系统（地理位置、数量和质量）的标准展开对话，讨论导弹防御系统限制核威慑的能力，讨论提高透明度措施和交换导弹威胁信息。可借鉴美俄、俄罗斯与北约在 2010-2011 年关于导弹防御的谈判经验，当时已提出一些好的想法，如加强合作、减少这些系统的不稳定因素等。

（八）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我们认为，为加强多边战略稳定和减少战争威胁，俄罗斯所做的重要努力之一，是推动了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至 2026 年的动议，这是目前仅存的机制，可保障战略核力量领域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此外，一些专家还建议，即使该条约效力终止，也应建议保留条约中的透明度措施（相互告知战略核力量的状况并进行检查）。

同时，暂时不宜也不应该在当前条件下开始新一轮核武削减和限制谈判，包括与美国的双边会谈、中国参与的三方会谈。这种尝试肯定会失败（现在和可以预期的未来还不可能就减少和限制核武器达成一致），也会出现相互指责对方敷衍塞责的问题，使关系恶化，甚至引起新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主张把条约生效后开发出来的最新载具纳入到《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中，表明俄致力于减少战争威胁和限制军备竞赛。美国认为有必要扩大对战术核武器（ТЯО）的限制，并以此作为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不仅继续反对这一立场，而且要说明这一立场的危险性，即，有可能导致限制军备竞赛等机制彻底瓦解，加剧俄与北约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政治紧张局势。

（九）将高超声速载具定义为限制军备竞赛的工具

必须指出，俄罗斯研制包括高超声速载具在内的新型战略系统，是为了限制而非挑起军备竞赛。而且，近些年来俄罗斯不会增加国防开支，也不会战略核力量方面追求同美国一样的数量均势。俄罗斯遭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批评，认为该系统开启了军备竞赛的新方向。若想驳斥这种批评并推进世界

和平，单凭自豪感还不够（俄罗斯高超声速武器领先美国），还应将其定性为加强军事威慑力、限制军备竞赛、限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理应强调的是，拥有这种系统使得核战争和常规战争没有赢家，这样做可减弱使用这些系统和军备竞赛的动机。此外，新一代战略武器导致现有的军事资产贬值，弱化航空母舰和其他系统的威力。最后，它可以使目前的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失效，限制甚至阻止军备竞赛。

因而应正式宣布，鉴于俄罗斯已拥有高超声速载具，与美国保持战略核力量均等已不再是俄罗斯国防政策的必要事项，即便华盛顿决定扩大其核武器库，莫斯科也不会追随。在《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效力终止之时，发表此声明将特别重要。最好由最高领导公开声明，俄罗斯视新式高超声速武器为反击性和反击报复性武器，而不是用于先发制人（已经有人提出异议），因此要限制产量，不超过反击所必需的数量。同时还应声明，如果美国或其他国家研制出类似武器，俄罗斯也不会追求数量均等或数量优势，因为只要拥有一定数量，就足以在反击行动中重创敌人。

必须强调，这种单方面义务并不意味着终止现有武器的升级或新型武器的研发。当然，新型武器的研制应当遵循新概念中的理性“充足”原则，不追求数量均等或数量优势。

（十）未来应形成新的军控机制

尽管目前及短期内无法就缩减和限制武器问题达成新协议，但一些专家认为，长期来看，有必要研究这类机制，除核武器外，未来机制应把所有破坏稳定的武器都纳入其中：外太空基站、精准打击武器、导弹防御系统、激光武器、高超声速武器；应对网络攻击制定更严格的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

但是，为达成这些协议，首先要消除美俄和美中之间的对抗，改善中印关系，并在核大国之间形成更为积极的互动。至少，美国应放弃在军事战略上凌驾于其他大国的企图，不再把军备竞赛或军备竞赛的风险作为经济围剿和对抗的政治工具。其次，让所有核国家都接受统一的（多边）战略稳定性观念，开展相应对话，为存在战争风险的领域制定行为准则，采取部分透明和信任的措施。

长期来看，有必要重申和落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履行彻底核裁军

的义务。相应地，重申俄罗斯对彻底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危险武器的支持立场。前提当然是：新型大国关系在本质上应区别于以往的国家关系，不存在战争威胁，而且伙伴和信任（而非遏制）是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的基础。

（十一）申明坚守不扩散核武器（同时做好应对发生核扩散的准备）

俄罗斯申明，坚守不扩散核武器，这是加强战略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实际上已是该机制的主要捍卫者。首先，俄罗斯与中国共同作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缔约国，确保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完全遵守协议并挽救协议（尽管欧洲国家实际上致力于让《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失效，并归咎于伊朗）。第二，俄罗斯与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共同秉持负责与平衡的立场。第三，俄罗斯阻止了美国在无核国家中用强力改变政权的政策。美国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武装干涉，是数十年来对核不扩散的最严重打击。

美国试图通过双边对话迅速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这再次说明多边机制以及俄罗斯参与“六方会谈”的必要性。俄罗斯应加强与朝鲜的对话。或许应提议举行俄中朝三方会谈，或者韩国参加的四方会谈。

如果《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最终失败，俄罗斯应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国际制裁，也可加强与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向其提供包括先进防空系统在内的武器（同时要防止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的急剧失衡），建议国际社会讨论如何保障伊朗的安全，以换取其放弃军事核计划。

同时，俄罗斯应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 21 世纪 30 年代初期至中期亚洲和中东可能出现的核武器扩散问题（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十二）俄罗斯是“新不结盟”的保障者

巩固俄罗斯作为捍卫者（维护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主权和多样性）形象和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把俄罗斯定位成“新不结盟”的保障国，使很多国家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以此保持对内及对外的独立性。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世界会违中国之愿形成类似于两极的格局。美国对此推波助澜，在其作用下，世界形成两极集团对抗的威胁增强，美国直接或者间接逼迫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可能也会陷入复杂的境地，但它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

小伙伴；诚然，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弱于 21 世纪的超级大国。

出路是将俄罗斯定位成“新不结盟”的领导者（一方面与中国保持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努力与美国形成更加良性的关系）。同时，对于不想被迫做出非此即彼战略抉择的国家而言，这种定位能使俄罗斯成为颇有吸引力的伙伴。如今许多这类国家已将俄罗斯视为“仲裁平衡者”，与俄罗斯合作可以巩固其地位和独立性，在此过程中，俄罗斯既不能也不想将自己的霸权强加于人。可公开宣示俄罗斯的新使命是“新不结盟”和“捍卫主权”，在莫斯科举办“新不结盟”创始峰会，邀请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参加。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美国的正式盟友也可参与其中。

当然，俄罗斯应与现存的不结盟运动保持密切互动。也许应提议将俄罗斯的主张（保护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主权和多样性）与新不结盟运动结合起来。该问题尚需研究，包括与现有运动的非正式领导者——印度，一起研究。这样，不结盟运动将合而为一，俄罗斯和印度是领导国。

（郭小丽、王旭译，郭小丽 校）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Russian Higher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upported by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State Duma) believes that the main theme of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 is to establish a new order. In this process, it is not only the “unipolar” or “bipolar” era but also the West’s dominant position in military, economic,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in the past few hundred years that is drifting awa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ensuing economic crisis have not changed the basic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instead have intensified existing contradictions like a catalyst and accelerated the redistribution of various forces worldwid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in recent years Russia has achieved major achievements and victories in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Nevertheless, they need to be fully expressed and explained. Meanwhile, it is imperative to expand new foreign policy horizons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ideological guarantee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is first to

maintain peace; second to support countries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their own development models; third to jointly protect natural environment,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to respond to new global challenges including epidemics.

【Key Words】 New Thinking of Russian Diplomacy, China-U.S.-Russian Relationship, Multilateral Strategic Balance, the World Order

【Аннотация】 Авторы дан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МИД Росс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главная тем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уход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днополярная» или «биполярная» эпоха, но и доминирую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Запада в во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областях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сотен лет.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и последовавший за н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не изменили основн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 как катализатор усилили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ускорили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сил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В докладе отмечается, что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Россия добилась круп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и побед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обороне, но э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выразить и объяснить,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сширить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гарантии. Основ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мира; поддержка стран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м выборе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местная защит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укрепл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реагирование на новые глоб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включая эпидем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ово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баланс,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文学与政治**索尔仁尼琴：生活与创作***

刘文飞**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俄国作家之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生活与创作的概括描述和具体分析，通过对其《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家》《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红轮》等代表作品的细读，归纳其创作的艺术特色，并对其“艺术性调查”“微型散文”“两段式短篇小说”“节点式系列长篇”等体裁进行介绍，旨在揭示其创作的整体风貌，界定索尔仁尼琴创作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文学 劳改营文学 《古拉格群岛》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4-0118(35)

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于2008年去世后，世界关于他的谈论似乎在减少，因为在俄罗斯，他与之不懈抗争的体制已不复存在，他和他的预言自然会被逐渐遗忘；而在西方，这个总是对西方社会指手画脚的老人终于离开，他连同他那些“迂腐的”道德说教便也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可是在当下的俄国文学中，人们面对这位大作家离去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却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项目批准号：17ZDA283）的阶段性成果。

**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18 年 12 月 11 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Кисловодск）。他是遗腹子，在他出生前六个月，他父亲伊萨基·索尔仁尼琴在一次打猎中意外负伤，因感染去世。他的母亲塔伊希娅·谢尔巴克是乌克兰人，出身库班富农家庭，曾在莫斯科农业女子学校就读，懂多门外语。丈夫去世后，她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成人，并带儿子迁居顿河畔罗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靠打零工供养儿子上完中学。1936 年，中学毕业时获金质奖章的索尔仁尼琴免试进入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大学期间，索尔仁尼琴在专业学习之余做家教，自食其力，同时也未放弃在中学时就产生的文学写作兴趣。1939 年夏起，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学习。大学四年级时，他与同学娜塔丽娅·列舍托夫斯卡娅（Наталья Решетовская）瞒着家人偷偷结婚。

1941 年 6 月，索尔仁尼琴以优异成绩自罗斯托夫大学毕业，随后前往莫斯科，打算参加文史哲学院的夏季考试。恰在此时，他在宿舍的广播中听到卫国战争爆发的消息。他返回家乡，在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一所学校短暂任教。10 月应征入伍，在畜力辎重队喂马，次年 4 月被送入科斯特罗马炮兵军校，11 月毕业时获中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炮兵声源侦察连连长。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先后获卫国战争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 年 2 月，因在给朋友的信中对斯大林表示不满，已获大尉军衔的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被押回莫斯科。他在监狱中听到莫斯科红场燃放的四十响礼炮，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但这位战场上的功臣却被判处八年劳改外加终身流放。他先后在多处劳改营服刑，做过搬运工、泥水匠、图书管理员、石匠等各种工作。在此期间，妻子与他离婚。1953 年，服完八年徒刑的索尔仁尼琴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捷列克（Кок-Терек），直到解冻之后的 1957 年才被平反。

在漫长的劳改营和流放地生活中，索尔仁尼琴身上发生过两个奇迹：一是他数次身患绝症，却都神奇地痊愈。1952 年 2 月，他在埃基巴斯图兹（Экибастуз）劳改营接受了腹股沟恶性肿瘤切除手术，主刀医生是在押囚

犯，劳改营里的医疗条件之恶劣不难想象；这年 11 月，已服完苦役的索尔仁尼琴因身体不适去江布尔州立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因癌症扩散，他的生命只剩下三周时间。1953 年底，他获准转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肿瘤医院接受放化疗治疗，短短几周的治疗之后他居然彻底痊愈。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没有死掉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①他身上发生的另一个奇迹，就是他的文学写作。在第一处服刑地，索尔仁尼琴便已开始秘密写作，他用打腹稿的形式写诗作文，写成后反复背诵，他就这样背诵了数万行诗句和多篇小说。索尔仁尼琴后来说：“被捕之前我对许多奥妙全然不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就倾心于文学，却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文学和文学为什么需要我。只是因为很难为小说找到所谓的新鲜题材而黯然神伤。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会成为作家的。”^②可以说，是监狱生活把索尔仁尼琴塑造造成了一位作家，至少，是把他塑造成了他后来这种类型的作家。

1956 年 8 月，索尔仁尼琴来到苏联腹地，在弗拉基米尔州的米里采沃村落户，仍在学校当教师。次年，他与前妻破镜重圆，随后迁居妻子的工作地梁赞（Рязань），在梁赞第二中学任物理老师，同时开始正式的文学写作，他搜集各种相关材料，为他的劳改营题材文学创作做准备。1959 年 5 月 18 日起，他用 45 天时间完成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小说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1962 年第 11 期刊出后引起巨大反响，44 岁的“新作家”索尔仁尼琴从此扬名天下，并迅速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甚至差一点获得苏联文艺最高奖——列宁奖。解冻时期结束后，索尔仁尼琴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作品被禁，但他仍坚持地下文学写作。后来成为索尔仁尼琴第二任妻子的娜塔丽娅·斯维特洛娃（Наталья Дмитриевна Светлова/Солженицына），就是他当时从事地下文学工作的好帮手。

① 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陈淑贤、张大本、张晓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年，第 4 页。

② 同上，第 3 页。

1967年5月，在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代表发出一封公开信，抗议苏联的书刊审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在这之后，他在文学界和社会上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不久，他的作品在西方出版，这更加剧了他与官方和官方文学的激烈对峙。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以表彰“他在继承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体现出的道德力量”。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他的获奖也在苏联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他也因为担心出境之后无法返回祖国而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他并未发表声明拒绝诺贝尔奖，反而提高了与当局对抗的调门。1973年，他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1974年，他的代表作《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在西方出版。这两件事彻底激化了他与苏联当局的矛盾和冲突，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被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并被剥夺苏联国籍。根据他事先安排，他秘密写于1972年的“道德革命纲领”《不靠谎言生活！》（Жить не по лжи!）被立即公布出来，他还有意把这份公开信的落款日期标为他被捕的那一天。他在信中对苏联知识分子发出呼吁：别让自己写出哪怕一行歪曲真理的文字，无论是书面文字还是口头文字，最可行的方式就是，“个人不参与撒谎！即便谎言覆盖了一切，控制了所有人，我们仍要守住底线：别让谎言通过我起作用！”从此，“不靠谎言生活！”，索尔仁尼琴喊出的这个时代强音，就成了当年和后来许多苏联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流亡的索尔仁尼琴先到西德，后落户瑞士苏黎世，最后于1976年定居美国佛蒙特州的小镇卡文迪什（Cavendish）。索尔仁尼琴初到美国时受到热烈欢迎，他接到很多邀约，四处演讲，还受到美国总统的邀请。但是不久，索尔仁尼琴体现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立场，让美国社会对他产生警惕，使他在美国也迅速成为一位新的“持不同政见者”。他1978年6月8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著名的《哈佛演讲》（Гарвардская речь），就是他此类观点的集中体现。他在演讲中激烈地批评“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式价值观，认为整个西方只有严厉的法律规范，却无深刻的道德规范，而缺乏精神力量的社会和人是缺乏勇气的。他的这番言论让美国当局和

许多美国人心生不满，这位“忘恩负义的孤僻老头”很快便在美国遭到冷遇。1984年，他因为小说《1914年8月》（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的发表甚至被召至美国国会出席所谓“索尔仁尼琴案”听证会。不过，这样的社会处境反倒为索尔仁尼琴创造了更安静的写作环境，他在他的森林木屋中潜心写作，写出大量作品。

苏联解体之后，索尔仁尼琴被视为俄罗斯社会新变革的“功臣”和“英雄”，他当年的案件被撤销，他也被恢复国籍。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返回俄罗斯。他的回国之旅是一场凯旋般的归来，他从美国阿拉斯加起飞，经停马加丹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初升的朝阳一同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至莫斯科的旅程，索尔仁尼琴整整走了两个月，他乘坐专列式火车，在沿途的每个城市都作停留，会见当地官员和民众，他想用这种方式“走遍”阔别的祖国。7月21日，索尔仁尼琴终于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车站里人山人海，索尔仁尼琴受到众星捧月式的热烈欢迎。但是，回到祖国的索尔仁尼琴很快就对叶利钦及其幕僚发出抨击，认为他们“误国误民”。他接受了叶利钦赠送的位于莫斯科郊外圣三一雷科沃（Троице-Лыково）的一栋别墅，却拒绝了叶利钦在他80岁生日时授予他的圣安德烈勋章（Орден Святого апостола Андрея Первозванного），并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罗斯带入灾难的权威那里接受奖赏”。他在国家杜马发表演讲，阐述他的政治纲领，却遭到包括盖达尔、丘拜斯等政坛新贵们的嘲笑。普京执政以后，索尔仁尼琴与当局的关系似有所缓和，他曾在家中接受普京的探访和褒奖。1997年，索尔仁尼琴由于编纂《俄语扩展语字典》（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в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等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同年，由索尔仁尼琴夫妇创办的“俄罗斯社会基金会”设立的“索尔仁尼琴文学奖”（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开始颁发，现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进入21世纪后，耄耋之年的索尔仁尼琴渐渐淡出政治和媒体，在与高血压、心脏病和颈椎病等疾病顽强抗争的同时，他仍不懈地继续他的写作事业，同时编辑30卷本《索尔仁尼琴文集》。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郊外的家中去世，此时离他90岁生日仅差数月。

二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篇幅不长，译成中文还不到十万字，但却以小见大，成为 20 世纪俄国文学中最为厚重的作品之一。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即 1951 年 1 月的一天，严格地说，还只是从他的起床写到他的就寝。早上 5 点钟起床时，舒霍夫就感到不舒服，可他还是因为起床动作慢了被罚去给劳改营看守们擦地板。在医务室，他没有得到治疗却受到威胁，于是，在喝下一碗不热的稀汤之后，他和其他犯人一起在零下 27 度半的严寒中被赶到工地，干了一天重活，来回途中还遭遇数次严格搜身，在临睡前又遭遇两次“点名”，之后，舒霍夫终于“用没有洗过的薄薄的棉被把头蒙上了”。然而，这样的“一天”却是舒霍夫的一个好日子，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对舒霍夫的“一天”作了这样的总结：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被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钵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他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札里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天。

不过，紧接在这段话之后出现的两行字，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幸福”的感觉：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 3653 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①

舒霍夫的被关押，是由于他在 1942 年 2 月的西北战场上因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而且这还是他事后自己主动“坦白”的。而他周围的人，几乎全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劳改营：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

^① 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3-114 页。

基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海军军官寄来的礼物；尚未成年的戈普契克因为往森林里给宾杰里人送过牛奶就被判了“跟成年人一样”的刑期；阿廖什卡则仅仅由于信仰上帝而被抓了进来……他们的刑期或为 10 年，或为 25 年，他们的每一天都将这样缓慢地熬过！

小说的情节被压缩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和短暂的时间之中。劳改营的营房和囚犯们干活的工地，这是小说中仅有的两个空间，而且是两个都围着铁丝网、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看守的空间，在这两个封闭场所之间的出入，不仅没有使犯人们（以及读者们）的心理空间有所扩大，反而更加强了他们的不自由感觉。小说的情节发展十分缓慢，节奏十分滞讷，甚至会让人感到难耐和枯燥，其中的一分一秒似乎都是被放大、被延长的，而这正是劳改营犯人真实心理感受的再现。这“一天”是短暂的，也是无比漫长的；是浓缩的，也是无限扩张的。这样的小说空间和时间处理方式，不仅使《一天》成了劳改营残酷现实的真实再现，而且还使这“劳改营中的一天”具有了概括性的象征意义。

《一天》所具有的象征性，还由于主人公舒霍夫形象的典型性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据说，在《一天》的人物中只有这一个虚构的，其他人物均有其真实原型。这个人物身上无疑也有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影子，但作者最终没有让自己来担当小说主人公，却让一个普通的农民士兵出场，大约是想突出劳改营囚犯之命运的普遍意义。舒霍夫是苏联时期劳改营里的一个普通囚犯，正是这个普通人的“普通”遭遇，以及他对于这种遭遇的“普通”态度，才构成了这个文学形象的普遍意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间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怨星期天又被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舒霍夫的态度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命题：对苦难的忍受也表现为一种尊严，面对不公正的命运，活下去就构成一种抗议，一个胜利。

作为个人经历之缩影的《一天》自然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但它毕竟不是一篇报告文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还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俄国文学中，这部作品都占据一个显赫位置，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一天》是在苏联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以苏联劳改营为描写对象的

文学作品，开了 20 世纪俄国文学中“劳改营文学”（лаге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先河，为俄国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 20 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天》只写了舒霍夫和他的狱友们短暂的“一天”，但这“一天”却构成了 20 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中，《一天》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这部小说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作家的诞生，是他在俄国文学中的首次亮相。同时，它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了索尔仁尼琴之后创作的发展轨迹，为他的作品风格确定了基调，也许可以说，作家之后的创作就某种意义而言都是这部作品的继续和发展。索尔仁尼琴造就了《一天》，而这“一天”则反过来又派生出无数个充满艰辛和喜悦、付出和收获的创作时日。

时过境迁，《一天》所描写的特定时代以及使它轰动一时的社会背景如今均已成为历史。当年为其发表而出谋划策、竭力鼓吹的人多已作古。在这段时间内，读者也更替了不止一代。然而，这部小说在当下依然具有阅读的价值和意义。舒霍夫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也完全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为我们所遭遇。生存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和隔膜，甚至敌意和残忍——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存在于劳改营的高墙或铁丝网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说，“劳改营”或许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每个“一天”或许也同样都是与环境命运的抗争。因此，《一天》或许并不仅仅是写给某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读者看的，每个看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人，每个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都肯定能在索尔仁尼琴的这部作品中获得慰藉和启迪。

三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史诗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小体裁散文高手。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主要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他在《一天》之后陆续刊于《新世界》杂志的几个短篇小说，二是贯穿他整个创作的“微型散文”，三是他在回归俄国前后写作的“两段式短篇”。他的短篇小说细腻精致，与他粗犷豪放的长篇史诗构成鲜明对比。

《一天》让索尔仁尼琴一鸣惊人，红极一时。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他流亡境外的 1974 年 2 月，这十多年时间里他仅公开发表了区区四个短篇小说，即《马特廖娜的家》（Матренин двор）、《柯切托夫卡车站一件事》（Случай на станции Кочетовка）、《为了事业的利益》（Для пользы дела）和《“钱袋”扎哈尔》（Захар-Калита）。由于这几个短篇像《一天》一样均刊于《新世界》杂志，故合称“《新世界》小说”（новомирская проза）。

小说《马特廖娜的家》中的女主人公马特廖娜有真实的生活原型。1956 年被平反后，索尔仁尼琴来到弗拉基米尔州泥炭镇的乡村学校任教，租住在村民马特廖娜·扎哈罗娃（Матрена Захарова）家里，《马特廖娜的家》这篇小说就是他为自己的女房东描绘的一幅完全写实的肖像画。索尔仁尼琴曾为马特廖娜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马特廖娜脚穿长筒胶靴，头扎围巾，站在破旧木屋的门旁，脸上露出憨厚的微笑。而在这个短篇小说中，索尔仁尼琴则为我们更详细地展示了她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马特廖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寡妇，孤身一人住在一幢破旧、阴暗的木屋里，她家徒四壁，没有任何财产，家里只有一头瘦弱的山羊和一只瘸了一条腿的猫；她不修边幅，穿着破旧的衣服，也不太会做饭；她经常生病，生了病就不吃不喝躺上两三天，硬挺过来；由于乡村里的官僚主义，她一直没有领到退休金，只能靠在地里种点土豆充饥，靠自己捡来的煤炭取暖。但是，对于集体农庄的工作和同村人的活计，她却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对于新来的房客，她关爱有加，却从不多言多问。马特廖娜生过六个孩子，却全都夭折，她丈夫也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从此没了踪影，有人说她丈夫可能有意抛弃了她，马特廖娜从丈夫的哥哥法捷伊处过继来女儿吉拉，把她抚养成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爱过他的法捷伊带着儿子和女婿，要来拆走马特廖娜木屋中的正屋，把木料拉走，马特廖娜并未反对，还在夜间送拉木料的拖拉机和雪橇上路，结果在铁路道口，她与法捷伊的一个儿子一同被火车撞死。在小说中，除马特廖娜外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私的：当年深爱过她的法捷伊，居然带头来拆她的木屋；被她抚养成人的女儿吉拉，也默许并参与了拆房；马特廖娜的三个妹妹都住在村里，却从不过问她，直到她遇难后才来到她身边哭泣，看能否从她微薄的遗产中分一杯羹。第二年春天，村里的女人有时还会议论起马特

廖娜，说她不会打扮，不会精打细算，不善交际，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之后的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感叹道：

一个没有得到丈夫理解，甚至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一个埋葬了六个孩子的女人，她不善交际，被自己的妹妹和小姑子们视为外人，她很可笑，傻乎乎地帮别人干活却分文不取，因此一直到死也没积攒下任何财产。只有一头脏兮兮的白山羊，一只瘸腿猫，几棵橡皮树……

我们大家就生活在她旁边，却未能明白，她就是一位义人，就像谚语说的那样，没有义人便无村庄。

也就没有城市。

也就没有我们整个地球。^①

索尔仁尼琴在这里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即“没有义人便无村庄”（Не стоит село без праведник），他起初曾想用这句谚语作为这篇小说的题目。的确，这句谚语最好不过地道出了这个短篇的主题，即俄罗斯乡村和俄罗斯大地的存在，就依靠马特廖娜这样有道德、无私利的普通“义人”。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主题，这个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在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反响，被认为后来兴起的俄国“乡村散文”（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的奠基之作。

《柯切托夫卡车站一件事》描写柯切托夫卡车站军代表助理佐托夫一天里的作为，他忙于指挥调度，同时也在阅读《资本论》，思考战争，他关于战争的思考无疑是索尔仁尼琴战争期间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但是佐托夫所做的“一件事”却可能是索尔仁尼琴的合理虚构。年近半百的特维里季诺夫应征入伍，在与预备队一同乘火车奔赴前线的途中，他在一个车站下车购物，火车突然开走，掉队的他手持车站军代表开具的证明，盲目地追赶部队。他来到佐托夫的办公室，与佐托夫交谈起来，佐托夫对这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很有好感，在得知对方是演员后更觉亲近，像是在战争年代遇到了知音。可是突然之间，特维里季诺夫在交谈中无意间暴露了他居然不知道“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原先叫什么，“佐托夫的心顿时沉了下来，变得冰凉！一个苏联人，居然不知道斯大林格勒，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设法稳住对方，叫来士兵，把特维里季诺夫押往上级机关，交给军中的审查机构。几天过后，

① Солженицин А.И. На изломах. Малая проза. Ярославль: Верхняя Волга, 1998. С.180.

几个节日过后，佐托夫一直感到不安，他既觉得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情，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一遍又一遍地向上级机关打听结果，但听到的回答都是：“您那位特维里季诺夫正在接受调查。我们是不会出错的。”小说结尾的一句话是：“可自此之后，佐托夫一辈子都无法忘掉这个人……”

20世纪50-60年代和90年代，索尔仁尼琴两度着手同一特殊体裁的写作，即他本人所谓的“微型散文”（крохотки），有时亦称作“微型故事”（крохотные рассказы），这是一种介于小小说和散文诗之间的文体，或叙事，或抒情，或是一段议论，或为一个场景，但篇幅都很短小。索尔仁尼琴的这些随笔体、日记体文字，是他早年的诗歌写作经验和后来的小说叙事方式之间的一种过渡，更确切地说是两者的融合，史诗作家索尔仁尼琴所同时具有的细腻、温和、精致的文学笔法在这些短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索尔仁尼琴后来出版的多种微型散文选本中，被置于首篇的大多是这篇《呼吸》（Дыхание）：

夜间落过一场小雨，此时仍有乌云在天上徘徊，不时还轻落几滴。

我站在一株苹果树下，一株花已开败的苹果树下，我在呼吸。不仅这株苹果树，就连四周的草地都在雨后挥发芬芳，一股莫名的甜蜜气息充盈着空气。我用整个的肺叶在吸取这气息，用全副的心胸在感受这芬芳，我在呼吸，在呼吸，时而睁开眼，时而又闭上眼，我也不知道哪样更好。

如此地呼吸，呼吸于此地，——这也许就是自由，唯一的、然而却是最珍贵的自由，一种被监狱从我们身边夺走的自由。对我来说，世上任何的佳肴，任何的美酒，都不比这空气，不比这充满了花香、湿润和新鲜的空气更香甜。

虽然这只是一方被五层楼的兽笼压迫着的小小的花园。我不再听见摩托车的刺耳、飞机的嘈杂、扬声器的嘟哝。只要还可以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那么，就还可以生活下去！^①

这篇散文写于1958年，当时，走出劳改营已经三年的索尔仁尼琴终于

① 索尔仁尼琴：“呼吸”，刘文飞译，载贾平凹编选：《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五十篇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被正式恢复名誉。他与离婚的妻子破镜重圆，并来到妻子的工作地梁赞市，入住妻子分到的住房，受聘担任梁赞第二中学教师。在十多年的苦役之后，他的生活和工作又重回正轨，开始了他所称的“平静生活”。索尔仁尼琴夫妇住在梁赞城卡西莫夫第一胡同三号公寓，这幢两层木楼（不知为何索尔仁尼琴在《呼吸》中要写成“五层楼”）后面有个小院，院里有一棵苹果树。索尔仁尼琴在写作之余常来到院落，站在苹果树下，自由地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这篇散文就是他当时真实心境的体现。与此同时，这篇散文也构成了一个硕大的隐喻，即“自由即空气”，自由像空气一样无比宝贵，像呼吸一样必不可少，可我们似乎只有在失去它时方才感觉到它的无比宝贵和必不可少，而雨后苹果树下的自由空气和自由呼吸，就是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前提和意义。

与写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微型散文相比，其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同一体裁作品在调性上却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关于人生和死亡的感慨和思考逐渐凸显出来，犹如屠格涅夫晚年的散文诗。在索尔仁尼琴的最后一篇微型散文《追悼逝者》（Поминание усопших）中，作家写道：“父母走了，同龄人也在相继离去。他们去了哪里？似乎，这是一件猜不透、道不明的事情，我们无法知晓。但是有一个清晰的念头在我们面前闪过：不，他们并未消失。”因为，我们为他们亡灵所做的祈祷会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架设起一座无形的拱桥，这座拱桥具有“宇宙规模”，却又“近在咫尺”，逝者们变得面容模糊了，却又一如从前，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如今已经比我们年轻了，“你向他们回报以尘世的温暖，因为或许，我们能帮点什么忙？还有，相逢的许诺”。

1994 年返回俄罗斯前后，索尔仁尼琴陆续写出八篇“两段式短篇小说”（двучастные рассказы），其中有《年轻人》（Молодняк）、《杏酱》（Абрикосовое варенье）、《娜斯坚卡》（Настенька）和《艾戈》（Эго）等。这些小说的情节多与革命、战争、良心、背叛等相关，似是索尔仁尼琴写作他那些大部头作品时剩下的“边角料”。但这些短篇小说毕竟是索尔仁尼琴创作最成熟时期的产物，因而体现出很高的文学水准，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别具一格。这些小说均由两个段落构成，两个段落或构成穿越时空的呼应，或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作者用这种方式节省了大量篇幅，把主要笔墨放在两

个重要的场景上，让读者通过阅读在两个场景间建立联系，填补中间的“空白”。这一手法，其实是对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Повести Белкина）中所采用的只描写故事一头一尾的短篇小说结构方式的借鉴和发展。

《年轻人》的第一部分写桥梁建筑系副教授沃兹德维任斯基主持的材料力学课面试，来自工厂的调干生科诺普廖夫一问三不知，但在后者的苦苦哀求下，出于对工人大学生的同情，沃兹德维任斯基违心地给了他“及格”的分数；第二部分写科诺普廖夫对沃兹德维任斯基的审讯，当年在考试中蒙混过关的科诺普廖夫成为国家政治总局的一名军官，沃兹德维任斯基无辜被捕，科诺普廖夫对“恩师”心怀同情，他知道沃兹德维任斯基没有任何过错，但也明白后者没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出去”，于是便给自己的老师找了一条出路：做内线，汇报自己身边人的“思想动态”。老师严词拒绝，学生苦口婆心，并说否则只能送老师去劳改营，老师的女儿也将遭灾，老师听后痛苦地伏在桌子上。小说的最后一句是：“一周后，他获释了。”“考试”和“审讯”构成一种对比，“师生”的角色发生转换，这自然是对那个残酷年代的非人性本质的揭露，同时似乎也暗示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维埃教育和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事件之间的关联。

《娜斯坚卡》的两部分写的是两个名字均为“娜斯坚卡”的女主人公，第一位娜斯坚卡是神父的孙女，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爱读书、信上帝的小女孩被迫偷偷撕碎圣像，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本想通过做保育院老师、乡村图书管理员等方式自食其力，却先后被村苏维埃主席、共青团领导、工厂会计等引诱或强暴，渐渐地，在与有权势男人的交往中她也就半推半就了，直到被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的党内官员看上，被带到莫斯科。另一位娜斯坚卡成长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立志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俄国文学，后来随父亲去了罗斯托夫，她只好进入当地的师范学院语文系。她洁身自好，在与出类拔萃的学校共青团领导舒拉相爱后却拒绝舒拉提出的同居要求，两人因此分手。但是，她的俄国文学观念却似乎遭到了强暴，在大学生学习时就她感觉到，如今的俄国文学“再也没有她先前熟悉的那种文学的影子了”，毕业后成为中学文学老师的她，也渐渐地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手法来看待文学了。

四

1968年，索尔仁尼琴的两部长篇小说《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和《癌症楼》（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在西方出版，这两部小说连同之前发表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主要作品，换句话说，索尔仁尼琴主要就是凭借这几部作品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1974年，他的《古拉格群岛》也在巴黎面世。这三部劳改营题材长篇小说构成索尔仁尼琴创作中的“监狱长篇三部曲”，确定了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大作家的基本风貌。

长篇小说《第一圈》写于1955-1968年间，这部小说有着一个间谍剧般的情节：1949年12月24日晚5点，苏联外交部二等秘书伊诺肯季·沃洛金跑出外交部大楼，在阿尔巴特街头的电话亭给美国使馆打去一个电话，称有苏联特工窃得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图纸，将在纽约一家广播器材商店递交情报。沃洛金并非美国间谍，他出身高干家庭，身为苏联外交官，却对苏维埃体制抱有成见，认为自己有责任阻止这个不公正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小说中也交代了沃洛金这一思想立场的来源：战后苏联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引起他的深思，读了已故母亲留下的笔记之后，尤其是在回到乡间探亲、与舅舅深入交谈之后，他逐渐意识到现存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他获悉苏联将获取原子弹设计图纸这一绝密情报后，便决定直接打电话给美国驻苏使馆。这段电话被监听部门录音，这一叛国行为引起高层注意，要求彻查，辨别打电话人身份的任务被交到一座狱中科研机构。苏联时期的监狱和劳改营里关押着大量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杰出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为“利用”这笔宝贵的“智力资源”，苏联内务部门在狱中设立许多秘密研究机构，并冠以各种名称以掩人耳目，但此类机构后获得一个统一俗称，即“沙拉什卡”（шарашка）。《第一圈》的情节发生地就是位于莫斯科郊外的马尔菲诺沙拉什卡，这是一家专门研究电话保密技术的机构。沃洛金的告密电话被送到马尔菲诺，交由语言学家鲁宾、工程师索洛格金等人研究。最终，打电话人的身份被确定，沃洛金被捕。

在《第一圈》中，与“破案”过程这一表层情节同时发展的，还有一个同样引人入胜的深层情节，即主人公们紧张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激烈的思想

交锋。鲁宾是一位日耳曼语言学家，他上过战场，官至少校，在战争后期因质疑“以牙还牙，以命偿命”的口号被捕入狱。但是，鲁宾并未因此改变信仰，他坚信列宁的事业终将胜利，无辜被关进监狱的人只不过是伟大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之结果。鲁宾在沙拉什卡研究“声音类型”，目的是确定说话人的个性特征。他工作积极，因为他痛恨妨碍祖国获得核武器的人。他也觉得自己的研究最终可以把声音变成指纹，帮助国家抓获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与国家合作，这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鲁宾的研究进展顺利，最后将嫌疑人由五名缩小至两名，听闻当局决定把两个嫌疑人都抓起来，鲁宾因为其中有一人会被冤枉而不安，但看到世界地图上巨大的红色区域，他又稍感释然：无论如何，我们终将胜利。鲁宾的“友人加敌人”是工程师索洛格金，他负责研制电话解码器，他的研究也很顺利，他因此很有可能提前获释。但是，他始终对与官方的合作抱有警觉和疑虑，认为自己的研究有可能是助纣为虐。在与鲁宾的一次激烈争论之后，他将自己已经完成的图纸付之一炬，不惜因此再获第三个刑期。鲁宾和索洛格金经常争论，作为他俩争论之见证人和参与者的，就是小说的叙事者格列勃·涅尔仁。涅尔仁的身上显然有索尔仁尼琴的影子。他是位数学家，也参与了保密电话的研制工作，但他喜爱语言学和历史，一直在偷偷写作思考俄国革命的文字。他与鲁宾、索洛格金经常一起讨论哲学、历史和政治问题，他和索洛格金立场相近，反对鲁宾对体制的认同，与体制的合作。在小说的最后，他也主动放弃科研工作，被送回条件恶劣的劳改营。涅尔仁、鲁宾和索洛格金构成的“思想三剑客”，既各自不懈地深入思考，又相互不停地交换看法，他们在不自由的生活环境中进行自由的思想，聚焦于“历史”“革命”“人民”“上帝”等问题，他们的思想探索也是俄国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的心路历程的缩影，他们的对话为这部小说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小说”的烙印。为了突出小说中“思想及其争论”这个真正的核心主题，作家采用了一些独特的处理手段：首先，《第一圈》不像《一天》那样，其中并无一个真正的主人公，鲁宾、索洛格金和涅尔仁似乎在小说的人物等级谱系中占据大致相等的地位，作者以此来凸显他们三人之间的张力关系，让他们的观点以及交流和交锋成为小说的主要叙述对象，从而构成了一个由多种主人公声音并发的

复调结构。其次，像《一天》一样，《第一圈》的情节也被压缩进一个短暂的时间段落，即1949年12月24日傍晚至27日下午午间的三个昼夜。在这一短暂的时间段里，主人公们似乎都在迫不及待地表达自我，主人公之一涅尔仁也因此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飞跃。最后，小说人物的思想探索是在一个具有悖论色彩的独特空间展开的。沙拉什卡是智者的牢笼，同时也是会给思想者以刺激的场所。在沙拉什卡，这些知识精英犯人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研究工作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求知求新的学者天性，他们在这里甚至有可能取得科学突破，小说作者不无讽刺地写道：如果不是在沙拉什卡，两位大科学家是无法一起工作的，他们必然会为争夺名利打得头破血流，而在沙拉什卡，他们更容易齐心协力，心无旁骛，更何况，通过研究工作还有可能获得减刑，甚至奖赏。也就是说，沙拉什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最理想的监狱，人身的不自由和工作的自由并存，囚犯们似乎置身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过渡状态。但正是在这里，在感受到了自由的诱惑之后，在面临某种选择自由的时候，主人公们的思想活动可能会更加紧张，他们相互间的思想斗争也会更加激烈。涅尔仁和索洛格金的最终选择，就是这种心理活动和思想斗争的结果。

被索尔仁尼琴用作小说标题的《第一圈》，也像他许多作品的书名一样具有多重含义，小说中至少有这样三处“题解”性质的描写：

沃洛金在与克拉拉散步时，曾用树枝在湿地上画了两个圈，他说：“这是祖国。这是第一圈。还有第二圈。这是人类。似乎第一圈能融入第二圈？绝不可能！这里有偏见的栅栏。这里甚至还有铁丝网和机关枪。无论身体还是心灵几乎都难以突破。结果，就什么人类都不存在了。只有祖国，祖国，大家各有各的祖国……”“第一圈”象征一种狭隘的民族立场，一种既是地理意义、也是思想意义上的封闭和局限。

沃洛金被捕后被塞进汽车，押往国家安全部所在的大楼，汽车在大楼前的卢比扬卡广场转了一圈：“轿车遵循道路交通规则，绕着反光的卢比扬卡广场转了一周，像是画了一个道别的圈，以便让伊诺肯季能最后一次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旧卢比扬卡和新卢比扬卡合为一体的五层楼，他的生命将在那里终结。”押解沃洛金的汽车所画出的这个“道别的圈”，就像是沃洛金自我

选定的一道人生轨迹。

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沙拉什卡是但丁设想出来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颇费思量：他该把那些古希腊罗马的智者放到哪里去呢？一名基督徒的义务吩咐他把这些异教徒投进地狱。可是，一位文艺复兴时代人士的良心却无法让他把这些智慧君子与其他罪人混为一谈，遭受肉体拷打。于是，但丁就为他们在地狱里辟出了这么一处特别的地方。”这就是说，“第一圈”即但丁在《神曲》中描绘的九层地狱的第一层（根据这一寓意，这部小说也可译为《第一层》）。这一层地狱名为“幽冥”，但丁将那些智慧的异教徒安置在这里，比如诗人贺拉斯和奥维德，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科学家欧几里得和希波克拉底等。他们被置于地狱第一圈，仅仅因为他们的“异教徒”身份。如此一来，“第一圈”应该就是自由思想者的天堂，将苏联时期的沙拉什卡比喻为“第一圈”，其实就是在颂扬苏联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和不屈精神。有学者还认为，“第一圈”同时也象征着《圣经》里的挪亚方舟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①

《第一圈》的情节和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型，鲁宾的原型是科佩列夫（Лев Копелев），索洛格金的原型是帕宁（Дмитрий Панин），索尔仁尼琴曾与科佩列夫和帕宁一同在马尔菲诺沙拉什卡工作，他们当时也的确有过如书中人物一般的思考和争论。科佩列夫后来出版了回忆录《我的忧伤已消逝》（Утоли моя печали）^②，帕宁也写成《从卢比扬卡到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笔记》^③一书，他俩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均可用来佐证小说《第一圈》的“纪实性”。帕宁的回忆录初版时甚至就题为《索洛格金笔记》（Записки Сологдина），也就是说，帕宁承认小说《第一圈》中的那个人物就是自己。令人意外的是，小说中三位主人公的争论如此真实，如此持久，竟然使得这三位思想友人在后来分道扬镳，甚至成为敌人。他们获得自由后曾亲密交往，一张他们三人面带笑容的合影照片记录下了他们志同道合者的温馨友情。但

①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1950–1990-е годы). М.: Академия, 2010. 5-е издание. Т.1. С.274.

② Копелев Л.З. Утоли моя печали: Мемуары. М.: Ex libris. Слово, 1991. 此书第一章即为《马尔菲诺沙拉什卡》（Марфинская шарашка）。

③ Панин Д.М. Лубянка-Экибастуз. Лагерные записки. М.: Скифы. Обновление, 1990.

在索尔仁尼琴流亡境外后，由于对西方民主、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三位友人最终决裂。

长篇小说《癌症楼》写于 1963-1967 年间，是索尔仁尼琴以自己 1954 年 1-2 月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肿瘤医院治疗癌症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写成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位流放犯，他因身患癌症，获准离开流放地到塔什干肿瘤医院住院，住进标号为 13 号的癌症楼中的一间九人病室。病室里的病人各种各样，有当地工业管理部门的高干帕维尔·鲁萨诺夫和建筑工人叶夫列姆，有 16 岁的中学生焦姆卡和 26 岁的地质队员瓦季姆，有曾为教授的图书管理员舒卢宾和拖拉机手普罗什卡，还有几位少数民族居民。这些身份、年龄、民族、职业和命运各不相同的病人住在了一起，他们同样身患的绝症却像一个公约数，共同直接面对死亡的处境使他们变得“势均力敌”了。也正是在这样的“临界状态”中，他们的个性本质和生活态度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表达。因为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较少虚伪和欺瞒，而更多反省和思考。于是，在癌症楼里，病人们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之碰撞便不可避免，病房于是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战场，这部小说也就成了一部思想作品。

鲁萨诺夫早已习惯了包括单人病房在内的特权待遇，他即将退休，安度幸福晚年，没想到却身患癌症，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还不得不住进普通病房，他感觉无法与身边的普通病人为伍，病房里的“民主”氛围与病房外的解冻气候相互作用，也使这位依靠告密、玩弄权术爬上高位的苏联官员感到恐惧。他的邻床病友科斯托格洛托夫构成他的对立面，他在看到这位病友第一眼的时候便心生反感，立即送给对方一个恶毒的绰号，叫“啃骨者”（Оглоед）。科斯托格洛托夫 34 岁，他在前线打过仗，也坐过牢，在流放地发现身患癌症，来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但来到医院后他的病情却迅速好转，更为重要的是，在癌症楼这个其他人感到不自由的地方，他却感觉到了空前的自由。面对作为体制之象征、之产物、之既得利益者的鲁萨诺夫，科斯托格洛托夫火力全开。小说中描写了他俩之间的几场论战：听见鲁萨诺夫打着官腔，斥责叶夫列姆转述的托尔斯泰关于道德修养的童话故事是“乌七八糟的东西”，是在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科斯托格洛托夫质问道：“您为什么跟道德上的

自我修养那么过不去呢？为什么谈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会引起您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个问题会刺痛谁呢？只会刺痛那些道德上的败类！”（第 11 章《桦树癌》）听到鲁萨诺夫说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就是癌症，科斯托格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顶撞道：“比癌症更糟的是麻风病！糟就糟在人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清除。硬使他们跟亲人分离，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得了肿瘤病还好受吗？”（第 11 章《桦树癌》）在谈到“阶级意识”问题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毫不留情地指出：“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社会根源这种谬论呢？要知道，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种族主义。”鲁萨诺夫喊道：“大家都听听！我要求大家作证！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被彻底激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回应道：“你们习惯了这一套，只要谁的意见跟你们不一致，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第 29 章《硬话和软话》）在这些思想交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无疑是占上风的胜利者，他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似乎把多年来的积郁和压抑全都一吐为快。小说中写道，早已习惯在“自由人”面前低眉顺眼、默不作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突然觉得自己又可以畅所欲言了，于是“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境”。从彻底丧失言说的自由到重新获得话语的权利，科斯托格洛托夫所体验到的这一身份突转，无疑也是索尔仁尼琴本人在写作《癌症楼》时的一种切身感受，作品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形象因而获得了一种狂欢化色彩，成为作家当时情感体验的独特释放和形象表达。

在《癌症楼》里，作者还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位重症胃癌患者安排了几乎平行的两段罗曼史。护士卓娅因为同情而对科斯托格洛托夫心生爱慕，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跟随他去往流放地，但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卓娅的相处，却让科斯托格洛托夫感觉到：“生命中的一切力量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相比较而言，科斯托格洛托夫对女医生薇拉的感情则更微妙，更深刻，这位苗条娇小、沉静温柔的女医生与科斯托格洛托夫年纪相仿，一直未婚，科斯托格洛托夫身上的活力和意志力对她很有吸引力，但他们之间似乎横亘着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这两段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爱情纠葛，不仅表明康复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恢复了体力，同时还表明他恢复了情感，恢复了爱的能力。

癌症楼里的病人有的治愈，有的病逝，有的看似治好了却又出现反复，有的顺利出院却是回家等死，这一切都表明癌症的治愈之艰难。癌症楼的主治大夫东佐娃治疗并治愈了很多病人，但自己却和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患上了胃癌，这一“从反面来看”（小说一章的标题）的情节也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疾病的凶险。同样，社会若患上癌症，其治愈也一定不易，甚至无望，因此，乐观和悲观的交织、希望与绝望的并存便构成了这部小说起伏跌宕的特殊调性。孤儿焦姆卡勤奋好学，爱好足球，可命运却让他患上骨癌，只好截去一条腿；如花似玉的阿霞热情四射，却因为乳腺癌要切除一个乳房。一男一女两个患难与共的少年，凄惨地面临“处处是单数”（第28章的题目）的可怕未来。小说的最后两章更构成一个强烈对比：《创世的第一天》和《也是最后一天》。康复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清晨走出医院，迎来真正自由的一天，“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这次走出医院的大门，对他来说，何异于走出牢门？”他乘坐电车，看到在晨光中泛着粉色的杏花，吃到了羊肉串和冰激凌。“他本来没指望能活到春天，可眼前正是这春天的太阳。尽管周围的人谁也没为奥列格获得新生而欢欣鼓舞，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可是太阳却知道，所以奥列格冲它微笑。哪怕下一个春天永远不会来临，哪怕这是最后一个春天，但要知道，这一个春天已是额外得到的！”但是，随后在百货商店和动物园里的见闻却让他百感交集。商店里挤满顾客，他们热心地抢购，其中一位男士居然知道自己衬衫的衣领尺码，这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另类身份。他在商场的大镜子中看到自己形象的一幕很有象征意味，这似乎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又一次“自我认知”。如果说，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商场里发现了自己与“正常人”的反差，那么在动物园里，他则发现了自己与各种被关押动物的相近。“猴子的脑袋谈不上什么发型，仿佛个个都推成了平头。它们神情忧郁，在板铺上专心回忆往昔的悲欢，那模样使他不由地想起过去的许多熟人，有几只甚至使他联想到今天还关在什么地方的人。”科斯托格洛托夫还痛苦地意识到，即便他有权力，他也不会放出这些动物，“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离开动物园后，他买了两束紫罗兰去看薇拉医生，却没赶上她在家，他在车站给薇拉写

了一份告别的信，然后挤上返回流放地的火车，爬上行李架，躺了下来。小说的最后一句是：“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①

“癌症楼”的意象无疑是在影射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其中住院病人们所患的种种癌症也各自有其象征色彩，而在作者看来，人们最典型的精神癌症就是谎言和恐惧，而国家肌体上的癌症就是无处不在的劳改营和流放地。作者生怕读者领悟不了这层寓意，于是便在小说结尾处直截了当地写道：“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②

这些劳改营和流放地在苏联国土上星罗棋布，状若群岛，索尔仁尼琴就用这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隐喻做了他的史诗巨著《古拉格群岛》的题目。“古拉格”（ГУЛАГ，或为ГУЛar）是苏联内务部一个下属机构名称的缩写形式，该机构全称为“劳改营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苏联劳改营制度的存在时间长达30余年，“在1929-1953年间，1800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③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不仅使苏联时期的劳改营这一非人现象及其罪恶昭然于世，同时也使“古拉格”这个缩略语名称转化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甚至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普通名词。

《一天》发表后，索尔仁尼琴收到无数来信，其中有许多是劳改营和监狱的幸存者写来的，他们在表达谢意和敬意的同时也寄来大量材料，并要求作家继续深入开掘这一题材。索尔仁尼琴原本就没打算止步于《一天》，甚至在相继写成《第一圈》和《癌症楼》后仍不满足，他决心写出一部完整揭露古拉格真相的史诗性作品。为此，他旅行苏联各地，走访了227名前劳改营囚犯，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为创作《古拉格群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便在解冻时期，写作这样一本书也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索尔仁尼琴四处躲藏，断断续续地秘密写作，并在1965-1966年之交、1966-1967年之交的两个冬季，躲进爱沙尼亚塔尔图附近的科普里-米亚尔基村（Копли-Мярди），

① 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527-580页。

② 同上，第566页。

③ 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635页。

最终完成了此书。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由尼基塔·司徒卢威（Никита Струве）主持的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YMCA-Press）出版，其他两卷也在随后两年推出。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史诗巨著，译成中文近160万字，全书共分为七部。第一部《监狱工业》是古拉格概况，详细描写了逮捕犯人的方式、劳改营犯人的构成、侦查和审讯过程、监狱内况、相关法律条文、死刑判决等等。书中写道：进入古拉格群岛的“必经之路”就是被捕；监狱就像一条下水道，水流最足的两个时期分别是1929-1930年、1937-1938年和1944-1945年。先后被投入下水道的“人流”构成复杂，主要有：革命前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富农，沙皇时代官吏，内战中的白卫军官兵，神职人员，旧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少数民族人士，30年代的“人民公敌”，二战时做过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等。在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于1926年颁布后，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触犯这条由14款构成的法律条文而被判监禁、流放或死刑。古拉格体系的建立有多种目的，如打压政治对手、消灭社会异己分子、用其制造出的大恐怖氛围来维系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等，但其中也不乏经济目的，因为数以千万计的劳改犯被视为一笔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是无偿的，苏联工业化时期的许多重大建设项目其实都是由劳改犯完成的。第二部《永恒的运动》描述古拉格群岛间的犯人转运押送方式。在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袤土地上，分布着无数“岛屿港口”，各种各样的“航船”日夜不停地在这些岛屿间穿梭往来。在所谓“囚犯车厢”，或曰“斯托雷平车厢”，一个普通旅客列车包厢大小的地方会塞进二三十人，犯人们紧紧挤在一起，要熬上数昼夜，甚至数周，只发给一点咸鱼和面包，还不让喝水，也不让上厕所。到30年代，由于囚犯数量越来越多，便开始用运输牲畜的车皮组成“红色专列”，一次即可把数以千计的犯人运往荒原、林区或冻土地带。用来短途转运犯人的汽车通常是所谓“乌鸦车”。第三部《劳动消灭营》是苏联劳改营的“发展史”。“群岛诞生于阿芙乐尔号的炮击声中”，自20年代起逐渐“浮出海面”，第一座“岛屿”出现在1923年，这是一座真正的岛屿，即位于白海中的索洛维茨岛，该岛上建于15世纪的著名的索洛维茨修道院（Солов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被改作劳改营。1928年，苏联人

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扩大劳改营以及强制劳动不付报酬的决议，从此，劳改犯被当成“任劳任怨的建设者”，“群岛获得了经济意义”，其中，白海运河的修建就是一个例证，成千上万的劳改犯赤手空拳地完成了这条至今仍无明显用处的“伟大工程”。30年代，随着镇压规模的空前扩大，除苏联极北地区外，西伯利亚、远东、中亚等地也布满劳改营，如远东科雷马（Колыма）地区的多处劳改营，劳改营里的管理制度越来越严酷，饥寒交迫、病入膏肓的囚犯大量死去。卫国战争期间，劳改营里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战后的劳改营生活，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已是亲身经历，因此他便在书中给出大量生活细节。在数十年时间里，古拉格中的囚犯成了“一个阶级”“一个生物学类型”，甚至“一个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惯、生存逻辑，甚至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第四部《灵魂和铁丝网》揭露劳改营生活对被关押者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劳改营里很少良心谴责，因为囚犯们有着几乎一致的无罪感，但是，绝大多数犯人都不可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保持紧张的精神生活，沙拉莫夫因此认为，劳改营中人的感情会逐渐泯灭，因为贪婪和残忍成为日常生活，出卖和叛变成为生存手段。第五部《苦役》再现劳改犯的苦役生活。1943年，在苏联一度被废除的苦役刑被恢复，最早实施苦役刑罚的地点是沃尔库塔（Воркута）矿井。索尔仁尼琴在这一部分也叙述了他服苦役的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第六部《流放》指出，苏联时期的流放与沙俄时期的流放之不同，不仅在于规模和“待遇”，还在于性质和目的，相形之下，古拉格的流放就是对人的所有权利的永久剥夺。流放地和强制迁徙地成为人的垃圾场，瘟疫和各种自然灾害频发。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被强制性地集体迁移，如朝鲜人被从远东迁至中亚，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被赶到卡累利阿，伏尔加流域的德裔人、乌克兰西部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都遭到驱逐。全书的最后一部写道，“门终于短暂地开了一道细缝”，但是却让人们“左右为难”，因为古拉格的存在，“我们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人民”。更可怕的是，“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今天依然存在，今后还要存在！”^①

^①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下册），钱诚、田大畏译，田大畏校，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年，第626页。

这部作品的体裁十分独特，作者在书名下方特意附加了一个说明性的副标题：“艺术性研究尝试”（Опы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他是在申明，他要尝试用文学的手法来进行历史研究。在与瑞士大学生的座谈中，他更明确地对《古拉格群岛》的这个副标题进行了解释：“我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它的体裁可以确定下来了。当下对苏联的监狱和劳改营问题进行研究的条件十分特殊。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考古还要困难。所有的第一手资料要么被销毁，要么被密藏，无法看到，等到有朝一日能看到的时候，它们又肯定会被销毁。大部分见证人都遇害了，或者死去。因此，我现在无法进行普通的学术性研究，依靠文献、数字、统计等进行的普通的学术性研究，不仅我现在无法进行，我担心，恐怕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艺术性研究也不仅仅是学术性研究的替代品，这也并非因为学术性研究无法进行，因此我们才另辟蹊径，这是因为，艺术性研究就其各种可能性和水准而言，在很多方面都胜过学术性研究（对此我深信不疑）。艺术性研究具有所谓隧道效应，具有直觉。在学术性研究需要翻山越岭的时候，艺术性研究却可以借助直觉的隧道更迅速、更准确地穿山而过。”^①索尔仁尼琴在这里强调了他的“艺术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науч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的不同，正是两者间的这种差异，不仅彰显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文学属性，而且也使“艺术性研究”这一独特手法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中一种自在的体裁。

《古拉格群岛》在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一本纯粹的政治揭露之书，一本地道的非虚构作品。的确，在全书的开端，索尔仁尼琴就明确地写道：“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用，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留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②但是在书中，索尔仁尼琴却又直截了当地说明：“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如果是那么简单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Беседа со студентами-славистами в Цюрих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20 февраля 1975)//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7 мая 1992 года.

^②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田大畏、陈汉章译，田大畏校，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卷首页。

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需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限，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①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此书同时也是一部道德哲学，“这部书是讲人的内心世界的升华，讲人的灵魂与恶之间的搏斗的。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在合上书之后，除了痛心和愤怒，还会感到充满力量和智慧的原因”。^②这本书是写实的，纪实的，却未必就是普通的报告文学或口述史。《古拉格群岛》是“苏维埃苦役的百科全书”，但它更是一部将个人经历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将历史思考和文学表现完美结合的文学史诗。这部著作的“文学性”，既来自贯穿全书的叙事者形象及其声音，也源于全书浑然一体的结构和妙笔生花的语言，更得益于作品所蕴含着的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强大的人道精神。

索尔仁尼琴的三部监狱长篇构成一个整体，它们主题一致，即体现人与体制的冲突，展示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再现俄罗斯民族在 20 世纪上半期遭遇的巨大灾难。从形式上看，它们也具有诸多共性，如情节上的自传性、文字上的写实性、形象上的隐喻性。不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贯穿三部小说的某种风格演进路线，即作品的篇幅越来越大，它们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逐渐扩大，从封闭的马尔菲诺沙拉什卡“第一圈”中的数日，到半封闭的塔什干肿瘤医院“癌症楼”里的数周，再到遍布整个苏联国土的“古拉格群岛”上的数十年，作者由小到大，由点到面，既形象又概括地描绘出一幅古拉格历史的全景图。

五

小说《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的构思由来已久，“1986 年 11 月 18 日，索尔仁尼琴在自家人的圈子里庆祝了长篇小说《红轮》的纪念日，从他上大学一年级决定写一部俄罗斯革命史那时起，已经有 50 年了。”^③这就是说，

①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第 164 页。

② 索尔仁尼琴娜：“表现的天赋”，载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娜：《古拉格群岛》，胡学星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15 年，第 11 页。

③ 萨拉斯金娜：《索尔仁尼琴传》，任光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 867 页。

早在 1936 年，大学生索尔仁尼琴就已立下了写作一部关于俄国革命的大部头小说的雄心壮志。索尔仁尼琴很早就酝酿《红轮》的部分内容，但正式开始写作是在 1969 年，小说的第一部、即《1914 年 8 月》于次年完成，并于 1972 年在境外出版，但这部史诗的主体部分仍主要写于索尔仁尼琴流亡境外之后。回到俄罗斯后，索尔仁尼琴继续对《红轮》进行修改和加工，全书于 2006 年起陆续面世。

《红轮》的副标题为《特定时段叙事》（Пове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отмеренных сроках），为了探明俄国革命的起源并厘清其发展过程，索尔仁尼琴采用“倒叙”方式，从结果倒推原因，他试图借助对俄国历史中某些关键“节点”（узел）的剖析、呈现和思考，来实现他写作《红轮》的既定抱负。在十月革命之前七八年的俄国历史中，索尔仁尼琴仅选取那些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发挥过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时刻作为叙述和描写对象，这一方式成为整部小说的结构原则。根据最初构思，《红轮》将由 20 个节点构成，从 1914 年写到 1922 年，甚至直到 1945 年。《红轮》的第一节点《1914 年 8 月》很早完成并出版，第二节点《1916 年 10 月》于 1981 年写成，第三节点《1917 年 3 月》在 1984 年封笔，第四节点《1917 年 4 月》在 1989 年基本完稿，可以看到，《红轮》每一个节点的写作都耗费了索尔仁尼琴四五年的时间。或许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过于庞杂，或许是索尔仁尼琴对历史的梳理过于精心细致，他 20 余年的辛勤写作却只完成了原定计划的五分之一，甚至连 1917 年的十月革命都尚未写到。写完第四节点的索尔仁尼琴终于无心恋战了，他宣布《红轮》到此结束。即便如此，由四个“节点长篇”构成的这部鸿篇巨制也已皇皇十大卷，厚达六千余页，总字数约合汉字 400 余万。这部实际上由四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组合而成的史诗，可能是 20 世纪俄语文学中篇幅最大的文学作品。

第一节点《1914 年 8 月》的第一卷写的是该年 8 月 10-21 日间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事件。俄军将领萨姆索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сонов）率领的俄国第二军在东普鲁士陷入敌军包围，他陷入险境并非由于他指挥不当，而是各种客观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第一卷以这位悲剧将军在 8 月 17 日的开枪自尽作为结束。第二卷集中叙述当时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Пётр Столыпин）的作为。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这位苏联时期被称为“农民起义

镇压者”、以所谓镇压革命的“斯托雷平领带”（即绞索）流名于史的政治家，却成为一个对俄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大改革家。对于他 1911 年 9 月 1 日在基辅剧院的遇刺，索尔仁尼琴痛心疾首，他认为“这一枪决定了俄国的命运”，因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篇幅来描写刺杀斯托雷平的凶手博格罗夫（Дмитрий Богров），对这位刺客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动机的叙述竟然占据了 63 章。索尔仁尼琴认为，斯托雷平的遇刺是俄国历史上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灾难的先兆。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路线走下去，俄国原本可以避免革命的爆发。这一卷另辟 74 章描写俄国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作者把他写成一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爱自己的家庭和人民，面对他当政时期俄国遭遇的各种困难局面，他其实是有心无力的。如此一来，在索尔仁尼琴笔下，第一节点中的三大历史人物，即萨姆索诺夫、斯托雷平和尼古拉二世，无一例外都是悲剧性形象。第二节点《1916 年 10 月》叙述 1916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4 日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国家杜马、政府和沙皇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书中用较大篇幅叙述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其中对百万富翁革命家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做了详细描绘，这位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活跃人物为俄国革命提供了大量金钱，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位“俄国大仇人”的资金给了俄国革命的“红轮”以最初的驱动力。第三节点《1917 年 3 月》是全书中篇幅最大的一部，由四卷构成，内容是俄国专制政体的危机和二月革命的爆发，具体叙事时间为 1917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8 日。这里写到临时政府和国家杜马的活动，写到彼得格勒的革命运动，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写到尼古拉二世的孤立无助和最终退位，认为在沙皇之后开始管理国家的一批激进分子，就道德水准而言远低于皇室成员，对俄罗斯民族也毫无责任感可言。正是由自由派组成的临时政府削弱了国家，使民族最终陷入革命的动荡，毁灭的力量最终席卷整个俄国。最后一个节点《1917 年 4 月》描写俄国最终跌入深渊的那一时刻，即 1917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5 日。作者写到，临时政府成员们的争权夺利，前线、街头和乡间发生的各种小规模动乱逐渐扩展开来，为一场革命的总爆发创造了前提。

这部作品的题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隐喻性，“红轮”的意象在小说中

多次出现，在《1914年8月》中就有这样两个场景：两位主人公沃罗登采夫（这个形象具有作者的自传色彩）和勃拉格达列夫在炮火中看到一个燃烧的磨坊水车轮，它像一个红色的火轮在不停地旋转，最后散落成一地碎片（第25章）；在俄军撤退时，一辆运送伤员的大车着了火，“被火光映红的车轮仍在滚动”（第30章）。这两个场景中的意象，其实又各有其“出处”。在《古拉格群岛》第二部《永恒的运动》开篇处，索尔仁尼琴引用德国诗人缪勒（Wilhelm Müller）的长诗《美丽的磨坊女》中的四句诗作为题词：“水车轮未停止，/水车轮……/磨盘舞动着旋转，/旋转……”缪勒的长诗后被舒伯特改编为同名歌剧，这段名为《浪游》的唱段以及其中的“水车轮”，可能给索尔仁尼琴留下过深刻印象。车轮的意象则源自《圣经》，《圣经·以西结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以西结“见四轮”的描述：“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①当然，关于这个意象之来历的最直接表述，仍来自索尔仁尼琴自己，在1983年接受法国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他曾这样回答“红轮是不是一个隐喻？”的问题：“我发现，这最准确不过地体现了一切革命的规律，其中也包括你们的法国大革命。当这个近乎宇宙规模的巨轮滚动起来，它就会把全体人民、把许多民族的人民都裹挟进去，把最初的始作俑者也裹挟进去，就像带走无足轻重的沙土，于是，那些发动革命的人后来也会在这场飓风中无助地旋转，多半会丧命。”^②无论是磨坊水车轮还是以西结所见之轮，无论是大车车轮还是火车车轮，它们均构成一个无情滚动、残酷碾压的形象，再配以燃烧的烈焰，甚至其自身焚毁后留下的残片，都被作者用来作为革命的象征，一种摧枯拉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之象征。

《红轮》中的出场人物很多，数以百计，其中既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

① 《新旧约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第754页。

②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Тот выстрел решил судьбу России. Из интервью с Бернаром Пиво для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0 декабря 2010 года. №280 (5359).

的形象，还有一些既有真实成分、又有艺术加工的形象，如主人公萨尼亚·拉仁尼琴，这个人物的原型即索尔仁尼琴从未谋面的父亲，作者关于父亲的爱情和战争经历的叙述均有现实生活基础，但为了深入描写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也加入了许多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甚至掺入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和意识（这位主人公的名字“萨尼亚”就是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小名），还安排了这个人物对托尔斯泰的拜访。但总体而言，索尔仁尼琴对小说中虚构人物的着墨并不十分浓重，他并未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做的那样，对几位主人公进行“心灵辩证法”式的描摹和剖析，而是采用速写手法，几笔带过，有的在被历史的“巨轮”碾过之后便无影无踪了，这似乎也在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历史对于个人及其意志的忽略和压制。相形之下，索尔仁尼琴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却十分细致，为此他不惜辟出大量篇幅，甚至加入大量虚构情节，直至写到他们的幻觉和梦境，也就是说，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都纷纷成了具有音容笑貌和性格逻辑的文学主人公。

《红轮》的体裁十分独特，这是一部史诗，但与一般的历史长篇小说相比，它似乎显示出了更为复杂的体裁属性。除普通的小说叙事外，这里还大量引入历史文献、书信、日记、报刊文章、会议记录、回忆录、学术研究文字等。有文学史家在《红轮》中发现了12种“叙事类型”（вид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即事件本身、历史人物、作者评析、历史文献、报刊资料、社会生活场景、画面镜头、抒情沉思、民间俗语、作品人物的笔记、虚构人物的命运、女性内心独白。^①其结果，就体裁特征而言，《红轮》很接近俄国古代的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当然，《红轮》的这种写法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巨大的体量、枯燥的文献、对俄国历史细节的过多纠缠以及作家的冗长议论，都会让很大一批读者，尤其是不太熟悉俄国历史的外国读者望而却步。《红轮》完整面世时，苏联已经解体，对俄国革命及其历史的思考已很难再激起普遍关注，因此，命运似乎跟索尔仁尼琴开了一个玩笑：他在一个半月间写出的“处女作”、仅区区数万字的《一天》曾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首发的《新世界》杂志、转发的《小说报》杂志（Роман-газета）和后来出版的单

^①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1950–1990-е годы). Т.1. С.310-312.

行本，印数均在百万以上，其在全球以数十种语言发行的译本，更构成一个天文数字；而他耗费二、三十年时间创作出来的文学史诗《红轮》，在1997年首版时却只印了三万册。更让人叹息的是，在很多批评家，甚至索尔仁尼琴的研究专家眼中，《红轮》很少被视为索尔仁尼琴的最佳之作，法国斯拉夫学者乔治·尼瓦（Georges Nivat）在其《俄罗斯人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Борец и писатель）一书中甚至称《红轮》为索尔仁尼琴“天才的败笔”（гениальная неудача）：“可写着写着，就遇到了神秘的死胡同，揭秘者兼法官同时接受了所有人的立场，他想评判但却做不到，因为他同时见证了诉讼的整个环节，既是检察长，又是法官，还是案件的参与者。这样，这部鸿篇巨制就成了一个‘天才的败笔’。”^①尼瓦所称的“败笔”，主要是就《红轮》中叙述主人公身份的模糊和飘忽而言的。但是，我们似乎又恰好可以在这层意义上理解《红轮》及其作者的创作价值和历史意义，即索尔仁尼琴在数十年间不懈地搜寻、阅读俄国历史文献，紧张地思索，忘我地写作，体现了俄国作家在面对祖国及其历史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作家形象，他的文学创作的宏大历史覆盖面和强大的思想渗透性，更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强大生命力的又一次彰显。

六

索尔仁尼琴去世后的第三天，俄罗斯《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辟出五个整版，讨论索尔仁尼琴的“身份”问题，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和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他的身份更像是哪一种：社会活动家、作家还是政论作家？”晚年的索尔仁尼琴早已为自己赢得诸多“最高级”称谓，如“真理的声音”“民族的良心”“国家的精神导师”“20世纪的俄国先知”“俄国文学的主教”“俄国文化的象征”等等，不过这些都是些“虚名”，索尔仁尼琴的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呢？该报刊出十余位作家、批评家和文化界人士的文章，他们给出的回答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在索尔仁尼

^① 尼瓦：《俄罗斯人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224页。

琴身上发现他们最看重的身份。《消息报》这一期还在头版刊登该报网站发起的“您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什么人？”的网上调查结果，四个选项的占比分别为：“杰出作家”21%，“民族良心”23%，“斗士”40%，“当代最伟大思想家”16%。^①

操办索尔仁尼琴“后事”的单位不是曾开除他的俄国作家协会，也不是曾驱逐他的政府，而是俄罗斯科学院。由俄罗斯科学院发布的官方讣告这样概括了索尔仁尼琴的生活和创作：

亚·伊·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兴趣和创作追求的范围是无边的。他所创作的举世闻名的文学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家》《第一圈》《癌症楼》和《红轮》，纪实性史诗《古拉格群岛》，都是崇高的精神成就，复兴了伟大的俄国文学的公民传统。作家富有表现力的、充满高尚情感的语言，保留并发展了俄国古典散文的一切优秀特征。

他对20世纪俄国历史的翔实研究是对历史学的巨大贡献，如《对二月革命的思考》《两次革命的特征》和《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仰仗亚·伊·索尔仁尼琴考古发掘般的工作，大量历史文献被引入科研领域。他的哲学政论作品《我们如何安置俄国》《每日一分钟》和《倾塌的俄国》，均对社会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亚·伊·索尔仁尼琴在俄国民间语言领域的探索也构成了祖国语言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对当代俄国文学语言词汇扩展含义的研究，他耗费数十年心血编纂的《俄语扩展语词典》，都具有恒久的学术价值。他的那些后来被收入内容广泛的《文学收藏》一书中的关于俄国作家的特写，也以批评分析的独到和观察的精准而独树一帜。^②

不难看出，这则讣告是分别从文学、史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肯定索尔仁尼琴的成就和贡献的。人们对于索尔仁尼琴生活和创作不同侧面的认同，这其实也折射出了索尔仁尼琴命运和遗产自身的多元和丰富。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合而为一，这才是真正的索尔仁尼琴，这才构成了

① Известия. 8 марта 2008 года.

② Президиу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 глубоким прискорбием сообщает о кончи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го члена РАН Александра Исаевич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04.08.2008. <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c2c75716-d7fa-4405-825c-800d1b508dd8>

索尔仁尼琴在 20 世纪俄国文学乃至俄国历史中的独特意义。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苏军的炮兵军官，他却对最高统帅说长道短，因此惹火烧身；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作者受到最高层青睐，但他却选择与当局对峙，最后被驱逐出境；来到美国之后，他并没有因为“主人”的慷慨收留而心生感激，却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很快就被当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孤僻老头”。在凯旋般地回到俄国之后，他不久就公开宣称叶利钦等人是“民族的罪人”。普京时期，索尔仁尼琴与当局的关系似有所缓和，但他与政府和政治显然还是保持距离的。索尔仁尼琴的生活和创作始终存在于一个强大的张力场中，或者如他的第二部自传《谷粒落进两片磨盘间》的书名所隐喻的那样，他一直置身于两个“磨盘”之间。似乎无论何时何地，索尔仁尼琴都是反对派，都构成一种抗议。对于一位真正的社会活动家而言，这样的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营造的自我表现，不如说是他的人格和观念之内在驱动的结果。索尔仁尼琴许多不幸的人生遭遇无疑是很多外在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但他的命运说到底还是他本人有意识的主动选择。他这种永远对峙的姿态，有时甚至比他具体道出的话语更有意义。

索尔仁尼琴是俄国历史上又一位思想型大作家，是 20 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俄国思想家之一。索尔仁尼琴还是大学生时就开始了写作，而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对俄国的革命史做出解释，这一抱负后来成为贯穿他终身写作事业的一项使命。后来，他因为思考被关进监狱，而监狱里的环境和坐牢的经历反过来又强化、深化了他的思考，使他得以在走出监狱后写出那些揭露古拉格内幕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内容而言，就其社会影响而言，均实为思想读物。流亡前后，他写出的那些“公开信”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广为流传，是当时社会中最具有思想感染力的文字，激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反思态度和质疑精神。他的史诗巨著《红轮》，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作品一样，被视为“思想小说”。他在晚年写作的探讨俄罗斯民族与犹太民族之关系的著作《两百年同行》，虽然出版后在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两边似乎都不讨好，却显示出了一位思想家的时代责任感和思想激情。他的“新斯拉夫主义”（не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更可被视为其思

想观念的集大成者。早在流亡前后，他与友人合作编辑的文集《顶起巨石》（Из-под глыб）就为后来兴起的“新斯拉夫主义”奠定了基础。归国前后，他相继发表“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和《倾塌的俄国》（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和命运，乃至问题和药方，都给出了独到论述。这三部政论作品贯穿着两个思想：一是对俄罗斯人民传统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导，一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既是索尔仁尼琴给出的俄国改革出路，也是他政治主张的核心。他认为，俄国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国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国的复兴才有希望，俄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在谈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时，索尔仁尼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西方，或拿西方做比对。索尔仁尼琴面对西方的态度大体是这样的：历史上的西方多是加害于俄国的。西方世界对俄国一直怀有敌意，在俄国强大的时候，它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它，或削弱它；在俄国衰弱的时候，它又总是幸灾乐祸，并常常乘人之危干一些不地道的事情。当今的西方世界虽然“万事如意”，却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它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更为可怕的还有一点：西方还总是对俄国构成一种虚妄的诱惑，让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国的文化取向不时地左右摇摆，无所适从，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俄罗斯人民自信心的树立以及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开辟。可以看出，在对“下层”和“西方”的认识上，索尔仁尼琴和俄国历史上传统的斯拉夫派大体上一脉相承。他在《我们如何安置俄国》中为俄国的发展道路开出药方，在《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反思俄国的历史，在《倾塌的俄国》中针砭现实。深深关切俄国的索尔仁尼琴在近十年时间里始终在思考俄国的命运，被称为“俄国文学主教”的他却一度放弃文学作品的写作，转而写作这组政论。他以俯瞰历史、指点江山的豪气，带着干预现实的勇气，再一次扮演了先知和布道者的角色。他的这些思想虽然似乎并未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却使他成了俄国文化史中又一个集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家；他的理论最终未能成为当今俄国的一副济世良方，却无疑奠定了索尔仁尼琴作为 20 世纪俄

国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历史地位。

当然，我们在“后索尔仁尼琴时代”谈论索尔仁尼琴，阅读索尔仁尼琴，首先还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一方面，他继承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介入生活、作用社会的强大传统，通过其创作重复了阿瓦库姆不屈不挠的言说姿态、赫尔岑波澜壮阔的思想力量、托尔斯泰纵览天下的历史视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入木三分的精神透射，使俄国文学中的诸多优异特质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综合性的再现；另一方面，他的创作自身也构成了 20 世纪俄国文学中一个强大的潮流，他不仅开创了“劳改营文学”“乡村散文”“道德文学”等 20 世纪下半期俄语文学史中的重要流派之先河，而且还极大地扩大了这一时代俄语文学的世界影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他在 90 岁的一生中不懈地写作了 70 余年，无论置身囹圄，还是流离失所，留下了洋洋数十卷的文学作品，他可能是 20 世纪俄国文学中写作量最大的作家之一。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文学体裁，从短篇、中篇、长篇和史诗，到自传、随笔、散文和政论，再到抒情诗、长诗、戏剧和批评，是一位罕见的全能型作家，由他创建的“艺术性调查”“微型散文”“两部分小说”“节点长篇系列”等独特新颖的体裁，更是对 20 世纪俄语文学的新贡献。在“非虚构文学”于 20 世纪下半期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的当下，我们也能更清晰地意识到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从创作态度的角度看，我们也无疑可以把索尔仁尼琴归入世界文学史上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文学圣徒之一。他把文学写作当成一种崇高使命，虽九死而不悔。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写作是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在结束《红轮》的写作之后，在编选 30 卷文集的同时，他还写出一本文学随笔集，即《文学集锦》（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在这些随笔性质的文字中，索尔仁尼琴对数十位俄国作家进行细读和评说，在返回地理意义上的祖国之后，他似乎也在耄耋之年重访他文学意义上的家园，即俄国文学。在完成了以文学为武器总结俄国历史、反映俄国命运、指点俄国道路的宏大使命之后，索尔仁尼琴又以这样一种火炉边交谈、书桌旁对话的温情方式，完成了他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对文学的一次不无留恋的回望。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索尔仁尼琴一生创作中的文学遗产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解读和珍视。

【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general description and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life and creation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ussian writ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detailed reading of his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s, such as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Matryona's House*, *The First Circle*, *Cancer Ward*, *Arkhipelag GULAG* and *the Red Wheel*,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duce Solzhenitsyn's artistic features.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Solzhenitsyn's literary genres such as "artistic investigation", "mini-proses", "two-part short stories", and "knot novels", aiming to reveal the overall style of his works and to define the literary value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his creation.

【Key Words】 Solzhenitsyn, Russian Literature, Labor Camp Literature, *Arkhipelag GULAG*

【Аннотация】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бщее описание 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анализ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одного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Через детальн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его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таких как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Матрёнин двор», «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и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 также изучение ег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жанров, ка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рохотки», «двучастный рассказ» и «узел-роман»,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с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общий стиль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ценность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лженицы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агерная проза,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长久之国”的构建 ——从“大书奖”看国家叙事*

宋羽竹**

【内容提要】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作为21世纪俄罗斯文坛的重要奖项，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还是反映国家意志的文化现象。政治话语在文学领域得到的回应，往往关系国家发展的内生性方面。苏尔科夫在《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提出了“长久之国”的概念，人民与领袖的相互信任、聚合统一是这一概念的重要支点。历史小说和传记等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是“大书奖”关注的重要方面。获奖作品与奖项批评活动中的国家叙事构建，意在表明三个问题：俄罗斯人民是超越时代局限的先进“深层人民”；历史证明，俄罗斯的“领袖人物”是值得信任的；“长久之国”的构建可以通过“深层人民”对“领袖人物”的信任实现。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俄罗斯国家历史的深厚程度和民族性渊源，使得21世纪俄罗斯具有可预见的长久性。然而，俄罗斯国家叙事一定程度上遮盖了现实中存在的民众主体性不足的情况，从长远来看，仍是不可忽视的不利于“长久之国”构建的因素。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叙事 俄罗斯文学奖 俄罗斯文学与政治 长久之国

【中图分类号】D8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4-0153(32)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文本研究”（项目批准号：20YJC75201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宋羽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俄罗斯走过并正在走一段复杂的历史道路——这是 21 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的重要前逻辑。首先，21 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的结构复杂：地理空间广袤，各部分被纳入国家主权统治的时间不一致，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程度也因此各有不同。其次，21 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的内涵复杂：民族共同体构成多样，文化观念多元，合法性的确立任重道远。再次，21 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的构建过程复杂：虽然，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在思想文化方面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存在较大程度的认同，但是，国家关系也在不断接受挑战。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欧及美国的国家关系情况多变。这使得俄罗斯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经历着“苏联正在解体”^①的过程。进入 21 世纪以来，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从“大欧亚”到“转向东方”……当苏尔科夫尝试用“普京的长久之国”作为新世纪俄罗斯可能的大叙事时，我们有必要持续关注、并进一步探讨俄罗斯国家叙事的构建问题，包括它的形式、内容、内涵与合法性等方面。

本文选择国家文学奖“大书奖”作为研究新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的入口，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俄罗斯的历史证明，作家群体基于文学提出的话语往往比政治领域更加超前。普希金对自由的歌颂、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鞭辟入里、屠格涅夫笔下的虚无主义者、别林斯基的“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论述等，无一不是在基于文学表达着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中有着对俄国农奴制瓦解、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的敏锐嗅觉。又如，20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 (В.В. Ерофеев) 曾在他的代表作《莫斯科—佩图什基》(Москва-Петушки) 中，以克里姆林宫的“神秘消失”和主人公的离奇死亡，预言了 1991 年苏联的解体，这被誉为“苏联最后一个文学神话”^②，也因此成了苏联时代的挽歌。而作为一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尤其是在逆全球化的

① 高玉生：“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和俄罗斯的发展趋势”，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的讲座，2017 年 11 月 3 日。

② Эпштейн М.Н. После карнавала, или Вечный Венчик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Ерофеев В.В. Оставьте мою душу в поко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О «Х.Г.С.», 1995. С.4.

后疫情时代，仍是启示关于现代性问题思考的、时读时新的经典。以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为传主的传记还获得了 2018-2019 年度第十四届“大书奖”的一等奖。所以，21 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对国家政治话语分析来说，十分必要。

第二，作为一项国家文学奖，“大书奖”的获奖作品受到了俄罗斯文坛的认可，得到了俄罗斯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瓦尔拉莫夫（А.Н. Варламов）曾直言：“‘大书奖’是当下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奖项。”^①值得注意的是，获得“大书奖”的作品是经过“选择”的文学。

“大书奖”作为“选择”的平台，其中既有国家机构等政治主体的引导，又有读者、市场等社会主体的参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国家叙事的构建与合法性的确立。学者们多从具体文本的分析入手，通过诗学、美学、叙事学、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阐释，探索苏联解体、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话语转型问题。这种研究现状表明，“大书奖”获奖作品反映了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可以作为观察当代俄罗斯思想的窗口。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叙事，作为文学批评活动的“大书奖”是本文的研究客体。我们也需要承认，21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有所下降，大众文学对经典文学存在着冲击……获奖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俄罗斯国民的精神生活？政府通过文学奖构建的国家叙事具有怎样的合法性？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基于这样的现实，俄罗斯国家叙事的构建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二、“大书”：21 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叙事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奖有一百余项。其中，由总统亲自授奖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奖^②（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е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设于 1992 年）、国家文学奖“大书奖”（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① Варламов А.Н.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сегодня: сюжеты и лица.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俄语所俄罗斯文学启真讲坛，2020 年 7 月 11 日。

^② 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的前身为苏联国家奖（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емия СССР，1967-1991）。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通常译为“大书奖”，又译作“巨著奖”，设立于2005年，下文简称“大书奖”)、俄语布克奖(Русский Букер, 设立于1992年, 2018年7月因资助问题取消)、处女作奖(Премия дебют, 设立于2000年)、国家畅销书奖(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естселлер, 设立于2001年)等颇具影响力, 获奖作品较多译介至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它们中的大多数为21世纪新设立的文学奖项。对作家而言, 文学奖是鼓励创作的利好政策; 对市场而言, 这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途径; 对国家而言, 这是构建国家叙事、加强精神文化治理、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阵地。因此, 文学奖中包含多种语言游戏, 从而显示出构建的能力。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尔这样解释: “说话就是斗争(意思是参加游戏), 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 对手就是根深蒂固的语言, 就是内涵……可观察的社会关系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① 国家由苏联向新俄罗斯转向, 必然会因此将旧有话语体系作为语言竞技的对象。“大书奖”的“大书”即是关于新的国家宏大叙事的书。

2019年6月10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布第235号总统令, 将2018年度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颁发给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巴辛斯基(П.В. Басинский)^②, 而巴辛斯基的传记文学作品《列夫·托尔斯泰: 从天堂出走》(Лев Толстой: бегство из рая)曾在2009-2010年度的“大书奖”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2015年,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С.А. Алексееви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这之前的一年, 她以苏联历史为对象的纪实文学作品《二手时间》(Время секунд-хэнд)获得了2013-2014年度“大书奖”的“最受读者欢迎奖”一等奖。库切尔斯卡娅(Майя Кучерская)的长篇小说《莫佳阿姨》(Тётя Мотя)是一部在2012-2013年度读者投票环节中夺魁的作品, 其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和墨家哲学思想, 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当代俄罗斯青年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 主人公科里亚发现了墨家思想的“兼爱”与基督的“博爱”之间的隐秘

① [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 车槿山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38-39页。

② Путин В.В.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 присуж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рем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2018 года.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10 июня 2019. №.235.

联系；《墨子》中的工匠精神雏形更是获得了善于驾驭机器的俄罗斯人的青睐……“大书奖”连续颁发的十四年，从不同维度见证了俄罗斯文坛主流意识、审美趣味、创作范式的变化与发展，已经成为 21 世纪不可忽视的俄罗斯文化现象。本文将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介绍作为文学批评活动的“大书奖”，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其中的 21 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构建问题。

（一）“大书奖”国家叙事的两种路径

文学奖项内含的文学批评形式，通常会在奖项章程中通过评奖机制的概述体现出来：以富有诗性、哲理或带有历史厚重感的语句明确宗旨，阐述授奖主体或资助主体对立场的选择、目标的设定、机制的明确等，从而形成元话语——关于作家、作品如何在奖项的语境中获得合法性的规则。“大书奖”的章程明确提出：这是一项“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由非营利性机构“国家语言资助中心”联合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新闻与大众传播部、文化与电影摄影学会、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俄罗斯图书联盟、俄罗斯图书馆协会、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塔斯社等机构合作创立；其目的是“甄选并表彰对推动俄罗斯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作家、作品，提升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社会意义，吸引读者和社会的关注。”^①不难看出，“大书奖”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国家立场，最重要的宗旨是使文学叙事通过奖项的平台，获得社会的关注和认同——本质上是在精神文化领域构建国家叙事的活动。

“大书奖”之名也呼应了该国家文学奖的宗旨，内含了构建国家叙事的需要。首先，俄语词汇 книга（书）有“包含多个章节的大型文学作品”^②的含义，因此，“大书奖”之“书”全部为长篇小说。而“作品体裁的实质，是由具有世界性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生活现象产生的”^③，获得“大书奖”的长篇小说的意义之一，就是赋予俄罗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生活以民族性、甚至是世界性的意义，使它们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大叙事的构建。这样

① Положение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премии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Пятнадцатый сезон. <http://www.bigbook.ru/polojenie/>（国家文学奖“大书奖”的官方网站）

② 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80000 слов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ыражений. Москва: «А ТЕМП», 2010. С.279.

③ [俄]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6页。

的книга与表示“重要的、杰出的，在某一领域水平很高”^①的形容词большой相结合时，进一步获得了史诗性的、符号性的内涵。一方面，对具体作品而言，恢宏而深刻的历史叙事必然是其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对整体获奖作品而言，“大书”们的集成赋予了“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特定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众多当代文学作品、甚至是当代俄罗斯历史叙事的抽象，成为有象征意义的精神文化符号——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这样，大写的“大书”就获得了集体无意识的、展现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史诗意义。按照这样的逻辑，“大书奖”中的国家叙事，作为服务于 21 世纪俄罗斯大叙事的一种元叙事，其合法性确立的程度受国家意志的主导。

所以，国家性的确是“大书奖”的重要方面。然而，在关注文化领域“国家订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заказ）现象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他社会主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以及他们发挥的作用。“大书奖”设有一、二、三等奖，最受读者欢迎奖（从第二届开始）和特别奖（从第二届开始）。每年 4 月 30 日之前，专家委员会公布“长名单”（Длинный список, 约 40 部文学作品）；6 月 15 日之前，公布进入决赛环节的“短名单”（Список финалистов, 约 8-15 部文学作品）；随后开启读者投票的网络平台；12 月，公布获得一、二、三等奖、以及在读者投票环节中名列前三名的作家和作品，还有获得特别奖（包括“文学贡献奖”“荣誉与尊严奖”“银幕经典呈现奖”等）的作家、文学活动家或出版、传播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最受读者欢迎奖和特别奖。虽然许多文学奖项也采取了先投票后评选的模式，显示对读者品味的尊重，以示评选的公平公正，但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还未有将最受读者欢迎奖与评选委员会评选结果同等设置的文学奖。所以，“大书奖”不单纯是评选委员会代表国家开展的文学批评活动，读者也是评奖主体和文学批评主体。即使读者的元话语与评选委员会的元话语不具有同等的合法性效力，在评选过程中承认读者品味，也的确表现出了同等尊重个体呢喃与群体喧嚣的姿态。通过对过去十四届“大书奖”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评选委员会评选的常规奖项往往和最受读

① 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80000 слов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ыражений. С.55.

者欢迎奖之间存在出入。^①

就特别奖而言，有些作家同时也是文学活动家，因此他们被授予“文学贡献奖”“荣誉与尊严奖”并不罕见。但是，出版、传播机构成为文学奖的授奖对象是“大书奖”所独有的。出版和传播也属于国家叙事构建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市场对于文学国家叙事的认同程度。其他文学奖项虽未专门设定这样的特别奖，但苏联解体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市场对文化领域的影响也是俄罗斯文学奖项较为关注的方面。例如，另一个同为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国家畅销书奖”，它的宗旨就是“以不一样的方式发掘叙事作品之高超艺术性的未知市场潜能”。^②该奖项的名称和宗旨都明确表达了，在甄选文学作品时，除了发现文字和内涵本身的艺术性之外，还要做“市场检查”（цензура рынок）——检视文学在市场当中的潜力。2018 年 7 月，莫斯科国立大学语文系教授格鲁布果夫（М.М. Голубков）曾在复旦大学讲学。在讲授“当代俄罗斯小说专题”时，特别提到了 21 世纪俄罗斯文化领域的市场检查问题。市场检查的概念是相对于苏联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而言的。21 世纪大众文学、大众传媒发展的洪流，使得民族文学、经典文学的生存不得不考虑市场的影响——文学产品的产品化、商品化使市场检查应运而生。在国家畅销书奖设立十余年后的 2015 年，“大书奖”首次将一些市场主体作为授奖对象正式纳入评奖机制，以评奖的形式肯定市场主体对于文学创作、文化领域的影响。一方面，这是政府在构建国家叙事的合法传播路径；另一方面，这又是政府对市场认同的国家叙事的反馈，是一种再次认同。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书奖”的文学批评形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中的国家叙事的两个路径：一是对国家形象的书写——国家作为客体被叙事，建立的是一种被共同体、社会认同的文化规范；二是国家意识形态叙事——国家作为主体在叙事，在国家构建过程中起到引导、建立规则的作用。前者

① 仅第十二届“大书奖”的常规奖和最受读者欢迎奖的三部作品完全一样，但奖项等级不同。第二、三、六、八、十、十一、十四届有两部作品相同。第四、五、七、九、十三届有一部作品相同。第二、六、十届的一等奖完全相同，分别是乌利茨卡娅（Л.Е. Улицкая）的《丹尼尔·施泰因：翻译家》（Даниэль Штайн, переводчик）、希什金（М.П. Шишкин）的《书信集》（Письмовник）和古泽尔·雅辛娜（Г.Ш. Яхина）的《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② 国家畅销书奖官方网站：<http://www.natsbest.ru/polozhenie-o-premii/>

对后者的作用往往不都是积极拥护的，也有无情地批判，存在解构和重构；解构与重构接连发生的过程，也是国家叙事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作用力是观察国家构建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2019年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助理的苏尔科夫（В.Ю. Сурков）在《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解释“深层人民”（глубинный народ）时，实际上就涉及了上述两种路径的关系问题：“数百年来，在光鲜的表面上，活跃着的是精英们——他们积极吸引人民到自己的某些举措当中，如党代会、战争、选举、经济试验，对此当给予精英们应有的评价。人民参与其中，但又保持了距离，他们不显现在表面上，而是在深处过着全然另一种生活。这两种国家生活——表面的和深层的——方向有时不同，有时一致，但从不混为一谈。”^①按照苏尔科夫的观点，活跃在表面的精英与朴实于深层的人民，是俄罗斯国家构建过程中两种不可忽视的力量，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国家叙事：精英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引导国家生活，人民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影响国家生活。

从“大书奖”的批评形式来看，其中的新世纪国家叙事路径，与苏尔科夫所说的俄罗斯构建各个历史阶段“长久之国”^②的路径存在相关性。“大书奖”首先是一个象征新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的符号，它的崇高位格与对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引领有关；另外，“大书奖”又是一个集成的概念，它应当体现出汇集普通民众思想的作用。“大书奖”的两种概念体系之间又存在纵向的联系。不仅如此，支撑两种概念体系的历史内容也是如此关联的。

（二）“大书奖”国家叙事的历史内容

文学奖项内含的文学批评内容，通常会借助获奖作品的主题表现出来。自“大书奖”设立以来，每届都有历史题材的作品入围和获奖。历史小说通过对小人物生活的描写，展现了特定时期的俄罗斯历史、文化、生活风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受到魁首地位的垂青。例如，格拉宁（Д.А. Гранин）的

①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февраля 2019.

② 苏尔科夫在《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有四种基本的国家形式，可以用建立者的姓名来命名：伊凡三世之国（莫斯科大公国和全罗斯时期，15-17世纪），彼得大帝之国（俄罗斯帝国时期，18-19世纪），列宁之国（苏联时期，20世纪），普京之国（俄罗斯联邦时期，21世纪）。参见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我的中尉》（Мой лейтенант...，2011-2012 年度一等奖）、雅辛娜（Г.Ш. Яхина）的《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2014-2015 年度一等奖）、伊加图尔林（Ш. Идиатуллин）的《勃列日涅夫城》（Город Брежнев，2016-2017 年度三等奖）、斯捷潘诺娃（М. Степанова）的《记忆的记忆》（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2017-2018 年度一等奖）等。当历史小说成为展现小人物生活的舞台时，许多历史名人的纪实被纳入了传记作品的叙事场。在过去十四届“大书奖”中，共有九部传记作品获奖，约占获奖作品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问鼎首届“大书奖”的就是传记文学作品——贝科夫（Д.Л. Быков）的《帕斯捷尔纳克传》（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它与瓦尔拉莫夫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传》（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2006-2007 年度二等奖）、萨拉斯金娜（Л.И. Сараскина）的《索尔仁尼琴传》（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2007-2008 年度二等奖）、沙尔古诺夫（С.А. Шаргунов）的《卡达耶夫传，追寻永恒的春天》（Катаев. Погоня за вечной весной，2016-2017 年度二等奖，下文简称《卡达耶夫传》）等，都是 21 世纪俄罗斯传记文学的佳作。2018-2019 年度的“大书奖”一等奖也是一部传记：列克曼诺夫（О. Лекманов）、斯维尔德洛夫（М. Свердлов）、西曼诺夫斯基（И. Симановский）合著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局外人》^①（Венедикт Ерофеев: посторонний）。

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历史的书写。这种书写从历史本身出发，却与历史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距离。这也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理解的文学对历史的呈现方式：“通过人的精神的积极参与，现实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某种媒介作用重建后才呈现出来时，它才成为‘作品’（fiction）。因此，还是人的精神的统合力起了决定性作用。”^②更确切地说，俄罗斯文学中的历史是带前置词的历史——“关于历史”，用俄语

^① 2018 年，俄罗斯出版了《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局外人》，以此纪念作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1938-1990）诞辰 80 周年。该传记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叶罗费耶夫的代表作《莫斯科-佩图什基》是具有自传性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主人公以作家名字的指小表爱形式命名。传记《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局外人》正是结合这部作品和叶罗费耶夫的生平进行传述的。其特别之处在于，可以被视为关于自传的传记。

^② [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427 页。

来表述是“об истории”，具体而言是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其中必然注入了作家的主观、民族共同体的主观和时代的主观。换言之，这种呈现方式也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构建。另外，在指称文学作品时，俄语语言文化语境中的история还可以指体裁，译成汉语是“历史故事”。列夫·托尔斯泰的《叶尔马克》就是一篇история，讲述了叶尔马克率部东征西伯利亚的故事，但其内容与历史编纂的内容存在差异，写作方式富有艺术性，是“история об истории”（关于历史的故事）。而这种历史的艺术性正是叙事独特性的表现，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在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当中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由此可见，与历史有距离的历史书写，其实是人思维的映射，有机会成为民族想象、政治思想、国家意志的载体。

在 21 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大书”是书写历史的书，其内容是关于国家记忆的。记忆看似属于过去，实际上却与当下的国家心理和国家行为有着共时的关系。因为记忆始终内在于新世纪的俄罗斯思想里，流露于国家的行动中。现在的俄罗斯对于历史过程的观照也是在自我揭示，正如当代俄罗斯作家斯拉夫尼科娃（О.А. Славникова）所说：“‘时代的列车’：愈是向远方行驶，愈是能深入了解过去。”^②阐释历史意味着阐释自身，认识自身。历史学语境下的历史意识，是“引导我们以过去来定位现在的一种阐释意识”^③，进入文学的诗意书写之后，这种意识则引导人们“以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同时在进入现实，特别是进入当代人的情感现实，这是作家由当代社会情状所引发的以历史故事切入的思考”。^④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增补了以现在书写过去的阐释意识。

① [德]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74页。

② 张晓强：“2006年俄语布克奖得主斯拉夫尼科娃访谈录”，《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页。

③ 陈新：“历史意识引导我们以过去来定位现在”，《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16日，第6版。

④ 张建华：“‘行走’、族群、历史叙事——评安德烈·沃洛斯的长篇小说《重返潘日鲁德》”，《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1期，第21页。

苏尔科夫在《长久的普京之国》文末强调：“我们的新国家在新世纪将会有长久而光荣的历史。”^①这也是对 2012 年普京在《独立报》上发表的《俄罗斯：民族问题》一文的回应，普京将“俄罗斯”明确为“历史国家”（Россия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的概念，并强调国家因此要有“统一的文化密码”，所以“在教育过程中首先要强化俄语、俄罗斯文学、国家历史等课程的作用”。^②同年末，即“俄罗斯国家历史年”结束之际，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指出：“要复兴民族意识，我们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合为一体，要澄清一个最朴素的事实，俄罗斯历史既不始于 1917 年，更不始于 1991 年，我们有连贯一致的千年历史，只有依托这个历史，我们才能获得力量，理解国家发展的内涵。”^③

俄罗斯政治话语中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概念，并且是一个连贯且长久的历史概念，包括两个向度——向深处与向未来——的伸展，以及向统一的民族国家收束。沃多拉兹金（Е.Г. Водолазкин）的《月桂》（Лавр, 2012–2013 年度一等奖）、沙罗夫（В.А. Шаров）的《返回埃及》（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Египет, 2013–2014 年度三等奖）等作品都曾深入到古老年代的俄罗斯，以探索民族力量、国家意志的深层根源。这不是 21 世纪俄罗斯文坛的新现象，各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都对这样的历史书写与构建大叙事的方式青睐有加。但反思、书写苏联历史，是 20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需要承担的使命，也是俄罗斯国家历史道路的特别之处。显然，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已经明确了这段历史作为国家历史的合法地位。但苏联历史对俄罗斯“统一的文化密码”的进入，仍需要更多的构建与认同。这段关于解体的历史关系着俄罗斯面对分裂主义暴力的能力，深刻影响着新世纪历史国家的“长久”问题。

民族力量、国家意志的深层根源越牢固，21 世纪俄罗斯面对分裂主义暴力的能力就越强，这个水平与国家构建的强度成正比。这种深层根源的牢

①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②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 января 2012. http://www.ng.ru/politics/2012-01-23/1_national.html

③ [俄]普京：“2012 年总统致联邦会议国情咨文”，《普京文集（2012–20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63 页。

固程度，与瑞士政治哲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所说的“国家古老历史指数”^①存在相似的逻辑。苏联历史既不是时间意义上古老的历史，也不是认同意义上“土著”的历史，因此，新世纪的俄罗斯有必要重新书写乃至构建苏联历史。“大书奖”显然也在回应这一需求。在获奖作品的历史主题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内含深层现代性的历史内容，主要通过记叙“深层人民”的生活来表现，以潜在的现代性来证明语言游戏的合法，借此更好地将苏联历史与俄罗斯国家历史过程融合在一起；二是纪实性的历史内容，主要通过传写历史名人的经历来表现，以纪实性来证明语言游戏的合法，从而坚定“深层人民”对“领袖人物”的认同。这两个方面又都是向着民族复兴的长久愿望上统一的。

三、“深层人民”的国家叙事

许多文学作品的叙述都围绕人延展开来。从这一点看，文学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锦书”——将时空云雾另一头的经历寄往这一头的日常。按照通俗的理解，人类历史总是关于过去的人和事儿，然而，并不是所有过去的人和事儿都有机会进入历史的视野。虽然，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进入历史叙述的人和事儿总是经过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文学的确存在对历史的艺术虚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在虚无历史；文学有自己阐释历史、传承历史的叙述方式和叙事形式。正是在这些叙述当中，我们有机会看到民族共同体得以延续的某些持久的元素——并以“深层的”来形容它。

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В.Г. Белинский）在《文学的幻想》（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чтания）的开篇，便提请人们关注文学之民族性的重大意义——诗的语言拥有展现人民伦理之宏大叙事历史的、政论的厚重。但这实际上还是精英对于现实的观照。杜勃罗留波夫（Н.А. Добролюбов）对“人民性”的理解，更加接近苏尔科夫的“深层人民”：“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

^①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8页。

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①这样看来，“深层人民”似乎是指那些毅然坚守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俄罗斯人，他们的历史成就了“不可战胜的文化引力，将民族凝聚起来”。^②就这一方面而言，“深层人民”的叙事，首先是关于众多普通人有力量的生活——小人物的著名生活。

（一）小人物的著名生活

以著名生活为焦点的文学多为历史小说。俄罗斯文学语境中的历史小说（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是以文学形式再现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和事件的一种叙事类文学，与西方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如出一辙，由古希腊而来。“公元前4世纪，历史编纂学分为两个方向：实证历史编纂和历史演义编纂。编纂实证历史的目的，是恢复众多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意义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编纂历史演义的目的与文学艺术最相近，即恢复众多历史事件的外部图景，使其尽可能鲜明而生动。”^③实证历史和历史演义之间的差异，在普希金笔下表现为史学著作《普加乔夫史》和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对普加乔夫起义呈现方式的区别。前者关注史学链条中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后者则通过艺术加工，提高人物形象的饱和度，加强情节的冲突性，使普加乔夫起义成为观察农奴制社会图景的窗口。前者采用的是实证科学的方式，后者则是艺术的方式。而从根本上来说，艺术的方式往往是一种构建叙事的方式。

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内含了利奥塔尔所说的那种启蒙叙事：“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用一个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④例如，描写哥萨克头领叶尔马克率部东征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将其视为民族英

① [俄]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84页。

②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③ Николокин А.Н(главн. 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Москва: НПК «Интелвак», 2001. С.326.

④ [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引言，第4页。

雄。因为他为沙皇俄国开疆拓土的政治事业打通了前路，其匪首身份和殖民行为在高尚化的政治目的遮盖下，转而显示为“知识英雄”。在苏联时期，“知识英雄”指的是高尔基笔下的巴维尔和尼洛夫娜那样的人——在生活的磨炼与革命的斗争中提高政治觉悟与理论修养——日臻成熟的、先进的、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革命者。从国家文学奖“大书奖”来观察 21 世纪俄罗斯联邦时期的“知识英雄”，指的是那些可能曾经无法进入苏联时期的国家叙事、却在新世纪俄罗斯的反思和伦理政治语境中获得内生意义的人，如《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中的鞑靼女主人公祖列依哈、《我的中尉》中的“我的中尉D”、《我的孩子们》（Дети мои，2018-2019 年度三等奖）中的德裔俄罗斯教师巴赫、《勃列日涅夫城》中少年幸福的阿尔图尔……这些“大书奖”获奖作品所展现的普通人生活，都内含了上述启蒙叙事的模式。

《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是“大书奖”获奖作品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典型的反映新世纪俄罗斯国家叙事构建需要的历史小说。它在文学再现的历史现实中，涉及了当代俄罗斯政权在实现主权民主、民族复兴方面所关心的诸多细节：包括苏联身份认同、多民族统一、国家空间构建、西伯利亚开发、宗教信仰、精神重塑等等。女主人公形象的弱小和历史身份的“反动”，都使她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在第十届“大书奖”的颁奖典礼上，《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被评价为劳改营主题（лагерная тема）的再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劳改营里，关押着各种各样革命的、进步的力量。正是在流放服役的境遇中，随着坎坷人生经历的延展，祖列依哈逐渐释放出自己的生命力，并获得了进步性，从而有机会成为 21 世纪俄罗斯联邦语境中的“知识英雄”。该作品的作者、鞑靼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在叙述这部作品的构思过程和内在逻辑时，也提到了上述问题：

我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它是我祖母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她与几百万苏联公民一样，成为那个非常时期的牺牲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六年。这次流放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而我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时，准备描写的正在于……一个人命运的转变，即一个赴死之人突然喜获第二次生命，而且与第一次生命迥然不同……从她第一次生命中所处的古老世界奔向现代世界，在那里，她将度过自己的第二次生命，

并将回答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能否去爱一个陌生人、敌人——说另外一种语言，信奉另外一种宗教，身处另外一个社会阵营？^①

首先，这部文学作品的情节，来源于苏联时期小人物的真实经历。女主人公祖列依哈的原型是作家雅辛娜的祖母，“她与父母被流放时才十六岁，这部作品成了她在西伯利亚逐渐成长的历史，是女性的成长史”^②，“个体性历史的书写是该作品的基础”。^③从作家的自述中可以看到普通人的经历转变为著名生活——历史叙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反映了俄罗斯接纳意识形态不同的苏联历史进入新世纪国家叙事的内在逻辑。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是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目不识丁的祖列依哈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中，因未生育而遭到夫家的薄待。后来，她的丈夫被当作富农打死，自己也因为富农的身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在流放路上，她生下了儿子优素福，并在生存环境极其原始的西伯利亚挣扎着存活了下来。最后，她与杀死丈夫的警备长伊格纳托夫相爱。作家没有借由祖列依哈的坎坷命运将笔墨放在对苏联历史的批判上——而是将这苦难的底色作为起点，纳入女主人公蜕变的过程。这时，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在这种具有现代性的启蒙叙事中被弱化了。

在以二战史为题材的《我的中尉》中，“我”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参与者，因为在战争面前的胆怯，一度不被承认是“英雄”。“我的中尉 D”是战争极端环境中分离出的另一个“我”，一个天真、英雄主义爆棚的小指挥官。“我”的愿望是保住性命，快点结束战争；而“我的中尉 D”则希望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来实现英雄梦。“我”身上的双重人格、身份、愿望交织在战时和战后的灾难之中。“我”与“我的中尉 D”的对话，延展为人民心理与国家意志的复调，其中既再现了普通人的记忆，又重估了苏联的国家记忆。格拉宁的观点是，战争里真正的英雄其实是幸存者，因为他经历了战时的枪林

① [俄]古泽尔·雅辛娜：《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张杰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致中国读者”，第1页。

② Автор бестселлера 2015 года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Гузель Яхина ответила на вопросы читателей. 29.06.2016. <http://www.ap22.ru/paper/Avtor-bestsellera-2015-goda-Zuleyha-otkryvaet-glaza-Guzel-Yahina-otvetila-na-voprosy-chitateley.html>

③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2015 года. 11.12.2015. <http://www.bigbook.ru/news/detail.php?ID=24624>

弹雨和战后长久的心理折磨。在这些沉重而伟大的生活经历面前，许多人物“暂时”的英雄主义都是不值得一提的。生命的存在是对战争最好的批判和质疑，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在战争的历史中为守护命运而努力生活的小人物们也是新世纪的“知识英雄”。这是借助“生命”的母题来实现的。

新世纪俄罗斯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书写，往往都是宏大而沉重的。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的母题，可以用关键词“觉醒”来总结。随着西伯利亚流放路的延展，祖列依哈一次次睁开眼睛，她眼前的世界，从“四周漆黑一片，好像是身处地窖之中”^①变成“周围笼罩在黎明时分玫瑰色的烟霭之中，所有东西都显得模糊而缥缈”^②，再变成“四周阳光闪耀，金光灿灿”^③……这样看来，祖列依哈成为俄罗斯的隐喻，不仅因为她的女性身份与阴性名词 *Россия* 的文化伴随意义有关联，还与她的命运转变和觉醒有关。世界随着“行走”在祖列依哈眼前显现的过程，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大地周游”^④传统；但这里不是单纯宗教意义上的寻乐园朝圣，而是指俄罗斯在复杂历史道路上摸索着前行的现代过程。从而肯定了这样的叙事：苏联时期，一些制度的不完善的确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过苦难，但是这种政治伦理之下还存在其他具有启蒙意义的现代部分。

这个部分，作家又借助“爱”的母题，深化并升华了表达。《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中男主人公伊格纳托夫的苏联警备长身份与祖列依哈的富农身份，分别代表了当时两个敌对的阵营。然而，对于祖列依哈来说，虽然丈夫、婆婆和自己所处的阵营相同，都是富农，但他们才是旧制度的象征——压制了作为人、作为女性的祖列依哈。就这方面而言，伊格纳托夫杀死了她的丈夫，似乎是苏联体制对她的挽救和维护。在丈夫那里，祖列依哈是他奴役的工具；而在伊格纳托夫这里，她获得了平等的对待，也散发出自己的魅力。

① [俄]古泽尔·雅辛娜：《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第3页。

② 同上，第213页。

③ 同上，第491页。

④ 我国学者查晓燕解析了《死魂灵》《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作品中的“大地周游”因素，这类作品通常以旅行为主线，通过主人公在行走过程中与各色人物、事件的照面，描写当时的俄罗斯历史图景。另外，查晓燕还认为该因素与俄罗斯文化中的朝圣现象有关。参见查晓燕：“寻乐园——俄罗斯文学中的‘大地周游’因素探析”，《国外文学》，2005年第3期，第50-56页。

富农阶级的祖列依哈、杀人的伊格纳托夫、胆怯的战士……似乎成了苏联历史积极面向的象征——以大历史的眼光回望时，某个时段的制度往往会存在不够现代的方面；但作品更加想表达的是，或者说“大书奖”更想挖掘的是，那些深藏于这个民族共同体深处的精神力量，总是现代的，也是启蒙的。这种力量可以在更长远的历史中使人民的进步性显现出来。不幸情节观照下的小人物获得了悲剧的崇高，成为符合政治伦理的英雄形象，则不会因为其“出处”而丧失民族英雄身份的合法性。另外，这些小人物也因为自己所经历的著名生活而成为国家的“深层人民”。

（二）现代性国家叙事的构建

诚如作家雅辛娜所言，《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最初只是关于祖母坎坷经历的故事；而《我的中尉》原本是格拉宁的一些零散的战壕日记……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在进入文学作品、国家文学奖批评活动之后，如何成为“宏大历史中小人物命运的书写”^①——个性的如何成为国家的？苏联时期的如何成为新世纪的？历史的如何成为未来的？

作为一项国家文学奖，“大书奖”选择了哪些作品、哪些作家，一定程度上就表示国家意志认同了哪些文化符号内含的历史书写。从表面上看，国家文学奖对历史的选择，是站在新世纪的历史节点上回顾自己的经历，厘清走过的道路；而实际上是国家站在俄罗斯联邦政治伦理的立场上，重新阐释过去的自己；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回顾，而是呈现国家现在的“心理状态”。

小人物的生活之所以有机会在当代国家文学奖的平台上被“放大”，是因为人物虽小，经历虽平凡，但他们普通生活中的内在逻辑和情感，展现的是关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也是符合当代政治伦理的元叙事。更确切地说，我们上文分析的有现代性“觉醒”的逻辑，以及有超越性的“爱”的情感，都借助了历史哲学的元话语，将历史现实重构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叙事。这也是俄罗斯文学批评家阿格诺索夫（В.В. Агеносов）所描述的那种“艺术中的历史主义”：“首先要求在艺术上反映时代的具体历史内容及其不可重复的面貌和情调，因此，在全民族的事件和人物个人命运中揭示出来的社会发

^① Гузель Яхина о судьбе малень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большой истории. 26.09.2017. <http://ptel.cz/2017/09/guzel-yaxina-o-sudbe-malenkogo-cheloveka-v-bolshoj-istorii/>

展趋势成了描绘的对象。”^①正如格拉宁在《我的中尉》中极力呈现的也“不是‘著名人士的生活’，而是‘无名人士的著名生活’”^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时期苏联人的生活。诗的历史使人们有机会在片段中看见普遍，“‘无名氏’应该不完全无名，他自己应该有一种可见性，以便能让群体变得可见，或让他所体现的时间变得可见”。^③这不知名的、可见的构建，实际上已经不是作家的政治，而是文学的政治——来自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在进入新世纪俄罗斯的政治话语之后，与先于国家存在的人民性结合在一起，进而依靠“深层人民”的长久性和稳定性获得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2016-2017年度的获奖作品全部与苏联历史有关。一等奖丹尼尔金（Л.А. Данилкин）的《列宁传：阳光尘埃的基督像》（Ленин. Пантократор солнечных пылинок）解构了列宁与苏联历史时期的绝对联系，在更加宏观的语境中评价列宁和十月革命；二等奖的《卡达耶夫传》重在重估苏联作家与文学的民族性；三等奖的《勃列日涅夫城》则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社会生活，被喻为“苏联末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④第十二届“大书奖”以“全部权力归俄罗斯文学（Вся власть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为口号^⑤，致敬一百年前在俄罗斯国家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十月革命。该口号的互文性使我们回忆起1917年4月17日诞生的著名源文本——《四月提纲》，列宁在其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为布尔什维克确立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但是，“Вся власть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中的власть在新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语境中已经不再是《四月提纲》中的“政权”之意，它与文学的结合使其由原本指代的政治权力转变为反思、阐释、甚至是质疑的权力——由国

① [俄]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② [俄]达尼埃尔·格拉宁：《我的中尉》，王立业、李春雨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③ [法]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5页。

④ Сохарева Т. 5 главных романов марта. 30.03.2017. https://www.gazeta.ru/culture/2017/03/30/a_10603007.shtml#page7

⑤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ыбор больш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06.06.2018. <http://www.bigbook.ru/news/detail.php?ID=29474>

家政治话语转化为文学政治话语。“现代性……的本性，是要张扬一种彻底而无情的反思与批判精神”。^①“全部权力归俄罗斯文学”借助与十月革命历史的互文，体现了文学革命性地观察历史的视角。苏联时期的历史，俄罗斯文学有权去反思、批判、书写……而“谁有权解释历史，谁就有权阐述现在”。^②所以，从表面上看，第十二届“大书奖”的口号是在呼唤俄罗斯文学的复兴；但更深层的是在表达新世纪俄罗斯对自身阐释权的吁求。这是国家维护自身历史性统一的重要前提。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克林格（О.А. Клинг）教授认为，20、21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开启的是继“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后的“白金时代”（платиновый век），在这一时代，文学需要大大发挥文化记忆功能。^③而一个国家出于对自身统一的维护，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必然对历史传统的连贯性和延续性有所需求。“根据关于筹备庆祝俄罗斯国家（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诞生 1150 周年活动的会议，以及与历史学者会晤的结果，俄罗斯政府展开了 2012 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年的相关工作。”^④这一活动的开展，表明了俄罗斯联邦在国家历史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即俄罗斯的国家史始于《往年纪事》中记载的公元 862 年^⑤，而这一年也被明确为俄罗斯国家历史的元年。在此之后的历史过程——无论政体与意识形态如何——都是俄罗斯国家史的一部分。虽然俄罗斯国家史可以如苏尔科夫所述，根据各个时期的发展特征以建立者为名一分为四，但这并不影响俄罗斯历史传统的连贯性和延续性。这也意味着，任何一段国家历史的构建，都要服从于当下国家的政治伦理。那么，与之对应的文学对历史的反思与阐释也必须遵循这样

①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第 649 页。

② 张树华：“30 年来俄罗斯在历史观和历史问题上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 年 1 月 13 日，http://orig.cssn.cn/sf/201801/t20180113_3814225_6.shtml

③ Клинг О.А.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X-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ов – платиновый век? “新俄罗斯文学与民族精神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黑龙江大学，2015 年 11 月 7 日。

④ Об исполнении поруч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об объявл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2012 года Год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19.11.2011. <http://www.kremlin.ru/acts/assignments/execution/15126>

⑤ 详见[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朱寰、胡敦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4-15 页。

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叙事的现代性似乎是有政治条件的。

那么，这样的策略看起来有些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①，目的是使意识形态获得更普遍的历史意义。但是，“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②“大书奖”在书写“小人物的著名生活”时，以“深层人民”生活的现代性为基础构建国家叙事，目的是“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哲学解放与现实解放可能存在一定距离。从更深层次影响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应当是致力于现实解放的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精神。“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③换言之，21世纪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开发、区域战争和冲突的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等问题上，能否使“祖列依哈”们、“我的中尉D”们摆脱曾经的困境，并保有进步性，能否推行真正现实解放的伦理政治，才是现代性国家叙事构建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即将在下文论述的“领袖人物”国家叙事，正是借助“领袖人物”发挥过积极作用——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现实解放——的某些历史现实，来丰富国家叙事的现代性、现实性，甚至是合法性。

对启蒙叙事的需要和对苏联历史的反思，首先都说明了21世纪的俄罗斯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那种后现代主义无中心的涣散和颓废，至少在国家政治层面暂时消退了。其次，俄罗斯联邦与苏联之间存在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张力；因此国家需要在自己客观存在的苏联历史现实中，发现并选择具有通约性的元素来化解这个张力，以便证明，即使在那个与今天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时期，俄罗斯依然秉承着自己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逻辑。这样“历史正确”的国家叙事，要比特定意识形态下“政治正确”的国家叙事更

① [德]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42-143页。

② 同上。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具有说服力。在现代性国家叙事的构建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日常生活中的众多俄罗斯人，被“知识”^①为支撑民族延续的、进步的英雄，从而进入了“深层人民”的内涵。而在这样的国家叙事中，“深层人民”在面向新世纪俄罗斯未来时，或者说在面向新的伦理政治目标时，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坚守一种合法性——他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应该保持那种可以使新世纪俄罗斯长久光荣的现代性。

四、“领袖人物”的国家叙事

传记是备受俄罗斯文坛重视的文学体裁之一。站在俄罗斯的民族立场上来看，人们可以在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看到优秀的先辈，找到遗传到当代的基因，继承下来的性格，确定当下的自己是从杰出人物所在的历史深处走来；这有助于俄罗斯人对共同体身份的认同和民族自信的坚定。苏尔科夫是这样解释的：“社会仅信任领袖人物（первое лицо）……这是事实，也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国家对这一事实的重视，开创事业以此事实为考虑和依据。”^②站在俄罗斯的国家立场上来看，对内，塑造国民偶像在教育、甚至思想统治方面有促进作用，利于国家文化、思想、政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对外，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被看作是国家形象的象征，著名历史人物的经历虽不可复制，但个性、人格等方面的魅力可以被视为国家性格、软实力的一部分。

（一）“领袖人物”的行动逻辑

早在 1890 年，俄国就开始专门出版传记书系“杰出人物传记丛书”（Серия биографий «Жизн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简称 ЖЗЛ），由巴夫连科夫（Ф.Ф. Павленков）创立，1924 年中断。1933 年在高尔基的倡议下恢复，由报刊联出版。1938 年起，该书系归属于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前后跨越了三个世纪，有 130 年的历史，至今已经出版了俄罗斯国内外政治、文化、文学、宗教等领域的杰出

① “知识”是表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认识和经验的名词。这里作动词用，强调认识行为和经历行为的主观性和时代性。

②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人物传记 1800 多部。获得“大书奖”的绝大部分传记作品都属于“杰出人物传记丛书”。可以说，评价著名历史人物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传记文学是“大书奖”主推的文类之一。在过去的十四届“大书奖”中，共有 9 部传记作品获奖：

第一届一等奖：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

第二届一等奖：瓦尔拉莫夫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传》

第三届二等奖：萨拉斯金娜的《索尔仁尼琴传》（“最受读者欢迎奖”三等奖）

第五届一等奖：巴辛斯基的《列夫·托尔斯泰：从天堂出走》

第七届二等奖：卡巴科夫（А.А. Кабаков）和波波夫（Е.Г. Попов）合著的《阿克肖诺夫传》

第八届二等奖：别利亚科夫的《古米廖夫，古米廖夫之子》（“最受读者欢迎奖”二等奖）

第十二届一等奖：丹尼尔金的《列宁传：阳光尘埃的基督像》（“最受读者欢迎奖”二等奖）

第十二届三等奖：沙尔古诺夫的《卡达耶夫传，追寻永恒的春天》（“最受读者欢迎奖”一等奖）

第十四届一等奖：列克曼诺夫、斯维尔德洛夫、西曼诺夫斯基合著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局外人》

在这 9 部传记作品当中，除巴辛斯基的《列夫·托尔斯泰：从天堂出走》是以 19 世纪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传主外，其余获奖传记的传主均为 20 世纪苏联时期的杰出人物。并且绝大多数传主都有作家身份。其中，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是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丹尼尔金的《列宁传：阳光尘埃中的基督像》是唯一一部以政治领袖为传主的获奖传记，但该传记的笔锋主要在于：以哲学和艺术的形式展现苏联与 21 世纪并不矛盾的绝对精神，从标题中就可见一斑；列宁的政治活动主要提供文献基础，作为具体内容支撑绝对精神内部的行动逻辑。

传记是专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的体裁。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该体裁始于对拜占庭文学行传体裁（житие）的接受，最初用

于伟大宗教人物和民族英雄带有传奇色彩的生平纪事，如《阿瓦库姆行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等。而后行传衍化为两类文学体裁：一类是传记（биография），记录俄罗斯伟大历史人物及其生平；另一类是“以‘……的生活’或‘……的一生’为题的小说”^①，主人公通常为普通人，如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俄语的“биография”一词由希腊语的bios（生活）和grapho（写作）组合而来，是描写人物生平的一种体裁，是对个人生活审美的或科学的认识，目的是在个体经验中探索并揭示意义重大之社会活动的根源。”^②根据对个人生活认识方式的不同，传记可以分为艺术传记和史学传记。前者进入文学领域发展为传记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биография），偏重人文性。这类传记的作家们通常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想象，褪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使他们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现象、文化符号进入当代，启发人们探寻个体生活中的普遍经验和规律。后者则在史学语境下成为史传，偏重社科性，写作方式与断代史相似，以传主生命或社会活动的起止为时间轴，对这个时间段内与传主相关的历史现实进行记录，带有“考古档案”的特点。对于具体的传记作品而言，很难界限明晰地划分它的艺术性和史学性。但在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中，传记首先是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它们还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具有纪实性。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专家尼克柳金（А.Н. Николукин）所认同的传记文学的价值：“承认传主在历史、文化、政治生活或经验等方面的重大民族性或世界性意义是传记的前提。传主生平作为文献材料构成了传记的纪实方面；作者塑造传主形象，描绘他的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推进传记的情节，形成个性和规律性的发展动态。”^③

如果把俄罗斯国家视为公民群像的象征，即大写的“俄罗斯公民”，那么，国家文学奖遴选传记的任务，则是在历史中寻找契合这种需要的、可塑的著名公民原型，也就是“领袖人物”们。在苏尔科夫的政治话语中，普京

① 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② Николукин А.Н(главн. ред.).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С. 90.

③ Там же.

之国的先进性和独特性在于，“善于倾听和理解人民，深入了解人民的全部内在，并适当采取行动……这适合人民，与人民同路，意味着不会遭受过于沉重的破坏性历史逆流。所以，这样的独特性才是有效而长存的。”^①“领袖人物”除了要具有思想上的前瞻性和先进性以外，还要具备与人民朝着相同方向看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不仅要求“领袖人物”具有先进性和权威性，还要求他亲近并理解人民；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脱离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在这一方面，“领袖人物”的俄罗斯国家叙事构建，与西方崇尚理性、自由的进一步解放的叙事标准有所不同：“领袖人物”借助历史书写获得先进性和人民性，稳固了自身与“深层人民”之间的纵向体系，形成的是一个自带方向、自决命运的共同体。

传记作家们通常会在书中介绍自己为传主作传的动机，在这里我们有机会看到“领袖人物”们之所以成为“领袖”的特别品质。

萨拉斯金娜在《索尔仁尼琴传》的第一章写道：

传记作家为什么要动笔——是为了寻找真理，还是为了证实自我？

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的选择大概会落在问话的前半句上。本书的选择也是如此。^②

在萨拉斯金娜看来，索尔仁尼琴曾被污蔑和诽谤的人生经历，需要她提供更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去捍卫这位曾经的不同政见者在俄罗斯历史中的积极意义。她也是的确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索尔仁尼琴与肖洛霍夫有关系的事件中，传记作家明显站在了索尔仁尼琴的身边。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学界，还是西方和中国学界，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的。萨拉斯金娜所做的“寻找真理”的传述，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值得信任的大人物的行动逻辑。她把题为“一个幸运之人”的部分作为全书尾声，将命途多舛的索尔仁尼琴对于作家身份的实现、军人使命的忠诚、爱国公民的持守，归结为传主对自己人生标准的彻底完成。萨拉斯金娜声称，她绝不裁决传主的伟大：“传记作家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传记作家是历史学家兼编年史家，是见证人兼收藏家，是讯问者兼跟踪追击的猎人。他不是自己传主一

①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② [俄]柳·萨拉斯金娜：《索尔仁尼琴传》，任光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生的主人和他世界的继承人，而只是一个辛勤的、温顺的劳工而已。”^①她借助史料的可信来证明传主值得信任。而值得信任也是俄罗斯“领袖人物”需要具备的重要品质。苏尔科夫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俄罗斯国家的当代模式始于信任，并依靠信任得以维系。这是俄罗斯与推行质疑和批评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俄罗斯的力量也在于此。”^②

但是，仔细观察萨拉斯金娜的追问：“为什么传记作家要动笔？”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确定答案的，或者说是根本没有答案的。每一个传记作家都有为传主作传的个性动机，而每一个读者都可能在传记作家的文字中读到自己心目中的传主。如此说来，传记所回答的“为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十分开放的语言游戏：

“为什么”的问题在其严格意义上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回答。我们只是“指出”……因为我们“指出”，我们断言，存在着指令。这是种特殊的语言游戏，断言的语言游戏。这一语言游戏没有源头；它不是可以推断出来的……这意味着任务就是增加和完善语言游戏。我指的是，最终，这一论题会导向何方呢？导向最佳意义上的文学，也即语言游戏的实验事业，一种广泛的文学……^③

按照这样的理解，一切的语言原则上都可以视为“为什么”的答案，而“为什么”的答案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语言游戏，从而构建了一个艺术世界。传记作家以文学的方式整合史料，在此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已经不完全是传主真实的经历，而是传记作家抽象出来的某种与传主有关的行动逻辑。萨拉斯金娜在索尔仁尼琴的人生经历中抽象出来的行动逻辑是“彻底而标准的自我实现”，这也使传主成为象征“完美”的形象。并且，这种“彻底而标准的自我实现”，实际上也是苏尔科夫所说的那种“深入了解人民全部内在”的同义表述。萨拉斯金娜想要追求的“真理”，其实是这种关于“领袖人物”与“深层人民”联通的叙事。即使曾侨居海外，索尔仁尼琴也是坚定地面向俄罗斯：“我回俄罗斯的决定绝对是坚定的、不变的，甚至说毫无

① [俄]柳·萨拉斯金娜：《索尔仁尼琴传》，第15页。

②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③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疑问。过去当有人取笑我，说你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回国的，我在那时就知道我能回去。”^①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人民与社会的关切，被视为他有机会经受住“历史逆流”的关键。换言之，“领袖人物”之行动逻辑的内生力量一方面源于对自我的坚持，另一方面则源自与“深层人民”聚合性的联通。

贝科夫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历程为史料，构建了“谦逊而不朽的基督信徒”的行动逻辑：

通常有两种传记写作方法，一是辩护式的（绝大多数），二是有意低调的，为了避免老生常谈，可以说是反观传主的伟大（阿布拉姆·捷尔茨写普希金，纳博科夫写车尔尼雪夫斯基，兹维列夫写纳博科夫）。用低调的语言表达，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折中的人物形象。这在辩护式的语言中则被称为包罗万象。^②

在全书的论述中，贝科夫描写了诸多帕斯捷尔纳克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自修的细节，并在文末以“文学学习”（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чеба）来形容他的天赋。“文学对人类没有任何其他的义务”^③，文学所能做的就是让人们在其中谦虚地学习，感悟自身与世界。这种“谦逊而不朽的基督信徒”的行动逻辑，更像是“彻底而标准的自我实现”之行动逻辑有形而上意味的表达。

沙尔古诺夫在《卡达耶夫传》的开篇提出了两个“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优秀的作家已经被遗忘？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了？这同样是个问题。”^④《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局外人》的传记作家们写道：“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尝试传述这样一个人：一个有机会在不自由的年代、不自由的国家自由生活的人。”^⑤这些叙述都指出了传主不愿意湮没于苏联意识形态的珍贵品质。“大书奖”选择了这些方面——无论是卡达耶夫对自我的坚持，还是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于不自由中对自由的追求——实际上都是在认同这些“领袖人物”的行动逻辑。从而说明，在新

① [俄]柳·萨拉斯金娜：《索尔仁尼琴传》，第895页。

② Быков Д.Л.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8. С.14-15.

③ Там же. С.889.

④ Шаргунов С.А. Катаев: «Погоня за вечной весной».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8. С.5.

⑤ Лекманов О, Свердлов М, Симановский И. Венедикт Ерофеев: посторонни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18. С.436.

世纪的俄罗斯，值得“深层人民”信任的应当是可以倾其一生坚持自身、实现自身的人物，这样的“领袖人物”有能力对抗复杂多变的环境，走向稳定和长久。正如苏尔科夫所使用的“领袖人物”语境，表达的就是对普京行动逻辑的信任。

（二）纪实性叙事的构建

在有限的历史时间和人物的个性中表达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精神，传记和历史小说在这一方面存在相似性。但相对于历史小说而言，传记是具有纪实性的文学体裁。《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传》的作者瓦尔拉莫夫曾指出，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纪实文学（非虚构）性质。^①文学的纪实性更容易使人们在确切存在过的人物和事件中，相信作品中构建的“领袖人物”的行动逻辑。可以说，纪实性（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сть）是使叙事合法化的有效途径之一。纪实性指的就是非虚构的性质，俄语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的意思是“以文献、事实为基础的”。^②在历史小说当中，主人公、情节与现实中历史人物、事件是艺术形象与原型的关系，这里的真实更多是情感和思想的真实。相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在传记的叙事场中，历史人物、事实以及文献的进入要更加直接。

萨拉斯金娜的《索尔仁尼琴传》具有较为鲜明的纪实性。首先，萨拉斯金娜自2000年起就开始为《索尔仁尼琴生平创作年谱》收集文献资料，对一些公开出版物进行过查证，整个过程持续了八年之久。其次，这是一部传主在世时撰写的传记，其中的许多文献资料和历史事件都得到了传主的证实。因此，在《索尔仁尼琴传》中，人物生平事迹的坐标系十分清晰，引文和佐证材料也十分充实。萨拉斯金娜的史学态度和索尔仁尼琴的亲历，使得该传记尽可能地接近了非虚构的程度。

但是，在受读者欢迎程度方面，萨拉斯金娜的《索尔仁尼琴传》要比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沙尔古诺夫的《卡达耶夫传》、丹尼尔金的《列宁传：阳光尘埃的基督像》逊色一些。尤其是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

① Варламов А.Н. 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сегодня: сюжеты и лица.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所俄罗斯文学启真讲坛，2020年7月11日。

② 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80000 слов и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ыражений. С.172.

在 2005 年首版之后再版了 13 次（2018 年第 14 版），发行量之大堪称“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之首。这部作品的纪实性要大大弱于《索尔仁尼琴传》，却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贝科夫在这部传记中使用了更丰富的诗的语言和文学批评的风格：

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清晰地分为三个时期，正如俄罗斯的别墅之夏——分为三个月。无论他写下多少令人陶醉的冬天诗句——从初露头角的《一九〇五年》到临终前的《雪在下》，他为我们呈现的终究是夏天……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夏日充沛的降雨、炽热的太阳、花朵的盛开与果实的成熟；他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夏天——与恋人的相遇、出色的构思、精神的转变。我们用这个隐喻来描绘他的一生。^①

贝科夫用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夏天的月份来概括帕斯捷尔纳克的三个时期；在“八月”这一章的末尾，在对帕氏《八月》一诗做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叙写了诗人笔下著名主人公尤里·日瓦戈的死亡现象。贝科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生平的纪实，更多是对其文学作品和思想感情的纪实。沙尔古诺夫的《卡达耶夫传》、丹尼尔金的《列宁传：阳光尘埃的基督像》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强调思想与情感的真实也是文学传记所具有的特征。

许多历史人物往往因其杰出或伟大而在文学作品中获得神圣而崇高的品格。例如我们上文分析过的有着不朽基督教思想的帕斯捷尔纳克，为国家命运、公民义务而终身忧思的索尔仁尼琴，以及敏感于社会体验的、二战后苏联文学的代言人阿克肖诺夫（В.П. Аксёнов），甚至还包括被形容为救世主和基督像的列宁……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们人生经历的延展，与现代性叙事的构建相似，往往也带有历史哲学的特点。作家丹尼尔金选择列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的笔记作为《列宁传：阳光尘埃的基督像》的卷首语：

在古代哲学中尘埃（阳光中）的作用，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灵魂就是阳光中的微尘（尘埃、原子）”。^②

这意味着，丹尼尔金所研究的列宁史，已经不是业已成为过去的、时间

① Быков Д.Л.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С.16.

② Данилкин Л.А. Ленин: Пантократор солнечных пылинок.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7. С.5.

内的东西，而是沉淀下来的思想成就——超越时间的、不朽的精神存在，这样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应当在现在进行时、甚至是将来时中也是伟大的灵魂。传记作家的目的，正是要展现列宁超越时间的、弥散在阳光下的微尘般精神所凝结的民族精魂。

但是，与小人物的刻画不同的是，着重描写著名人物的杰出品质，有时会使人感受到与历史现实的脱离。就《列宁传：阳光尘埃的基督像》而言，问题可能会在于：如果列宁拥有救世主的品质，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动逻辑？社会主义的、无神论的苏联领袖，如何与基督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为此，传记需要提供新的事实来解释这些问题：无论在何等艰难的境况下，“列宁都是列宁——都是使一种制度从无到有的革命者，并凭借这一制度在革命混乱的年代夺取了政权，将混乱转变为正常的且能够发挥职能的国家，并为第三世界国家夺取政权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式。”^①所以，丹尼尔金才在全书标题中将列宁称为“пантократор”——在宗教话语中，该词语是对耶稣基督、救世主的指称，但丹尼尔金并没有强调传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意义和神圣性，而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证明他拥有类似于救世主的化混沌为秩序的能力。在这里是人的能力，而非神的，即使它的出现可能带有历史的偶然性。那么，列宁作为值得“深层人民”信任的“领袖人物”的行动逻辑，应当是被纪实性所证实的、使秩序得以在现实中稳定存在的能力。

所以，“大书奖”传记作品构建纪实性叙事的目的，在于解决“信任”的问题。无论是思想情感的纪实性，还是文献、事件的纪实性，都在努力发掘“领袖人物”们更多真实、可靠、忠诚的方面。关于“深层人民”的“大书”，借助内在的共同体认同和现代性的历史书写获得合法性；但关于“领袖人物”的“大书”首先具有的是一种权威性，因此需要展现更多真实存在过的部分来获得并证实“深层人民”的认同，从而确立合法性。而“深层人民”信任“领袖人物”这一行动逻辑得以存续，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历史能否长久的问题。

^① Данилкин Л.А. Ленин: Пантократор солнечных пылинок. С.766.

五、结语

“长久之国”的概念是苏尔科夫在《长久的普京之国》一文中提出的，以此说明 21 世纪的俄罗斯是“普京之国”，与“伊凡三世之国”“彼得大帝之国”“列宁之国”并列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四个“长久之国”。相对于其他三大“长久之国”总共近五百年的历史而言，“普京之国”处于正在进行时，尚在经历青春。站在 21 世纪 20 年代初的今天，新世纪俄罗斯的“普京之国”能否长久、将选择怎样的方式走向长久，是值得俄罗斯研究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文学、文化视角的研究，涉及了影响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内生性方面。

文学对政治的回应，往往是借助叙事的构建来实现的。设立于 2005 年的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在评奖机制和获奖作品的内容方面，表现出对文学批评活动主体的广泛吸纳，从而使国家叙事有机会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建构。历史题材的作品，通过对俄罗斯历史人物、事件的回顾，重新构建了国家走过的复杂的历史道路。其中包含了“深层人民”的叙事和“领袖人物”的叙事。“深层人民”叙事借助符合启蒙叙事的元话语，在历史的语境中，构建了超越时代政治伦理的、具有内在现代性的俄罗斯人民形象；“领袖人物”叙事将自身的权威性与纪实性的方面相结合，为获得“深层人民”的认同提供了条件，从而证明“深层人民”与“领袖人物”之间存在信任与被信任的关系。

但是，强调先进的、有力量的“深层人民”对于“领袖人物”的高度信任存在一定的风险。以福山为代表的许多政治学者都曾指出过这样的历史事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开始崩溃，并大规模地丧失国家能力，正是因为公民心目中，它的专政本质削弱了其合法性。”^①这样的提醒有它的合理之处。在“深层人民”高度信任“领袖人物”的国家叙事构建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遮盖现实当中民主性不足的情况，这可能会成为影响国家能力的风险性因素。但是，我们也应当避免以西方叙事的标准去评价新世纪俄罗斯关于“长久之国”叙事的构建问题。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权力的相对集中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 年，第 37 页。

既有利于消除世纪之交俄罗斯国民的彷徨心态，也有助于新世纪的俄罗斯联邦化解国内和国际领域因苏联解体而遗留的各种张力。基于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综合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国家叙事的构建，有历史渊源、民族性渊源的新世纪俄罗斯具有可预见的长久性。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ward of Russian literary world in the new century, the Russian National Literary Award “Big Book” is not only a vane of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a cultural phenomenon reflecting the will of a state. The respons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literature often relates to endogenous aspects of a country’s development. Surkov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 “long-lasting state” in his article of *Putin’s Long State*. The mutual trust and unity between people and President are important fulcra of this concept. Such works as historical novels and biographies are what the “Big Book” focuses on. Award-winning work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narratives in criticism activities are intended to indicate three points: the Russian people are advanced “deep people” beyond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Russia’s leaders are trustworthy;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lasting state” c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trust of “deep people” towards lea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depth of Russian national history and its origins make Russia predictably long-lasting in the new century. However, Russian national narratives, to certain extent, have not taken people’s subjectivity into account. In the long run, it will be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which is harmfu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lasting state”.

【Key Words】 Russian National Narrative, Russian Literature Priz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 Long-lasting State

【 Аннотация 】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как важная преми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ового века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флюгер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но и культурным явлением, отражающим волю страны. Отра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в

обла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часто связано с эндогенными аспекта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статье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Сурков выдвинул концепцию «долг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ажной точкой опоры которой являются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и единство народа и лидер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акие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оманы и биографии,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ыми аспектами премии «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 Постро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в отмеченных наградам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и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их критики, призвано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три аспект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 —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 «глубинный народ», выходящий за рамки времен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акты доказали, что лидеры России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доверия; построение «долг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о через доверие «глубинного народа» к лидера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глуб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делает Россию в новом веке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 долговечной. Однако нарра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определё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прикрывает отсутствие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людей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что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 плане всё же является фактором, н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им построению «долг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ррати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политика,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责任编辑 崔 珩)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0年第4期(总第224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

定价：30.00元